

## 房山区近百年洪灾纪实

房山区水利局

房山区东临永定河，西至拒马河，中有大石河贯穿南北，内有小清河，牯牛河，刺猬河，挟括河等十条小河道。由于受西北山区处于暴雨中心区(面积达 1327 平方公里)和东部永定河分洪或决口的影响，历史上水患频繁。据《北京市洪水调查资料》(1981 年版本)和房山、良乡两县县志记载，房山区在 1888 年至 1949 年 61 年间有 5 次特大洪水发生。按大石河洪水大小顺序为：1888 年，1890 年，1924 年，1929 年，1939 年。在 1950 年至 1990 年 40 年间，以大石河漫水河水文站洪峰流量超过 500 立方米每秒起算，有 5 年发生洪水，其中超过 1 千流量的有 3 年，按洪水大小顺序为：1950 年，1956 年，1963 年，1954 年，1955 年和 1973 年。

### 一、1888 年~1949 年

#### 1. 1888 年(清光绪十四年)

大石河漫水河村洪峰流量 5040 立方米每秒，河北村南街全部被冲，全村死近百人。大石河冲走万余人。

#### 2. 1890 年(清光绪十六年)

六月初一至初三大雨，大石河漫水河洪峰流量 3270 立方米每秒，永定河卢沟桥洪峰流量 8390 立方米每秒。《良乡县志》记：夏日大雨倾盆，山水迸发、异常汹涌，将桥(琉璃河石桥)冲断二十余丈”，良乡西门外“溃堤，坏官舍，民房无数”。

#### 3. 1924 年(中华民国 13 年)

七月十日至十六日，历时七天大雨，暴雨中心在房山区霞云岭班各庄以上地区，大石河贾峪口村洪峰流量 3140 立方米每秒，永定河卢沟桥洪峰流量 4920 立方米每秒。

“七月四日起华北淫雨不止，十日永定河水大涨，十五日、十六日大雨倾盆，昼夜不息，京畿一片汪洋”“十五日晨，永定河漫溢决口两处，一处南上二工，一处南上三工”八月七日后，永定河又决口四处。高陵、小马厂、夏家场各决口 800 米，保合庄决口 300 米，夏家场全村被水淹没，公议庄、保合庄、朱家岗、佛满、葫芦堡受灾严重，人口四千五六百，七百余户……一千数百户灾民栖息在决口堤上窝铺内”(引《北京水利志稿》第三卷)。

#### 4. 1929 年(民国十八年)

七月中旬发生连续暴雨，到七月底本市一般降雨量达到 300~500 毫米，八月二日、三日又发生两次强度很大的降雨，暴雨中心在大石河中下游房山一带和永定河官厅山峡下游。漫水河洪峰流量 3940 立方米每秒，永定河卢沟桥洪峰流量 4050 立方米每秒，”永定河金门闸上游右岸决口 900 余米”(引《北京市水利志稿》)。

#### 5. 1939 年(中华民国二十八年)

7 月初开始出现连阴雨天气，七月二十四日~二十六日连续三天暴雨，暴雨中心在房山、周口店以西的山前区和官厅山峡中下游，我区各河沟均发生了 20~100 年一遇洪水，大石河漫水河洪峰流量 3220 立方米每秒。马各庄洪峰流量 3600 立方米每秒。拒马河千河口村洪峰流量 7100 立方米每秒。

“永定河七月二十六日晚又有 3940 立方米每秒洪峰出现，先在左岸的石堡、南章、北章客决口，后又在卢沟桥下 1.5 公里处西岸决口夺溜，永定河水通过这一决口泄向小清河、直趋长辛店。”(引《北京水利志稿》)我区小清河沿岸及大石河下游各村庄受灾。

### 二、1950~1990年

1. 1950年8月4日大水，大石河漫水河村洪峰流量2400立方米每秒。永定河向小清河分洪100立方米每秒，漫地18万亩，沙淤地8747亩，塌房7658间，死44人，伤13人。双柳树村1200亩粮田水深1尺。

2. 1952年大水，沿河各村洼地积水成灾，良乡城关5村地面出水。

3. 1954年汛期大水，大石河漫水河水文站实测洪峰流量738立方米每秒，26.8万亩作物受灾减产，27个村三水围、塌房无数。房山县26万亩庄稼淤涝，3.3万亩颗粒无收。

4. 1956年7月底洪水、大石河漫水河站洪峰流量1860立方米每秒，良乡县低洼地汪洋一片，受灾15461户，塌房12751间，死12人，死牲畜23头。房山县粮田受灾面积9.9万余亩，塌房6214间，死7人，死耕畜124头，灾民达63243人。

5. 1959年8月，大雨，暴雨，全区受涝农田27.82万亩，成灾面积21.51万亩，其中减产8成以上的8.8万亩，倒塌房屋4947间，死伤17人。

6. 1962年7月，永定河上游官厅水库泄水，造成赵营险工段拐弯堤的石顺坝沉垫近三分之一。金门闸、公议庄和葫芦垡等三处险工有9个坝身及盘头出险，冲走雁翅林和沙柳坝新栽小树4150棵。

7. 1963年8月3日至9日，连续大雨和暴雨，全县各河流洪水猛涨，拒马河张坊水文站最大洪峰流量9920立方米每秒；大石河漫水河站最大洪峰流量1280立方米每秒，洼地大量积水。全县有5个公社21个村被困，石楼、琉璃河、南召、窑上等低洼社队过水面积达16万亩，拒马河畔大型灌溉工程被冲毁21处，冲走树木26775棵，塌房2362间，王家磨、张坊、蔡庄三处大坝被冲毁，大石河下游堤防漫溢，决口51处，夏村、双柳树、泇城等12个村全部被洪水围困，严重的街道院内水深达1—2米，山区的霞云岭、十渡、蒲洼一带发生泥石流240处。

8. 1964年8月中旬，全县连续大暴雨，大石河，小清河，刺猬河、周口店河、马刨泉河等河堤防漫溢，决口24处，长427米，掏刷倒坝3处，长392米，溜坡塌坝7处，长440米，低洼易涝地区过水面积达8.88万亩，积水面积3.49万亩，泇城、双柳树等村被洪水围困。

9. 1973年7月，连阴雨、雨量集中，强度大，造成各河涨水、山区鸽子台、鸳鸯水、元阳水、柳林水、大窖，水峪等小型水库先后漫溢，全县有5400亩闸沟垫地被冲毁，平原地区大石河下游的石楼公社境内决口，造成双柳树，梨元店等村进水，全县积水，过水面积达2.2万亩，倒塌房屋棚舍90间、埝墙35900多处。

10. 1979年8月10日至15日，连续降雨5天，全县平均降雨量216.4毫米，最多的张坊雨量站326.7毫米，致使各河流涨水。丁家洼水库、鸽子台水库相继漫溢，天开水库蓄水达439万立方米，是建库以来最大的一年。全县积水面积5.6万亩，冲毁粮田2113亩，倒塌房屋3720间，伤亡5人，伤亡牲畜4头，受灾严重的是石楼公社，淹地0.7万余亩，收成无望的达0.321万亩。

11. 1982年7月底8月初，山洪暴发，山区十渡、六渡两公社冲毁河滩地1100亩，冲毁鱼池十个，冲走鱼4500尾；冲毁扬水站1座，冲走手扶拖拉机1台，冲毁民房18间，猪圈10处，冲走鸡、鸭等家畜500余只，冲毁公路30处，史家营、长操两公社原煤被冲走1.4万吨，十渡公社有2名行人和10名游客被洪水冲走，大石河河北公社冲走一男孩、城关公社田各庄大队3名过河妇女被冲走。

12. 1988年汛期，全区平均降雨565.4毫米，由于降雨量多，洪水暴发、塌房163间；冲倒果树2323棵，材树6302棵；冲走鸡、羊41只，冲毁鱼池22亩，损失成鱼0.5万公斤；冲走跨河桥梁27座，冲走原煤2.15万吨，十渡、六渡两乡4处小水电站进水闸被冲毁。

（《房山文史资料》第8辑）

## 房山历代大灾及赈灾略记

王培秀

赈济救灾，以解民困，历代皆有。汉代所谓“赈穷”、“恤贫”，即指社会灾害救济。然在不同社会制度下，赈济救灾具有不同的性质。在封建社会，以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社会救济只是统治阶级惮于大灾之年易生“民变”，而收揽民心，以维护其统治的一种手段。而新中国建立后，有党的领导，依靠国家和集体力量，无论遇到怎样严重的自然灾害，人民的生活都能得到根本的保障。并能重建家园，发展生产，不断提高抗灾能力，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和社会进步的标志。

兹将房山历史上天灾及赈济救灾史料辑纂，以备研究者参考，其中有的虽未标明属广阳、良乡、房山史料，但大范围的含有房山、良乡被灾的史料，亦择要辑录。

### 东汉

公元108年(东汉安帝(刘佑)永初二年)

州郡大饥，米石二千，人相食。是安。广阳等地，黎民流离失所，老弱相弃于路。

### 南北朝

公元517年(北魏孝明帝熙平二年)

十月，幽州严重饥荒，直至次年春《魏书》载，死三千七百九十人。

### 唐

公元621年(唐武德四年)

十一月，幽州大饥，李艺遣老弱就食于交开道，高皆厚遇之。艺以为高诚意援助，遂派兵三千带车马往请粟，均被扣留。

### 宋辽

公元993年(契丹统和十一年)

七月，桑干河泛滥，南京地区居民房舍及庄稼多漂没。翌年，圣宗又至南京，赐贫户耕牛。契丹统和十五年(公元997)宋至道三年四月，发放“义仓粟”济灾民。

公元998(契丹圣和十六年)

以燕民疲弊，恤孤寡，省赋役，不轻启战端，并奖励农业生产。

公元1017年(契丹开泰元年)六月，南京诸县蝗害。十月，因南京饥，调云，朔等州粮米赈之。

公元1019年(契丹开泰六年)

南京饥荒，同知南京留守事杨佖，发仓廩，并将卖身奴隶者按佣工赎回。

### 金

公元1124年(宋宣和六年)金派人向宋求索粮粮，宋不许。时河北、山东转粮以给燕山，民力疲困，连年凶荒，饥兵并起为盗。于1125年二月，宋从南方运大米五十万斛于燕京，以救荒。

### 元

公元1286年(至元二十三年)九月，大雨，毁太庙。十一月，以涿、易二十州，良乡、宝坻县饥，免今年租，粮三月。

十二月，大都饥，发官米抵其价赈贫民。

公元1302年(成宗大德六年)四月，浑河水溢，坏农田一千八百余顷。发通州仓米三百石赈贫民。七月，大都近畿蝗。

公元1308年元武宗(海山)至大元年六月，大都饥，发官米赈之。

公元1314年(延佑元年)二月，给钞六千三百锭，赈济良乡诸驿。

六月，涿州范阳、房山二县浑河溢坏农田四百九十余顷。

公元1321年(至治元年)九月，京师饥，发粟十万石平糶。

(公元1322年)五月京师大饥，发二十万石赈之。

(公元1324年)正月，糶米二十五万石，赈京师贫民。

公元1325年(泰定二年)四月，范阳，房山二县水。十一月，京师饥，赈粟四十万石。

公元1326年(泰定三年)

七月，房山、宝坻、玉田、永平等县大风雹，折木伤稼。

十月，京师饥，发粟八十万石赈之。

公元1328年(天历元年)涿州范阳、房山饥，诏赈饥民粮两个月。

公元1340年元至元年

二月，京畿五州十一县水，每户赈米两月。

公元1341年(至正元年)三月，房山饥，赈钞四千锭。

### 明

公元1409年(成祖永乐七年)十二月，赐济宁及良乡民频年递运者田租一年。

公元1470年(成化六年)五月，顺天等地旱灾。六月，顺天旱后大水。时旱涝相仍，民食草木几尽。十二月，派官员分别至畿辅受灾地区赈济饥民。再发京粮三十万石平糶。

公元1471年(成化七年)春，北京连年灾荒饥谨，大学士彭时奏请发仓储粮平糶，先后发放八十万石。五月时岁饥大疫，民多道死。

公元1489年(弘治二年)七月，北京仍霖雨连绵，救济畿内水灾，免税粮，给受灾贫民麦种。十一月，北京地区饥荒，发粟平糶。

公元1493年(弘治六年)六月，京畿大旱。飞蝗过北京，蔽日达三天之久。八月，免北京受灾地区夏税。十一月，赈北京流民。

公元1511年(正统六年九月)

巡按直隶监察御史陈永言：顺天府所属州县蝗，民贫食难，而房山尤甚，其米柴夫三百余人，每人月柴四百斤，赴京输送，疲劳不堪，请量减以苏民力。诏减，明年春仍旧。

公元1514年(正德九年)五月，赈济顺天受灾州县饥民。

公元1532年(嘉靖十一年十二月)以旱灾免顺天昌州、遵化、丰润、平谷、良乡、房山、文安、三河、怀远、顺义、密云等县夏税……粮谷有差。

公元1550年(嘉靖二十九年十二月)发太仓银二万两于通州，一万两于怀柔县，一万两于顺义县，一万两于良乡县，各召买粮草，备明年客饷。

公元1553年(嘉靖三十二年)良乡县大水大饥。

公元1554年(嘉靖三十三年)三月，四方流民，就食京师，死者相枕。四月，都城内外疫病流行，命太医散给药物，户部发米五千石煮粥赈济。

六月，北京暴雨成灾，大水漂没居民房舍。

公元1560年(嘉靖三十九年三月)上谕户部:“朕闻近京地方饥荒,民流入京者众,无所得食,其详议赈济事宜以闻”。于是部臣覆上五事:“议赈流聚。户部锦衣卫各简属官十人,与五城御史,以太仓米万石悉录见在流民,每日人给米一升,至四月终止。五月后京百里之外者,人给米五升,远者以次递加,至二斗而止,使还旧业。一、议济病弱,凡就赈饥民病不能赴官者,令所在富户为糜食之,太医院仍给药调治……一,议处近民。昌平、顺义、良乡、房山、三河、通州,或于太仓,或于通仓,各发米五百石,付所司分赈……”报可。

公元1566年(嘉靖四十五年)房山知县李琮于预备仓积牛粮谷种四十余石,春季散给贫民耕种,至秋加二利息还仓,贫民便后增至一百余石。

公元1569年(隆庆三年十一月)以水灾免……昌平州……房山、良乡、宛平、大兴……怀柔等县……屯粮各有差。

公元1573年(万历元年)房山知县陈庭训增建预备仓六间,积纸赎谷一千六百十八石七斗九升五合八勺,黑豆六十石,粟五百三十六石九斗五升,每年春给秋敛,亦如牛种例举以约保证付。

公元1587年(万历十五年)四月,京师大旱、大瘟疫、地震。六月京师暴雨成灾,房屋倒塌,溺压死者不可数计。十二月京师煮粥赈饥民。

公元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七月,因春夏久旱不雨,救济京畿饥民。

九月,京师五城分厂煮粥平糶。

公元1640年(崇祯十三年)闰正月,赈京师饥民。七月,命畿内捕蝗。发库银救济遭蝗灾之州县。

崇祯间,房山知县张肇林积纸赎谷五百三十五石六斗五升。岁大浸,两请当事得大瘼之粟三百余石,煮粥赈饥,全活无数。又于城隈隙地营建百室曰冬生院处乡民之无依者至今称之。

## 清

公元1668年(康熙七年)良乡县大水、地震,水入西关至县治衙内外深数尺,南关民房冲毁过半。

公元1680年(康熙十九年)正月初七日,京师一带饥民流移载适。六月二十日,命五城粥厂再展期三月,遣太医三十名治饥民疾病。

公元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九月,畿辅地方,旱情严重,北部地区灾民,以山核桃做粥充饥。良乡县旱灾,赤地无收。十月十九日命大学士、九卿等每日齐集午门前,议救灾之道。发帑金三十万赈畿辅旱荒饥民。

公元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房山县预备仓实存仓米一千二百零七石一斗,谷三千五百八十石八斗,因每年折耗极多虽奉有减价出粟即之,明文然乡民贫穷买者寥寥,若必出陈易新,准春借秋收,为官民两便。

公元1758年(乾隆二十三年)

奉总督方,题请直隶各属设留养局,良乡县设在南门外,冬月留养贫民春融遣散,其有疾及年过七十者常留在局给衣被钱米,有差经费银一百两。道光元年本部堂捐发商领营运月息一分,现在岁收息十二两,收租地七顷四十九亩四分一厘。按记数收租银四十二两五钱一分二厘,租制银四十一千七百九十文,租粮一百余石,嗣因沙压地瘠不堪耕种陆续减课,现在岁收租银二、三十两不等。

公元1763年(乾隆二十八年)正月初六日,命永定河加筑月埝、开减河,以工代赈。

公元1769年(乾隆三十四年)正月,命拨通仓米三十万石,补直隶霸县等十二州县赈粟。

另据北京通史记载:永定河从山西出山进入近畿一带的平原地区后,由于地势平坦,从芦沟桥以下经常泛滥成灾,淹没宛平、良乡等地的农田和村庄。在1698年至1772年(康熙三十七年至乾隆三十七年)雇佣了大批贫民和河兵六次修浚永定河。

公元1774年(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初七日,禁京城商民囤积米谷。十月初一日,以近京一带饥民扶老携幼迁徙、逃亡,命派员在芦沟桥拦阻,不许过桥北上。

公元1802年(嘉庆七年)三月,阅永定河工,免经过宛平县明年额赋十分之五;良乡等五州县额赋十分

之三。展赈京城内外灾民一月。

公元 1811 年(嘉庆十六年)四月, 京师旱。后宛平、涿州、良乡等地大水。赈济。

公元 1872 年(同治十一年)八月二十一日, 永定河决口。九月二十九日, 拨京仓米二万石, 部库银六万两, 赈顺天府属被水灾民。十二月十二日, 再拨仓米三万石, 部库银四万两, 赈顺天府属被水灾民。

房山县留养局, 设在东关创于前清咸丰, 同时代原以养贫民之无告者, 嗣后以款项无着仅冬季办理粥厂一月, 其开办日期例由腊月初一日起至三十日止, 每日需米四五斗, 打粥者多系本县贫民共计三百余口, 除本月支销薪米人工外, 所余之款尽数按名支配分给贫民以度年关, 此历办粥厂之大概情形, 也其筹定的款一为捐款生息, 一为煤窑捐共二三百元至民国九年旱灾天灾较为特别, 灾民过多, 借北门外关帝庙为粥厂, 由绅耆等呈县转详京兆尹王批准, 拨给捐款三百元遂又展期放粥两月。

公元 1873 年(同治十二年)八月三日, 永定河溢至十一月十七日漫口合龙。九月八日, 截留漕粮八万石, 赈顺天府各属被水灾民。

公元 1883 年(光绪九年)良乡棲流局设在南门外, 府尹以河间、献县灾民赴京过多, 恐至滋事发交前县杨谦柄经费银一千五百两设局, 截留外来灾民煮粥散放, 自光绪九年十二月起至十年闰五月上遣散, 并因本邑九年被水民情困苦, 每日早在局煮粥散放以昭矜恤。

公元 1888 年(光绪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永定河夏决, 宛平、房山等州县受水灾, 赈灾民钱、粮。

公元 1890 年(光绪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 北京地区连日大雨, 永定河决(稻田村南决口), 顺天府属二十余州县遭受严重水灾。

八月二十六日, 发帑五万两, 大钱五十万贯, 米十万石赈顺天府各属灾民。

公元 1892 年(光绪十八年)七月十七日, 永定河决, 顺天府属州县受灾严重(稻田村南决口)。八月十三日, 以近郊水严重, 拨部银十万两备赈。

公元 1893 年(光绪十九年)八月四日, 北京大雨成灾, 命京城六门外添设粥厂, 并拨京仓米石充饥(闫仙垓村北、南两处决口)。

据《永定河治本计划》附图改绘记载: 公元 1771 年至 1904 年, 在这 134 年间永定河从稻田村北至金门闸南良乡县境决溢十九次, 使沿岸村庄遭受严重水涝灾害, 同时曾多次受到赈济。

### 中华民国

公元 1924 年(民国十三年)

永定河决口四处, 马厂、夏场村决口 800 米。从民国十三、十四、十八、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年房山、良乡地区连续大雨, 山洪暴发, 河水泛滥, 决堤漫溢, 农田被淹, 房屋倒塌, 有人畜伤亡, 十八年大雨七昼夜洪水成灾, 拒马河尸体漂浮, 因政局不稳, 赈济灾民寥寥无几。

公元 1937 年(民国二十六年)良乡、房山地区大雨, 山洪暴发。琉璃河被水淹土地 9300 亩, 庄稼减收。

正字慈善会(注)良乡县分会, 设于良乡县城内, 分会赈务办事处, 民国二十七年六月一日成立, 分会民国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二日自成立。经费每年三百五十元。去岁该分会所办事业: 修理文庙, 施放赈粮, 计发放 155 村, 5023 户, 23955 人, 赈粮共计 6240 元(总会设於北京市内二区界铜井大院, 马神庙二十号)。

公元 1939 年(民国二十八年)七月下旬, 连日大雨, 永定河水暴涨, 铁路均被淹没。房山、良乡水灾亦很严重, 良乡城进水, 沿小清河, 琉璃河下游二十多村庄受灾, 良田被淹三万多亩, 很多民舍被冲塌, 大批灾民流离失所, 无家可归。据房山县东班各庄不足二百户的统计有八十三户因为灾荒而讨饭, 二十七户被迫卖儿女, 六十三户逃荒到张家口一带, 先后饿死八十三人。(北京师专史地科师生调查)。

十二月中旬, 北京米荒。伪“临时政府”下令实行计日授粮。

公元 1942 年(民国三十二年)

从春到夏，一连几个月没有下雨，土地干裂，草木干枯，这场灾害一直延续到1943年。这场空前严重的自然灾害，使苦难深重的敌统区人民处于更加悲惨的境地。据北京师专史地科师生调查，一九四三年河套沟东半部(敌占区)饿死的人二千零三十五人，逃荒到外地的有一千五百三十八户，卖儿卖女的有四百三十二户，妻子改嫁的二百九十四户。

由于饥饿，大批逃荒的人涌向县城，不分白天黑夜，挤在房山的街头巷尾，迫使日伪房山县政府不得不在城东三里远的饶乐府开设粥厂，赈济灾民，同时肖庄西边也开了粥厂。开办粥厂的日伪人员从中克扣自肥，为了少放米而又要粥粘稠，就在熬粥锅里放上石灰，吃了这样的粥，腹部胀痛，许多人就因此而死去。仅定府辛庄一村吃这样粥涨死的就有三十六人。天气炎热，尸体易腐烂日本人怕传染瘟疫，在清尸时，把带气的人也拖去活埋。

从1940年开始，各抗日根据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群众，军民齐心协力，开展生产自救，开荒生产，以补粮食之不足。如蒲洼村党支部成立垦荒团，开荒一百二十余亩，秋后收粮二万多斤。在庙安岭一带担任警戒任务的侦察连，十八天开荒四百七十亩，到秋天收获谷子三千余斤。到1944年根据地内部已基本上解决了吃饭穿衣的问题，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不仅战胜了自然灾害，为支援前线战胜敌人奠定了物质基础。

公元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敌占区良乡地区大雨，良乡县救济院从冀热平津分署领取水灾难民急赈面粉2280袋，分发琉璃河、张谢、肖场、城关、交道六个乡(镇)4500人。

公元1948年3月10日中共房山县委发出“关于民兵联防工作的指示”在房山县解放区划了六个联防区。房山县政府给三、六区一百四十四户受害户发放了一万多斤救济粮，还有布匹、衣物、稳定了群众情绪。

(《房山文史资料》第8辑)

## 1939年的水灾

刘宗亮

我区洪水多，来自西部山区暴雨和东部永定河向小清河分洪。山区暴雨洪水，来势猛，峰高，暴涨暴落，流速快。洪水出现后，平原河道坡缓窄浅，各河相互顶托，排泄不畅，易漫滩成灾。沿河低洼地区农田、村庄常受水淹，围困灾害。

永定河分洪或决口，由于河床高出堤外地面洪水水势猛，泥沙俱下，小清河河床淤塞沿岸土地淤积砂化，灾害范围大。

拒马河、大石河、永定河同时发生洪水的机率很大，洪水灾害也就频繁。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洪水就是在大石河、拒马河发生洪水后，永定河又决口夺溜入小清河，三股洪水在河北省涿州市码头镇南相遇顶托成灾。这是我区近六十年来危害程度最大的一场洪水。

1939年6、7月间，连阴雨长达四十余天，7月24日后连降两天暴雨，最后一日，7月26日下午至夜间“倾盆大雨，雷电交加”，暴雨中心在房山，周口店西部的山前区，和永定河中下游官厅山峡。全市三日雨量大于200毫米雨区范围达8000平方公里。

房山西部山区各河沟发生了 50—100 年一遇的洪水，永定河官厅山峡各支沟都发生了 20—50 年一遇洪水，我区周口店，拴马庄，石门等村，在流域面积 30—40 平方公里范围内产生洪峰流量 700—800 立方米每秒。周口店村冲走好多人，王德起一家被冲走，运煤高线桥冲毁。大石河贾峪口洪峰流量 2230 立方米每秒。石门村张志清的碾子被冲走，大水涨至村西井台。漫水河洪峰流量 3220 立方米每秒。马各庄洪峰流量达到 3600 立方米每秒。琉璃河铁路桥闷孔。拒马河张坊洪峰流量 8500 立方米每秒。漫水河村，大部分房屋进水，村西三间砖房冲塌，13 天后行人方能过河。

永定河从 7 月 16 日至 26 日三次决口。7 月 16 日卢沟桥洪峰流量达到 3180 立方米每秒，下游屈家店闸附近及固安县右堤溃决。7 月 25 日晚洪峰流量达到 4390 立方米每秒。7 月 26 日晚又有 3940 立方米每秒洪峰出现。

卢沟桥北的京广铁路桥钢梁被冲弯 7 尺，铁路北面右侧岸(西岸)冲开约 350 米。洪峰下行后先在左岸梁各庄决口，冲毁京津铁路路基，后又在东岸窑上村对岸决口。最后在卢沟桥下 1.5 公里西岸决口夺溜，永定河水通过这一决口泄向小清河。洪水漫过小清河西埝直趋长辛店。长辛店，赵辛店两村冲毁房屋 180 间，南岗洼，长阳良乡等处水深逾丈。京广铁路南岗洼段路基冲毁 140 余米。小清河两岸的葫芦堡、官道、窑上、交道、南召等乡与大石河下游的琉璃河、窦店、石楼等乡的洪水连成一片汪洋。

由于永定河决口，洪水夹带大量泥沙，小清河、大石河、拒马河在涿州市码头汇合处，河床淤积堵塞各河洪水相互顶托水位抬高，洪水滞留时间延长，我区受灾范围达 310 平方公里。从此大石河下游兴礼，立教，涸城等洼地常年积水形成一片沼泽，全区有 3.7 万亩粮田长期积水。直到 1950 年良乡、房山、涿县三县才疏挖河道撤水还田。

### 参考资料：

- 1、《北京市洪水调查资料》第一册
- 2、《北京市水利志稿》第三册

(《房山文史资料》第 8 辑)

作者系区水利局干部

## 房山历代赈灾史料

王培秀

房山、良乡两县从 1949 年——1952 年连续发生水、旱、虫、雹、风灾害，经济损失严重。为战胜灾害，积极组织群众生产自救，同时，政府用实物赈济灾民，并对外地逃荒灾民进行了妥善安置。

1949 年 8 月下旬，良乡县小清河、牯牛河、刺猬河、琉璃河，因山洪积水特大，淤沙堵塞，形成漫堤溢水，决口九处。全县 237 村受灾 152 村，最严重的三十余村，土地 25996.3 亩颗粒无收。各级政府积极组织群

众抢种小麦 129, 132 亩, 贷给麦种 10 万余斤; 广泛收集树叶、野菜、麦角米、稗草籽、小蒲根等 12581 斤; 恢复开辟多种副业生产——熬碱、烧石灰、捕鱼、运输等。7 月 25 日平西专署拨给贷草贷粮小米 60, 000 斤, 雹灾贷粮 7000 斤, 支持重点村困难灾户进行生产度荒。全年还发放优军粮 43, 000 斤, 救济粮 6, 100 斤。

1950 年 6 月底开始, 连日阴雨, 永定河水突涨。8 月 2 日—4 日连降特大雨, 良乡境内各河流水势暴涨, 永定河 8 月 4 日下午 2 点半芦沟桥水位涨至 64.4 公尺。为了永定河不决口成灾, 小利服从大利, 于三点开始向小清河分洪约 500 流量。因雨量过大, 加上向小清河分洪, 小清河、牯牛河、刺猬河沿堤漫溢, 致小清河决口 23 处, 全县塌房 8473 间, 被淹土地 201, 036.5 亩。各级政府继续宣传、组织群众, 广开度荒门路, 开展副业生产, 收效显著, 播种冬小麦 11 万多亩, 贷麦种 227265 斤, 为灾民度荒奠定了基础。全年救济 206 村, 发放救济粮 65000 斤。同时, 对新安、任丘、武清、兴隆、蓟县等逃来的灾民 441 户 1813 人, 暂住各村公房和庙宇, 生活上得到安置。

1951 年秋季雨量较少, 造成 1952 年春季大旱。7 月下旬普降透雨, 在窑上、琉璃河沿河村庄, 大部洼地积水成灾, 有 29 村、三万多亩减产 50%。8 月 30 日良乡北部丘陵山区 20 村、16922 亩大秋作物遭雹灾, 有 1357 亩绝收。四年良乡县共投放救济粮(小米)262722 斤。

房山县山区面积大, 大部分是旱地, 容易发生旱灾, 一年只收一茬庄稼, 经济基础薄弱, 平原地区面积小, 年年收两茬庄稼, 低洼地容易受水灾。1949 年年景不太好, 遭受水旱雹虫等灾害, 有的地区秋收产量减半, 个别地区颗粒无收, 群众生活比较困难。1950 年 8 月 4 日大雨, 全县普遭水灾, 山地普遭风灾。受灾 196 村, 占总村数 77%, 受灾土地 139202 亩, 占总土地 18.8%, 共塌房 7756 间, 拒马河、大石河冲毁 54 村的 6810 亩土地, 河压 4897 亩。山地上水更严重, 仅五区受灾土地 17712 亩, 占总土地 30%, 被大石河冲废河北等二十五村土地 3551 亩, 河压 3860 亩。琉璃河水倒扬, 大石河下游出槽漫溢, 淹地三十一村, 59368 亩。县拨出救济粮 25000 斤, 救济一、二、五、六区 798 户, 3972 名灾民。

1951 年是多灾年, 从春季至八月上旬始终没有普降透雨, 遭受了严重旱灾, 尤以山区为重, 不少庄稼枯死。三个灾区(二、五、六区)93 村, 13396 户, 60048 人, 土地 92818.77 亩, 平均仅有四成收获。入夏连续发生蝗虫、蚜虫、钻心虫。六月二十八日到八月二十五日先后发生蝗虫 11363 亩, 部分作物叶子吃成锯齿, 个别的被吃光, 减产 10%。约一万多亩谷子上了钻心虫, 减产 30% 以上。七月下旬王老铺、南窖、下石堡、上下中院等十二村发生雹灾, 受灾面积 6878 亩, 其中, 2227 亩减产 50%。六月二十八日山区忽起大风, 受灾严重的下石堡、蒲洼等七村, 折树 1130 多株, 刮毁庄稼 1620 亩, 造成果品、粮食大减产。

县委、县政府十分重视广大群众的生产、生活, 特别是从 1949 年开始, 恢复和发展生产, 开展生产自救运动。由于自然资源比较丰富, 大搞付业生产, 增加收入。在七、八区开采小煤窑 32 座, 每日出工 433 人, 每人每日可挣小米 13—14 斤。开石板矿九座, 每日上工 178 人, 每人每日挣小米 14 斤。建灰窑 24 座, 每日上工 490 人, 每人每日挣小米 10 斤。宝水等村利用牲口长年运煤销往涑水南集、小封口等村, 每头牲口挣玉米三—四升。二区片上村往里二十七村, 每日有 650 头牲口搞运销, 每日每头牲口收入 9 千元(当时币值, 每万元合现在人民币壹元, 下同)。还有 100 头牲口驮柿子销往涑县, 一冬天挣玉米 100 多石。组织劳动力外出做工, 年收入人民币 2000 多万元。供销社系统收购荆条、药材等收入人民币 14000 余万元。开设豆腐房、打柴收入人民币 3000 万元。搞水土保持工程 1441 人, 收入 3000 余万元。由于广大群众积极投入生产自救, 度过了灾荒。四年房山县投放救济粮(小米)878410 斤。

房山、良乡两县从 1953 年——1957 年, 五年内遭到两次特大水灾。

房山县 1954 年连降暴雨, 有 25995 亩庄稼遭受沥涝, 并发生虫、雹灾害。最严重的是一、四区套洼地带十五个村, 有 33000 亩土地颗粒无收。雨季塌房 3800 余间, 砸淹死三人, 伤六人, 砸死毛驴一头。灾情是解放以来从未有过的。全县轻重灾村 105 个, 12350 户, 54845 人, 减产 1590 万斤。由 12 月到 1955 年 6

月底缺粮7, 462, 710斤。

河北省委九月十七日发出(河北日报)“关于全面深入地开展增产节约活动, 大力支持灾区生产度荒的指示”和“生产自救节约度荒, 群众互助并辅之以政府必要救济”的方针。

良乡县委、政府在贯彻省委指示精神, 布置生产救灾时, 号召“全党全民要以再接再厉、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 来战胜一切困难, 度过灾荒, 克服与防止部分干部面对严重的灾荒束手无策的消极悲观情绪与单纯依赖思想, 迅速开展起全面的生产自救运动”。县委、县政府领导亲自带领干部分赴灾区了解灾情, 深入灾村灾户进行慰问, 给灾民极大鼓舞, 坚定了生产自救信心。各区、乡领导带队深入灾村, 帮助灾民修建房屋, 恢复生产。三区兴隆庄乡四次遭水淹, 部分地区又遭受严重的雹灾, 全乡土地13847亩, 能收四至七成的只有2800亩, 其余11047亩均秋收无望。乡村干部对灾民逐户进行安置, 稳定情绪, 迅速投入生产自救工作。全县动员11000多人投入排水, 到九月底, 开大小渠道39道, 调整旧渠两道, 排除积水10万亩, 不仅减轻了灾害, 亦保证了按时播种秋麦。并及时发放救济款4000万元, 生活贷款8000万元。以工代赈组织灾民参加永定河、小清河岁修工程, 工、料收入39000万元。由供销社组织灾民的大车161辆搞运输, 三个月收入45000万元。纳鞋底、勒苇箔、编席、挖沙土等收入5380万元。采集稗子和可食用草籽300余石, 有效地支持了度荒。

房山县委、县政府普遍进行了生产自救节约度荒的宣传教育, 使灾民无一盲目流入城市, 均积极投入各种副业、手工业生产。105个灾村都依据当地条件, 相继开展筛石子、纳鞋底、捕鱼、打荆条、运输、织席编筐、刨药材等四十余种手工、副业生产, 投入生产的灾区劳动力达7242人。开春有180名男劳力参加黄山店一上石堡的公路以工代赈工程。银行投放贷款63335万元, 支持灾区副业生产。供销社组织灾民进行副业生产加工、销售, 并保证原料和生活日用品供应。对无依无靠无生产能力的孤老残疾和生产贫困户, 给予了必要的救济。1954年分三次进行赈灾款发放工作, 适时解决了群众在紧要关头的生产生活困难。共救济2805户, 11113人, 其中, 少数民族17户, 64人。在冬季发放寒衣(包括单衣、鞋袜)1117件, 使缺衣少衣的灾民安全过冬, 并推动了农、副生产。

房山县1956年有34个农业社遭受严重水灾, 63243人, 缺粮769万斤, 灾后立即掀起生产自救运动, 组织了大小40多种副业生产, 扩建砖窑30余座, 灰窑10余座, 投入男女整半劳动力12000余人, 收益190万元, 不仅解决了缺粮, 而且支持了农业生产。全年分四次发放救济款128014元, 解决10631户、42912人的生活困难。入冬前发放寒衣8511件, 救济6754人。同时, 银行投放副业生产贷款180274元, 支持了副业生产。在节约度荒的号召下, 广大机关干部以身作则, 带头掺代食品节约粮食, 并捐献寒衣物978件, 现金469元, 作到了与灾民休戚相共。年初发放灾区保健救济款三千元, 为灾民支付医药费1654元, 使415名贫苦灾民患者得到治疗。全县有五保户481户、675人, 在秋季决算时均按消费指标留够了吃粮, 烧柴、棉衣大都得到解决。

1958年4月, 经国务院批准, 撤销房山、良乡两县, 设置北京市周口店区。辖区包括房山县的全部20个乡, 良乡县的11个乡(魏各庄、南岗洼2个乡划归丰台区), 京西矿区的12个乡, 共43个乡, 423个村。全区开展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为贯彻执行“从生产出发, 为生产服务”的方针, 建立公共食堂1437处, 建立敬老院39处, 入院老人534人, 占应入院50%, 公社承担全部生活费用。七月下旬曾连降几次暴雨, 由于源高流急, 使沿河两岸遭冲刷, 使低洼地区因受下游洪水顶托, 不能很快泻洪, 造成石楼、良乡、豆店、琉璃河、东南召等七乡79288亩庄稼被淹, 1007亩地被冲刷。全年发放救济款67631元, 解决5420户的生活困难, 区民政部门用赈济款购寒衣3212件。

1959年8月遭受严重水灾, 全区267个基本核算单位中有126个遭灾, 面积273932亩, 占总耕地面积40%, 受灾23974户, 因灾减产粮食8300万斤, 房屋倒塌、死伤牲畜等总计损失折款800余万元。灾后依

靠集体力量，迅速修复起塌房 7000 余户，生活有困难的给予了必要的救济，两次发放救济款 360424 元，发放寒衣 2320 件。

1960—1962 年，连续三年遭受严重的旱灾。继 1960 年遭百年未遇的大旱灾后，1961 年是最为严重的一年。去冬雨雪稀少，风多风大，连续达三百多天未落透雨，进入夏季以来烈日曝晒，热风连刮，温度不断上升。全县境内所有河流、水库、水井、水泉的水位显著下降，较大的青龙头水库已达死水位以下，接近干枯；丁家洼水库已干枯无水；拒马河水常年 11 个流量，下降到 6.8 个流量。全县 3200 眼水井，有 1 千多眼干枯，有 69 个村庄由于水井干枯，需要到往返几里或几十里路的地方取水吃。农作物受灾减产三成以上的 248636 亩，减产粮食 3000 余万斤，受灾人口 311851 人，占农业总人口 90%。灾后，在市、县委统一领导下，积极进行抗灾斗争，开展生产自救运动，本着低指标瓜菜代的精神，深入细致地安排灾区社员的生活，全面开展了副业生产。对救灾、社会救济款的发放，贯彻了专款专用的原则。1961 年根据“六十条”规定，各大队对五保户实行供给，对困难户给予补助。全县供给五保户 995 户，1311 人，补助困难户 3460 户，13959 人，两项从公益金内开支款 282197 元。并发放救济款 97000 元。

1963 年 8 月 3 日，全县连降七天大雨和暴雨，山区雨量达 300—400 毫米；平原达 200—300 毫米。由于雨量过大，时间集中，造成河水漫溢、决口。拒马河由雨前十三个流量到八月六日猛增到一万个流量，冲走九处大坝；大石河洪峰达到 1180 个流量；刺猬河、牯牛河也都漫溢。南尚乐、石楼、琉璃河、豆店等 5 个公社 21 个大队被水包围，村内水深一至三米，部分电线被冲断，与县、社失掉联系。县级各机关组织 23 名干部，由县委书记、县长率领，分工包段到各河道、水库亲自指挥防汛斗争，抢救灾民。同时，市委也派来空军、海军支援，终于战胜了洪水。全县 9 个村 305 险户，1390 人得到安全转移。近 16 万亩低洼土地积水，作物被淹。琉璃河、豆店等七个公社挖 428 条泄水沟，长达五华里。全县有 12000 亩土地被洪水冲走和 18000 亩低洼易涝土地，因大石河下游水大、河水顶托，积水过深，不能及时排出，造成严重减产。

1963 年全县有五保户 995 户，1311 人。多数社、队对五保户采取吃、穿、零用钱完全包起来的办法。有敬老院 8 处，入院老人 90 人，对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在日常生活上都做了妥善安排，使他们晚年的生活过得更幸福。

根据北京市委、市人委关于大力支援河北省救灾工作的指示，各公社、机关、厂矿、学校等单位都积极响应，通过层层教育，广大职工群众在提高社会主义觉悟的基础上踊跃捐献。全县共捐粮食 117792 斤(其中粮票 98218 斤)，干菜 144256 斤，现款 727.22 元。周口店石灰厂等四个市属厂矿根据上级指示，清理了仓库，加上职工自动捐献衣物，计捐献旧棉衣、秋衣等 353 件，旧布鞋 211 双，袜子 288 双，旧帽子 67 顶，还有铁锨、镐头等 258 件，有效地支援了河北省救灾工作。

(《房山文史资料》第 10 辑)

## 一场幸免了的大屠杀

方存恒

1939 年 3 月德国鬼子侵占了捷克斯洛伐克，当时，驻守房山县坨里地区的日寇大岛部队所属小林中队，于四月初的一个星期天举行庆祝。早饭时一群鬼子兵喝红了眼，山嚷怪叫，狼嚎狂笑。有个叫河野的兽兵，

骑马向北驰去，继续喝酒的兽兵有的看到了他的出走方向，但谁也没有注意，只顾自己吃喝。时近中午，河野还没有回来，这才引起中队长小林的怀疑。经询问马上派出一个小队向北找寻。由坨里往北正方向是经过石梯，水峪两村通往上万村的大道，在进入石梯村西口的地方，有一条山径小路通向辛开口村，然后并入上万村去磁家务村的大道。当时，由于河野饮酒过量，顺马由缰，并没有去上万。而是走山径小路向磁家务方向驰去，找寻他的小队却由大路向上万方向开来。走到水峪村向北碰到一个在路边玩耍的小孩。翻译走过去问：“小孩，你看见没看见一个骑马的太君从这里过去？要说实话，如果看见了说没看见，就砍你的头。”小孩子被吓坏了，本来它没看见，怕说实话鬼子不信，就随便往东北方向一指说：“往那边去了。”这个方向正是上万村东口。一群鬼子兵在小队长杜边的率领下，照直往上万村东头驰去。走到上万村外大河滩南岸时，遇到上万小学教师王维刚借星期日休假之暇放自己养的十几只羊。杜边就用半口中国话问王维刚，“你的，在这里放羊，一个骑马的太君往哪里去了？”王维刚回答，“没看见，我从早晨就在这里放羊，一直没有骑马的太君过去。”杜边一听，气得哇哇怪叫，瞪起两只狗眼，用战刀指着王维刚的心口说：你的良心大大地坏了，不说实话，死了死了的。两个鬼子兵立即把王维刚绑了起来，押着一齐到了上万村东口。把口的第一家是地主程四的庄院，土名都称大庄子，墙内四合院。院外是一个大场，大场周围有短墙环绕。地主的儿子叫程振川在长辛店开照像馆。这天程振川的妻子正好在家。年纪不到三十，城市打扮，正在门口张望，被鬼子看见，走过去便问：“一个骑马的太君在不在你的家？”程振川的妻子说：“不明白”。鬼子一听答非所问，马上起了疑心，便一拥进了程四的庄院。程振川的妻子被绑了起来，他们立即派人叫村公所的负责人到这里来。当时在村公所值班的是会计方秀昌（村里人都叫他写帐先生）他来了以后，便替程振川的妻子解释说：“村里确实没来骑马的太君。程振川的妻子平时住在长辛店。今天才回家看看，到家不久，什么情况都不知道，所以太君回话，她说不明白。”又说：“王维刚是小学教师，也是好人。”这一解释更督起了杜边的火。他马上吼起来：“你们的良心，通通地坏了，小孩子是不会讲假话的。不交出太君，你们谁也甭想活。”立时叫保丁敲锣集合全村群众，都到大庄子场院来开会。下午四时整，在家的全村老少，都被赶到大庄子场院。杜边站在短墙上讲话：“大家注意，有一个骑马的太君，上午到了你们村，谁看见了？（没人言语）现在在谁家？”（还是没人言语）杜边生了气。狂喊起来：“不说，先叫你们看两个说假话的下场。”鬼子兵马上把王维刚抽了一顿嘴巴，打得鼻口流血，又把程振川的妻子按翻在地用木棍打她的胫骨，疼得她先是又哭又喊后来便死了过去，鬼子这才住手。这时孩子吓得哭成一片。大人还是没人言语。杜边又缓和下来说：“你们都看见了肥！他俩都是讲假话的，这是最轻的下场，今天先放你们回去，大人好好问问孩子，到底谁看见了，说实话有赏，再象今天这样，通通地死了死了的，房子通通地烧掉。”村民大会开到这里便结束了。当天夜里，青壮年跑了多一半，剩下来的多数是老弱病残。第二天早上八点钟，一小队鬼子乘六辆满载干柴和汽油的汽车，开到大庄子场院外停下，立时把场院包围起来，四面架起机枪，又叫保丁敲锣集合群众。十点整，村里剩下的老弱病残都被赶了出来，杜边一看，人数还不到昨天的一半，而且多数是老头老太太，马上生了气。问方秀昌，“人都到哪去了？”方秀昌说：“可能去地里干活去了。”杜边说：“胡说，你们的良心通通地坏了，不给你点厉害的你还不老实。鬼子兵马上就把方秀昌绑在一条长板凳上，让群众看着往方秀昌嘴里灌凉水。灌得死去活来，直翻白眼，方秀昌还是没有二话，杜边正要继续实施淫威，正要下令向群众开枪时，坨里来了电话，告诉说：“河野已经回去，把上万村的群众放掉”。这场就要发生的血腥大屠杀，就这样幸免了。原来，河野酒醉骑马驶入磁家务村北山沟由马上摔下来，失去知觉。由于军马有很好地训练，一看主人落马。立即停在河野身边不动，就这样，他在山中躺了半天一夜，直到第二天天亮才醒过酒来，辨清了方向，上马返回坨里。这才免了上万村的一场大难。

现在回忆起来，亡国奴的气实在是难受。今天，我们的国家屹立在世界上，大小国际会议，我国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与昔日相比，真是天壤之别。我们一定不能忘记过去，要珍惜先烈们用鲜血换来的今天，

努力进行四化建设，巩固国防，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强大，要在世界上消灭战争，消灭侵略。使全世界人们的生活愈来愈幸福。

(《房山文史资料》第1辑)

作者系原房山中学高级教师

## 苦难的岁月

董汝民

难忘卢沟桥事变，中国人民受尽了欺凌和摧残。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实行了灭绝人性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特别是1942“五一”大扫荡以后，他们对人民的镇压更为猖獗。为了解决侵略战争造成的兵源困乏以及国内劳力不足，摆脱经济困境，在中国到处抓壮丁、劳工。有的押送我国东北煤窑，多数送往日本，从事非人的劳动，我就是不幸被抓走，在日本北海道下芦别那条死亡线上挣扎了二年多，劫后余生的一个中国公民。

### 亡国之恨

1942年，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对中国人民的奋力反抗极力反扑，“实行铁壁合围”反复清剿，奸淫、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在大扫荡时，我是亲身经历者。当时绝大多数群众，舍弃家园，带着全家妻儿老小流浪在外。有的在寒冷的野外挖个大坑住在里面。扫荡过后，人们刚刚从野外搬回家中，日伪合流、狼狈为奸，令他们的伪政府——大编乡到处抓人，押上北去的列车去当劳工。

我是河北省清苑县史家桥村人。7月的一天早晨，我村大汉奸、伪联保主任王展武，伪保长郭温等人以派夫为名、将我和姜兴齐，李富、宋合等四人送到石家庄大编乡政府。而后，日伪军把我们这批人象押送俘虏似的送到保定城隍庙街伪清苑县“政府”特务队的东院集中点。

那里没有宿舍，光溜溜的大敞院，到了晚上，大家象牛群似的拥挤在一起。院子周围岗哨林立，不许家人探望、送饭，完全与外界隔绝了。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听到了消息，被抓的这些人，根本不是什么夫役，而是送往日本当劳工。人们非常惊恐，一些人在墙角处相互依靠着小声呻吟，后来痛哭，继而绝望和愤怒。在那炎热的伏天里，人们横七竖八地躺着，吃不下饭，只是大口大口的喝凉水。当时大家都在想如何逃命。

三天后的一天下午，我们一百八十余人，被押到保定的西大街。大家无精打采地耷拉着脑袋，个个双手搭在前边人的后臂上。周围全是日本兵和伪保安队。日本兵端着上有刺刀的三八大盖枪。伪军手拿四棱大木棒，嘴里不停地嚎叫着：“快快的！快快的走！”伪军也学着日本兵的声音叫喊着：“快快的走！”还挥着大棒说：“找他妈的洋揍。”一声声的吼叫和枪托、木棒咣咣咣的声音，以及劳工们的妈呀、妈呀的惨叫声混在一起。大街上的行人见鬼子兵张牙舞爪、穷凶极恶，个个惊恐万状，急忙躲进了店铺和幽深的小巷里。

这天下午，保定火车站的西站台上静得很，没有亲人，没有欢笑，只有仇恨和满腔的怒火。我们被枪托和木棒送进了车厢。车轮转动了，火车徐徐出了站台，只听咕哒咕哒的响声。原来有人跳车。火车速度加快了、劳工们也急了。先后有十余人从车窗跳下去，对跳车的劳工，日本兵开始用步枪扫射，劳工们还是继续不要命的往下跳，只听有个日本军官哇呀叫了一声，接着步枪机枪一齐疯狂地扫射。即使这样，还有人要拼个鱼死网破。在我身边有个姓崔的小伙子，他在跳车的同时大喊着：“乡亲们！咱们下世再见吧！”随着叫喊声，他钻出了车窗。由于乡下人跳车没有经验，又过于紧张，一只脚挂在了窗口，带的风呜呜作响，叫人发痒。这个人被活活摔死了。车厢里的劳工一阵混乱，见人们都红了眼，鬼子队长下了命令：“三宾的给，死啦死啦的没关系”。伪军扬起木棒见人就打。鬼子兵端着带刺刀的三八大枪大声嚎叫，人们都被打得趴在地板上，后来又叫劳工们倒背手趴着，这样还不放心，于是把我们一个个塞进座位底下，稍一动弹，不是枪托，就是棍棒。这一趴就是八九个小时。第二天天亮才知道到了天津大沽口劳工集中营转运站。这年，我才十八岁。

### 大沽口集中营

到了大沽口火车站，在车厢里趴了一夜的劳工们，没有吃饭，也没有水喝。下火车时，不用说走路连说话的气力也没有了。鬼子兵和狗汉奸手里的棍棒象雨点般的打在劳工的身上。劳工们无精打采的趑趄趑趄地被驱赶着走进了一个大敞棚。人们歪倒在地，默默地喘着粗气，只听到苍蝇嗡嗡叫声。劳工们面如黄纸，一个个眼泡红肿着，布满了血系。

我们在敞棚里喘息未定，鬼子兵、伪军又如狼似虎的冲了进来，让我们把衣服脱的一千二净，把仅有的一点点钱物通通地搜光，赤身去另一个棚子里换衣服。日伪军用大木棒点着数，我们都一瘸一拐的小跑着，心想：一切都完了。我们都换上了青一色黑色囚服。

大沽口劳工转运站建在一块茫茫的大海滩上，由于海洋性气候的影响，经常雾气沼沼。这里没有鸡啼，没有乡村的炊烟，只有日伪军林立的岗哨象幽魂一样，在海滩上来回游荡。集中营关押的数千名劳工，隔几天就运往日本一批。

日寇为了防止劳工逃跑，一是换上青一色的囚服；二是实行饥饿政策。劳工们每人每天只发给四个发了霉的杂合面蒸饼子，一块老咸菜，每天下午供一次江里挑来的咸水喝。人们见到水，蜂拥而上，由于人多拥挤，多数人喝不到水。在那七、八月的天气里，太阳一露面火辣辣地烤人，隐入云层，闷的蒸人，只有下雨天好受些。我们这些庄稼人，过去喝水随便惯了，第一次尝到了挨渴的滋味。在那迈步苍蝇嗡嗡作响的土地上，哪管地上的蛆虫在蠕动，哪管沉渣在飘浮。我们用手拨拉拨拉就捧水喝。由于饥饿，加上喝脏水，不少人患了肠炎、痢疾等症，处处可见躺着的活人。到了晚上蚊虫细叫汇成了一个声，让人无法入睡。那时只要见到病人身上爬满苍蝇，日伪军不管是死是活，抬起来就走，扔进大江里喂鱼。我亲眼看见，在这十几天的时间里，平均每天都有二三十个劳工顺水东流，葬入鱼腹。

我也是差一点喂鱼的。我们到集中营的时候，由于七、八天的折磨、摧残，我又抢不到水喝。一天下午，姜兴齐抢水时有意把衣服沾湿，回来拧给我口水喝。我嗓子冒火，嘴唇干裂，头晕眼黑，心想：没水喝，比没有饭吃厉害得多。这样，怎么能活下去呢？想来想去，只有一条路，去江边找水。白天岗哨林立不能去，耐心等到天黑吧。好不容易等到了天黑，我跟老乡姜兴齐、宋合商量，去江边找水。他俩同情地说：“现在只有这个办法，但我们也听说，常有人去江边找水喝，被乱枪打死，太危险。”我擦着干涩的眼睛，嘶哑着嗓子哭泣着，用手拉他俩的双臂，晃荡着身躯央求说：“我快要渴死了，你们就这样看着我死吗？”他们看我这十几岁的孩子实在可怜，沉默了一会儿，姜兴齐轻轻地说：“我比你大几岁，论乡亲我是你大哥，你有了难处，我能不管吗？况且咱们出门在外，谁是亲人？”说着眼泪就流下来了。他俩发誓说：“咱们虽说不是亲

兄弟，但我们比亲兄弟都亲哪，我们死也死一起！”最后决定冒险找水。

集中营的江边，每隔几十米，就有一个日伪军岗哨，他们荷枪实弹，象幽灵一样，踩着沙滩的石子，沙沙作响。我们偷偷地钻出了工棚，在草地中步行一段后，又贴在地上爬，肚皮都磨破了，爬到半路上，我突然觉得头轰的一下就不醒人事了。他俩见我不动了，围在我身边小声叫着：“小董！醒醒。”待我苏醒之后，又继续爬。到江边了，看了看左右没有动静，我用捡到的半个钢盔，一连喝了三半下。当时觉得心里很痛快，真解渴，本想往回带些水，以备再用，可惜没有家具。我们轮换着喝完水，在返回的路上，肚子胀得可受不了啦。待我们爬到距工棚不远的地方，就再也爬不动了。老宋，老姜好不容易把我架回了工棚。我肚子涨得象鼓，疼痛难忍，他们给我揉肚子、抠嘴，想办法使我呕吐，泄肚。但都无济于事。我张着嘴，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这时已经是深夜了，肚子突然咕咕地叫起来，随后就是泄肚不止。我不愿打扰别人，自己爬出了工棚，在泥浆里半卧着，不能动弹。后来乡亲们醒来见我还没有回工棚，老姜就带人找到我，把我抬回工棚，但我还是渴的难熬，张着嘴说不出话来。宋合忽然想了个好主意，把地下挖了个小坑、把地上的脏水过滤一下，给我泡饼子吃。当时对我来说，是最好的流食了。就这样，在乡亲们的精心照料下，我一连躺了五、六天，病情有了好转，能站起来了，熬过了喂鱼的这一关。

## 海上冤魂

八月的一天下午，听大家议论着，我们这批人要送日本了，说重病号一个也不要，怕给他们找麻烦。我在工棚另舂一半躺卧着，暗暗地想着：刚刚熬过了喂鱼关，要是留在这茫茫的海滩，甭说我这个病号，好人也得饿死病死。大家都担心我怎么办，苦苦地想着办法。

上轮船那天，我心里没有底，强打精神迈着沉重的步子。几位乡亲把我夹在中间，我缩着头，生怕查出来，随着乱哄哄的人流，被裹入了轮船的甲板上。一声长笛，轮船开动了，劳工们望着渐渐远去的国土，生离死别的家乡，一个个低下了头，自言自语地磨叨着：我的家乡啊！祖国啊！我的母亲，虽然暂时离开了您，但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您。当时，有不少的人都哭了。

我们从大沽口劳工集中营转运站，到日本下关，在这三天里，每人每天只发给两茶碗爆玉米花，一块咸菜，渴了喝凉水。吃完了爆米花，就啃咸菜。有病的人在呻吟，无病的人也饿得哼哼，分不清那个是病号。因此，轮船上常常死人，每死一个人都会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和恐惧。我亲眼看到前后有四名劳工病号捆在装有沙石的麻袋上，扔进了大海里。使我记忆最深的有一个姓刘的大个子，三十左右岁，是一个穷苦的工人，他那消瘦的方脸上，长着浓眉大眼，后来才知道他是在保定大街上排队买混合面时被抓的劳工，原来他身体很粗壮，在大沽口因缺食少水，染上了肠炎病。上轮船的第二天，他终于躺倒了。当乡亲们围上去看他时，嘴里还断断续续地念叨着：“我还能活吗？救救我吧，我家上有七十二岁的老娘，下有妻儿老小，我的儿子刚三岁啊！他们还等着我回去养活啊……”船上的日本人都躲他远远的，也不给他药吃，反而强迫人们把大刘从船仓抬上甲板，可怜的大刘还在不断呻吟着，嘴里还在叨叨着什么，就把装有沙石的麻袋捆帮在大刘的背上，扔进了波涛汹涌的太平洋里。劳工们耳闻目睹这一幕幕的惨剧，不寒而慄，毛骨耸然。尤其是我更是惊恐万状，提心吊胆。心里总是在想：说不定下一个扔进大海的就是我了，我越想越难过，就象做梦似的。

## 挣扎在死亡线上

我们在轮船上渡过了三天三夜，到达了日本国的下关，转火车途径东京、函馆等地到达了北海道的下芦别。河北、河南两地劳工共八百多人，住在一个大山洼里。从此，我们又向地狱迈进了一步。

劳工们每天只给半斤橡子面吃，说是面，实际还不如猪饲料，日本工头还千方百计克扣，亲日派大队长马德山讲：“大日本帝国太君说了，我们是劳工，苦劳的干活。我们是给日本国干活来了，日中亲善，大日本打了几年仗，粮食缺少。一天给我们半斤粮食，日本国民也不多，我们应该够吃。”真是一副典型的奴才相，令人可憎。

我国的山里人过去把橡子当作猪饲料，我们吃的这类橡子面，虽然加上了玉米面，但还是苦的发涩，多数人吃下后胃痛、泄肚，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这还是维持生命的唯一希望，所以人们吃饭的时候，总是吃得慢一点，大家给橡子面饽饽起了个绰号——洋点心。

严酷的环境，苦涩的橡子面，病号急剧增加，工棚里躺满了病号。我的肠炎病越来越重了，连那点“洋点心”也吃不下去了。日本工头把我们八个重病号判了死刑扔进一个偏僻的小房子里，进行所谓的隔离治疗。我们个个面黄肌瘦，骨瘦如柴，没有一个能站起来走路的。

一天早晨，工友吴小春突然搂住我的大腿声音微弱地对我说：“我的亲兄弟呀！日本鬼子可把咱们给治苦了，这是成心不让咱们活下去呀！日本帝国主义拿我们不当人看待。我今年刚刚二十岁……”他上气不接下气越说声音越小，全身还哆哆嗦嗦的，我看他非常难过。他闭着双眼，无力地叫着：“娘！你养我一生，我没有报答您什么，我见不到您啦……”他的嘴角动了动，闭上了眼睛。我们活着的七个人，不由得紧围在一起。我紧紧抱住小春的头，瞪着我那干瘪的眼睛，使尽全身的力气叫着：“小春啊！小春——你再睁开眼睛看看你的老乡吧！可是他已经含着对亲人的思念，对敌人的仇恨，永远离开了人世。仅仅七、八天的时间里，其他的六位工友也陆续死去。他们的尸体装入白白的木箱，送入下芦别火化厂。最后只有我一个人活下来。

我在那空荡荡的恐怖的小屋里，爬来爬去，整天胡思，想来想去又睡着了。有一次睡梦中，我跟前围了很多人，乡亲们流着眼泪，说我死的可惜，他们把我装入木箱，还听到了钉木箱子叮叮当当的声音，自己也觉得忽忽悠悠地好似抬进火化厂，急得我大叫一声。醒来后，惊出一身冷汗，才知道自己在做梦，看了看屋子里没有任何人，周围也没有任何动静。只觉得两耳呜呜作响，不自觉地摸摸胳膊，皮包着骨头。摸摸肚皮，瘦瘦的，饿得前心贴着后心，摸摸大腿，又瘦又长。为了熬过那漫长的昼夜，我想着家乡的亲人，也极力追忆着往事：曾记得十三岁那年，娘外出讨饭，她舍不得吃，讨来稀的舍不得自己吃，省下干粮给我吃，那一小块一小块的多样干粮；回忆着它的香味，那是多么慈祥的母亲啊。我又想起了，给地主扛长活时，一顿饭吃十六个窝头，吃饱了饭劲头可大啦，双手搬碌碡，那时人们叫我大力士。想来想去，好像自己又有了劲似的，身不由己地爬了几下，但也没爬起来，长叹了一口气，咳！普天下的人再也没有我苦的人，给自己打着问号，是否还能继续活下去……

我所以有今天，是因为我们老乡宋合给劳工做饭，吃饭随便些，他宁可多喝稀汤，把节省下来的干粮，偷偷地送给我吃，还经常叮嘱我，要活下去，以后会有好日子过……”听了他的话，我很受启发，觉得自己还年轻，挺得住。有时腹疼，头疼，渴饿交加也不悲观，只有一个念头，无论如何也得活下去。

### 索命的严冬

北海道的下芦别，位于日本的西北部山区，夏秋时节经常阴雨连绵，雾气沼沼不见天日。人们穿的衣服每天都水淋淋的。最可怕最难熬的就是那朔风刺骨的严冬。

进入10月份了，劳工们御寒的还是那两套再生布单衣，脚上穿的露大脚指的胶鞋（大家都叫它丫巴鞋），一项挂电池灯的单帽，两条旧棉毯。这就是劳工们的全部家当了。住地在距煤窑二十多华里的山沟里，工时每天长达十五、六小时。劳工们饥不择食，特别是在夏季里，什么野葱、野蒜、野果、山葡萄叶等，只要能入口的东西，抓起来就吃。

日本北海道的煤窑，更有它的特色。窑洞里的水滴滴嗒嗒，衣服湿了没有替换，一出窑口立刻结成冰甲，矿灯帽下面是两块棉毯片护耳，冻结后，就像两把扇子，风一吹，呱嗒呱嗒地作响，扇得两耳生疼，两条棉毯成了宝物，它既是被褥，又是全身的衣服。两脚两腿全缠的是烂布条和单绳，草袋子片，行动带风，走在山间小路上嘎吱嘎吱乱响。难熬的十几个小时过后，人们又困又累又饿，浑身散了架似的，还要走二十多里坎坷不平的山路。山高，坡陡，路滑。一不小心，滚下悬崖，陡坡，连爬起来的力气也没有。若不相互救助，只有冻饿而死。

上下班途经的七座山坡，最让人望而生畏其中一处“望鬼台”、三处“独木桥”。“望鬼台”位于山间羊肠小道儿上的制高点，坡陡八、九十度，涧深一百余米。我知道，这个地方先后有两人被摔死，六十余人被摔伤，上下班时，谁先到‘望鬼台’，都要胆战心惊。“独木桥”就是把四、五公分的木板，纵连在一起架在深沟上的简易桥，夏天还可以走，一到冬天，就比较难了，由于积雪冻结成冰，水沟积雪往往有四、五米深，人若掉下去，就会砸成一个雪井。如果无力爬上沟沿，只能坐以待毙。

1944年底的一天，我下夜班，从煤窑走出洞口，冻得我瑟瑟发抖。没有搭上下山的工友，害怕一人下山不保险，我又跑回了窑洞，想在窑洞里暖和会儿，天亮搭伴再走。谁知刚进去不久，就被日本工头连打带骂地哄了出来。当时气温在零下三、四十度，寒风刺骨、无处躲藏。我好似热锅的蚂蚁，踱来踱去，无可奈何，只好下山。这时天还没有亮，我找到两根木棍，又在脚下缠了些草绳，吃了两口白雪，稍微镇静了一下，提起木棍就下山了。我上山就爬，下山就滑，在“望鬼台”幸而脱险，而在“独木桥”却又险些丧生。

在“独木桥”上，我两眼一阵阵发黑，两腿发软，脚上的草绳冻成了冰碴子，站在“独木桥”前就发怵。我不大自然地弯下腰，长叹一口气；趴在“独木桥”上，一手拨雪，一手按住木板，哆哆嗦嗦地往前爬，二十多米长的桥，足足爬了十几分钟，眼看就要到对面沟沿了，南山坡突然轰的一声，积雪塌方了，铺天盖地的雪团落在我不远的地方，使我惊呆了。我身体失去了平衡，一打晃掉进了深沟。

雪是白白的，松软的，从几十米掉下去，砸出一个七、八尺深的坑，幸而没有受伤。这时我想起老人们说的：无论遇到多冷的天气和恶劣的环境，只要身体不停地活动就有救儿。因此，我就用木棍不停地扒拉雪块，踩在脚下，我刨啊刨啊，总算坑口变大了，天地开阔了。可是，全身一点儿劲也没有了。这时，我朦朦胧胧地听到远处有嚓嚓的脚步声。熟悉的河北、河南口音越走越近。顿时一股暖流涌遍了全身，我用了最大的劲喊了一声：“老乡们！来救救我吧！我是一百七十七号。”第一个答话的是一位河南劳工。随后何老头、史雨子等七、八名劳工迅速过来，绕道来到我的身边，把我拖上深沟。他们有的解下御寒的草袋片，有的把披着的破棉毯给我裹上，轮流着拉呀抬呀，把我运回了住地。由于工友们的百般体贴、照料，几小时后，我得救了。现在回想起来，假如没有遇到我们的工友，没有劳工们的阶级深情，说不定我早就埋在九泉之下了。全国解放后，当我们集中在一起回首往事，总是有说不完的话，诉不完的苦，流不尽的泪。

### 劳工血泪

1944年12月份，在下芦别劳工大院发生了一起迫害劳工的骇人听闻事件。一天晚上，老乡姜兴齐早晨上工时，把发给他的午饭——两个橡子面馒头零着吃了，到下班时已经是一天没有吃东西，完工后勉强走向住地，饿得他上气不接下气了，正想出去找点吃的，他见到伙房刚下屉的馒头，伸手抓起两个，几口就吞食下去了。被日本工头“大洋马”知道了。他连夜把全体劳工召集到劳工大院。劳工站在房根雪地里，七、八个日本人把老姜拉到院中，把他的衣服扒光，强迫他跪在二尺多深的雪地上。“大洋马”狞笑着审问：“你的米吸大大的顶好？”姜兴齐牙咬的咯咯直响，哆哆嗦嗦地手指着肚子说：“我…我…我饿呀。”后来见到他嘴直动，却说不出话来。劳工们目睹同伴受尽侮辱，都感到无比愤怒和难过。几百名劳工不谋而合的用嘶哑的

声音为其求情：“饶了一百七十九号吧?!”见老姜不能说话了，“大洋马”令一个日本工头，手持树条狠狠地抽打他，逼老姜在院子里跑着转圈，其他的日本人用铁锹往人身上扬雪取乐。院内不时地发出一阵阵的狂笑。开始老姜身上冒着热气，跑着跑着，跌倒在地失去了知觉，看了这惨不忍睹的场景，年岁大的劳工小声议论着：“他们真没有人性。”狠心的豺狼们，见老姜已经休克了，让人把老姜抬到浴池暖和，待他苏醒后，又弄回雪地驱赶，扬雪取乐，连续折磨两次。最后，他再也爬不起来了。后来经过大家的照料，才活下来。但从此得了严重的关节炎病，有时连身都不能翻。在我们的护理下，他后来能架拐走了。就在姜兴齐能扔下拐杖走路的时候，汉奸大队长马德山（外号马二闫王），按照大洋马的旨意，硬逼他下煤窑干活，马二闫王说：“太君说了，你不是好人，是小偷的干活；不下窑不给饭吃。”无耐，他只好拄上单拐，一瘸一拐地上山了。他每天早去晚归，累得死去活来，非常可怜。在他下井干活的第七天，煤窑突然塌方，工友们随跑随喊：“塌方了！快跑！”腿脚灵便的都躲开了，姜兴齐也听了清清楚楚，但他无力迅速躲开，下半身压在了一块岩石下，砸成粉碎性骨折，昏死过去。经治疗才免一死。大家想：这回老姜该住医院了，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医务所只简单包扎一下，给了点止痛药片，让人把他抬回了住地，放到了一个偏僻小屋了了事。除当炊事员的老乡宋合按规定一天送顿饭外，再也没有人管他。

老姜被砸伤以后，疼痛难忍，不能动弹，每天躺在屋里爹呀妈呀地哭叫，只有我们几个老乡，每天下工后去看他，给他端水，送饭，清理床铺，给他翻身，背去上厕所，他每天见到我们的时候，都大哭不止。泪水哭干了，谁有什么办法呢，我们的心情都非常沉重，含着眼泪，也不敢当着他的面哭出声来。他咬着牙，声音嘶哑地断断续续地说：“我的一切都完了，这都是日本帝国主义造成的。我有国不能靠，有家不能回，我总想跟他们拼个你死我活，报我一箭之仇，现在连拼命的力量也没有了，我这次算完了，给我找把刀子，快点叫我死了吧！大家知道他不行了，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耐心地劝说他，给他聊家常，开导他：“你虽然一条腿坏了，可你是个手巧的人，回家后还可以干点坐着的活，千万不要走绝路。谈到他的妻子儿女，特别讲到他儿子姜国玺，说不定咱们家乡的共产党八路军已经胜利了，也许你儿子姜国玺已经当上八路军的首长了，待日本投降后，我们回到祖国，你家的孙子也会叫爷爷了。咱们套上你家的小驴车，去保定痛痛快快地逛它几天，可是，精神治疗，只能起到暂时作用，是治不了病的。他的伤腿一天比一天严重，伤口流着紫红的浓水，纱布已变成了一块紫黑的铁板。他抱着自己的大腿，咧着大嘴叫着：“你们快叫我死了吧！死了就不受罪了，我的亲人啊”。

我们多次去找汉奸马大队长，要求给予治疗，他答应请示日本工头。日本工头也知道老姜是已经“判了死刑”的人了，但他们一直置之不理，没有医药，没有护理，没有营养，伤口一天天恶化，疼痛难忍，不时出现昏迷。

一天，我下班后去看他，一进门就觉得和往常不同。老姜死死盯住我，后来他突然拉住我的手无力地对我说：“你哥哥我不行了，你若能回国的话，替我告诉我的儿子和所有的中国人，叫他们忠于共产党，参加八路军，团结起来，狠狠地打日本鬼子那狗娘养的，宁死不当亡国奴啊！”我俩悲愤交加，哭做一团。突然，一只大手搭在我的肩膀上，严厉地说：“一百七十七号，不能叫老姜太难过了，他身体顶不住啊！要多安慰他。”待我回头一看，原来是李老头和史雨子等人。李老头看到我俩泪人似的，他也老泪纵横了，后来也止不住呜呜地哭了起来，并大骂道：“狗娘养的小日本鬼子，我们劳工不如煤窑上拉斗车的牛马。我们一天也没有吃过饱饭啊！他妈的，干活不给饭吃。工伤不给治疗，还有一点人性吗？”后来李老头把我叫到外边小声说：“老姜是不行了，我们还要活着。咱们一天不上班也不行。”这天，我们很晚才离去。

第二天上午，在劳工的一再要求下，日本工头才答应把老姜送下芦别一家医疗部门。临去前，老姜已经奄奄一息。据抬送老姜的劳工们说：“我们往外抬他的时候，他的腿已经烂了，浓血流了一地，臭气熏人。一路上也未听到他喊叫，我们把他直接抬到医院里的手术台上。名曰截肢，实为屠杀。姜兴齐很快就入了火化场。”

当我下班回来，打听老姜消息的时候，竟是见到一个白花花的木板骨灰盒。我大哭一场，久久难离。姜兴齐在日本下芦别，受的迫害太深，死得太惨了。每当我回忆起死去的劳工，总是不由得一阵阵心酸，一串串热泪。

## 愤怒的烈火

我们每天在窑里干活十几小时，不是打眼、放炮，就是推斗子车，下顶木。累得死去活来。即使这样，日本人还嫌从我们身上榨的血汁不够。为了严格控制劳工，每三、五人一班，必有一个日本工头监工。这些人一不顺心，不是拳打脚踢，就是镐把，钢钎痛打。劳工们整天吓得哆哆嗦嗦的，不敢抬头直腰。每当从煤窑里出来，都是抱着膀，弯着腰，个个跟木桩子一样，只有眼珠转动和双腿移动时，才使人感到是一个活人。

一天，我下工后，在路边拔野菜吃，被那个“大洋马”看见了。他见我吞食野菜，就瞪着双眼问道：“苦拉！安达？米吸米吸的有。”我想：你们不给饭吃，吃点野菜充饥，我也没偷没摸，还有什么不对的？于是，我没有好气地絮叨着：“你们有大米白面吃，我愿吃这些东西”。他虽然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但从表情上也能看出我掩饰不住的怒火。他那马脸拉的很长，咬着牙，把我摔倒，抡起手中的木棍，没头没尾地打一通。一面打一面依里哇啦地吼叫着，打得我鼻青脸肿。

我的肠炎病始终没有痊愈，时好时坏，同时又染上了疥疮。一天，肠炎病又发作了，一夜吐泄不止，全身松散无力。请假也不准，就这样一歪一斜地上工了，恰巧这天又赶上日本工头“四眼活阎王”通称小眼镜代班，他叫大家扛木板子。我一听就傻眼了。我走向木板堆，摸摸那厚厚的木板，块块都死沉死沉的。工友们怕挨打很快扛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站在那呆呆地发愁，找人帮忙吧，早已没人了，我强打精神，使尽全力，好不容易扛起一块，“小眼镜”早就盯上了我。我跟踉跄跄地走着，他嫌我走得太慢，一面狂叫，他不时地用硬木棍打着我的后肩，打我的身上，还打我的脑袋。这时我无限的怒火涌上心头，但又尽力忍着。我想：若不叫我活下去，你也甭想活，等机会你我一块去见阎王爷。我下了决心，等待时机，好不容易接近“望鬼台”了。他的木棍还在不停地打在我的头上。这时我咬紧牙关，憋足了劲儿，猛一晃身，将木板向“小眼镜”砸去，很遗憾，他一躲躲过去，木板滑到坡下，这时转眼间我就势闭眼抱头，滚下七、八十米的陡坡。

当我昏昏沉沉往下滚的瞬间，隐隐约约地听到工友们在喊：“老乡啊，可不能这么死啊，这么死太冤枉了。”后来迷迷糊糊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苏醒后，山沟里没有一个人，只有呼呼的山风和皑皑的白雪，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才听到脚步声音。老乡小李富带着工友绕山来搭救我。边找边大声喊着：“一百七十七号！你在哪里？”我虽然听到了喊声，但无力答话。他们踏着一尺多深的积雪，吵吵嚷嚷地四处寻找，当小魏（此人是一百八十号，保定城里人）发现我，立即把我抱在怀里。我睁眼一看，周围积雪融化了不少，衣服全湿了。大家来到我跟前，问长问短，我只是无力地点着头。

工友们轮流背我。前边背着，后边搭着我的脚。他们亲切地问我：“摔坏了没有，好点了吗？”尽管有面孔很陌生，但那一双双深情的眼睛，使我深深地体会到，还是中国人好，还是骨肉同胞亲。

工友们绕过弯曲的小路，费了好大力气，才把我背回工地。这时“四眼活阎王”又回来了，他举着木棍把工友们打散，嘴还不停地哇啦哇啦地怪叫，我迷迷糊糊的见他走近我，接着就觉得热呼呼的鲜血流到我脸上。眼一阵发黑，什么也不知道了。待我醒来后，工友们把我搀到住地。小眼镜已告诉了“大洋马”，晚上不给饭吃，只让喝两碗米汤。我头部和全身满是伤痕，不能上班了。当时，我只有一个信念，无论多残酷，只要能活下去，我决不死去。为了活下去，我到处找野菜，瓜皮，还吃臭沟里的菜叶，鱼头等物。夜里还摸到日本库房里去吃干大米，咸菜，生倭瓜。有天晚上，我打开木门，进入日本库房，黑呼呼的没有摸到别的吃的，只找到一个老菱瓜，我搬到外边，狼吞虎咽地全吃了。我整天爬呀转呀，到处找食物吃。工友们吃饭

时还把仅有的那点口粮紧出些给我吃。我记忆较深的一次是向朝鲜的劳工要过米饭吃。数量虽少，但比金子还重要啊。日本工头想把我饿死，折磨死。但是，我有顽强的毅力，坚强的信念，我要想尽一切办法活下去，我要活着回到我可爱的祖国，返回家乡和家人团聚，重见光明。

### 历史的见证

在二年多当劳工的苦难岁月里，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染有肠炎，疥疮病。此外，每个人的身上都留下了累累的伤疤。我身上最明显的伤痕就有十几处，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欠下我国人民的罪证。下芦别的严寒冬季，劳工们的腿上脚上，都缠着烂纸片，草袋子片等，走起路来一瘸一拐，一歪一斜。好象一群残废了的老头。

冬天，我们的手脚经常冻得失去知觉。只有吃饭时候，才能围在一起烤堆火。只觉得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无奈只得不停地原地踏步。有人把脚伸入火堆，当时不觉热，恢复知觉后，疼得人们含着眼泪跳着脚蹦，又把腿伸向雪堆里。所以，劳工身上的冻伤、烧伤不断出现。日本工头经常打人打得死去活来。工地不断发生工伤、死人事故。每个劳工的身上，都有各种不同的伤疤。

在下芦别有三个国家的劳工。美国的劳工，最少有两千余人，劳动时由全副武装的日本兵看押，朝鲜的劳工分两种情况，一是管理较松的劳工，劳动比较随便，二是管理得较严，和中国的劳工相似，劳动时由日本工头监督，跟中国劳工不一样的地方是：一到夏天，可以赤身露体，大多数前后胸和胳膊均有刺字或龙马图象符号，个别的还有的刺在头面部上。

中国劳工连牛马都不如，连叫个名字的权利都没有，在二年多的生活中，人们只知道我是一百七十七号，很少人知道我名字。在下芦别受死难的一百多人中，饮恨长眠的中国人，多数不知道名字，更不知道他们的家乡。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史，是永远也抹杀不了的。

### 中国人民的胜利

1945年8月15日，伟大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八年抗日战争，取得了彻底的胜利，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了。

中国的劳工居住在偏僻的山沟里，消息闭塞，我们每天还在下窑干活。一天，我们发现日本代班的工头明显减少了，特别是过去打骂劳工最利害的“小眼镜”一类的日本工头几天不见了，留下来的工头也不象过去那么神气了，这是什么原因，我们还蒙在鼓里。有个劳工问那人称“老鸨”的日本小工头，他只是伸出大拇指，不好意思地说：“希那(中国)的大大的”，后又伸出小拇指说：“尼宏(日本)的小小的，你的太君的。”这个消息很快传到全大队，大家分析，可能是日本投降了。

一天，工头们突然逃之夭夭，一个也不见了。大家还和往常一样干活，中午休息时，在工地相互串通议论，猜测着。下午基本没有干活，很早就下班了。回到住地一看，劳工总管“大洋马”也不见了，从此，大家也不去劳动了，聚集在劳工大院里，仨一群，俩一伙地谈论着国家大事，有的在地上躺卧着，有的架着双拐，也敢到大院里来转了；有的扶着木板墙走着，有的哼着曲。大院里乱哄哄的，就象刚出笼的小鸟，表现出那种初见天日的喜悦。真是解放了，这天晚上，我们很晚才入睡，还有一夜未眠。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就有部分劳工起床。他们敲着饭盒，敲着铁桶，奏起胜利的音乐，唱起胜利的凯歌。后来大家找到炊事班孙田同志，让他把日本人禁止我们吃的食物都拿出来，来一次胜利的会餐。在吃饭时，我们班里，不知谁喊了一声：“会餐开始！”班长栾明勤喊道：“我们每人倒一碗米汤，以汤当酒，以面片当菜，为了庆祝我们的自由和祖国的胜利干杯！”当时的场面热闹极了。这天天气特别明朗，是几年来没有过的。大

家吃完早饭，又聚集在大院里。大概是十点左右，从外地来了几个中国人，他们操着山东口音，向劳工队部走去，不少的劳工也随后跟了过去，他们通报了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中国胜利的消息。场上顿时沸腾起来，掌声雷动。劳工们的脸上个个浮现出了笑容。大家蹦呀、跳呀，我们河北的劳工，还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歌曲：“民国二六年，华北起浪烟，小小的日本来到我这边，搅扰了我中原，死了多少人，死的我好伤心……”

大家高兴之余，尽情地谈论我们还在异国他乡，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呢？而且，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吃的、穿的、摘掉紧箍咒，保住生命，达到回国的目的。这样，大家自然想到的是选出带头人。有个工友提出一个姓王的胖子，另一个人说，这个人好，他当过八路军，可能是共产党员，大家越议越欢，人越集越多，群众自发起来了。七嘴八舌地嚷嚷着，后来议题转向了大队长马德山，控诉了他那亲日派的罪行和打骂劳工的问题。一个小伙子转身把马德山拉到大院，劳工们你一言我一语乱哄哄地控诉和揭发了他的罪行，他象一只落水狗向大家作揖求饶，连连认罪。

后来选出王胖子为劳工队的头头，大家把王胖子请来。他也提出几个助手，大家都表示同意。接着就是派人出去串联，了解情况。打这以后，我们了解到下芦别不但有中国劳工存在，还有朝鲜和美国的若干劳工。美国的劳工很快回国了。中朝劳工还没有人理睬。我们吃的仍然是橡子面，生活在苦难之中，两国劳工不谋而合地组织起来，每天在矿办事机关门口要求解决吃的，穿的，住的问题。因此，日本矿工头头看形势不好，有的隐蔽了，有的逃之夭夭，几天不露面，劳工们在第二“安全坑”办公机关门口整天吵吵嚷嚷。有不少日本人在那看热闹或在里边插手。事情发展到第四天头，发生了一场震动下芦别的几千人的异国人的武斗流血事件，死伤十余人。

由于受到非人待遇，劳工前后死伤二百多人，约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我们这些劳工，为日本凿了两座煤窑，生产出来的煤堆积如山。但是，每月发给我们的日本纸币，总共不过三元钱。

### 回国路上

经过劳工们的艰苦奋斗，我们从一个大山凹子里，搬到了下芦别的一座两层小楼里，粗糙的饭食能吃饱了，但劳工们还是穿着破烂不堪的劳工服，严寒地区单衣是难以过冬的，又经过多次交涉，才把日本兵穿过的旧军服和部分便服发给了我们，这才使大家觉得好一些。之后，我们在日本又呆了一段时间。

1945年12月下旬的一天，得知回国的通知。胖子队长讲，“我们跟日本政府提出的工资问题和赔偿经济损失等问题，没有答复我们的要求，问题没有解决，不能再等了，保留我们的意见，咱们还是先回国，今后的事回国家交涉处理。”最后，又讲了回家路上注意事项等，就散会了。

这天晚上，我们一夜没有睡觉，大家有说不完的话，诉不完的苦，还谈了很多回国后的设想。聊着聊着，大家突然想起死去的工友们，我们均去寻找死去老乡的骨灰盒。当我找到姜兴齐骨灰盒时，想到的是他死去的惨象，我把骨灰盒抱在怀里，不由地想起；我那可爱的老乡啊，如今你落到如此地步，回国后，我怎么向娘俩交待呀！当我把它恭恭敬敬地抱回宿舍时，这已经是第三个骨灰盒了。

第二天下午约一点多钟，劳工们带着干粮和破旧的行李，离开了北海道下芦别这块鬼地，登上了开往涵馆的列车。当我们登上火车的时候，还有不少的群众，给我们送行，向我们招手致意。

我们穿过了日本的涵馆、东京、下关、九州、神户、大竹等地到达日本南部的一个海码头。在这三天的旅程中，亲眼见到了日本国战败的残景，目睹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东京、神户被美国原子弹炸毁的现场。大家在火车上纷纷议论着这场战争，谈论着我们骨肉同胞的遭遇。

我们登上了开往中国的轮船，劳工们的心情更加喜悦和激动，大家都很少休息，不是看海景，就是交谈。一路上互相庆幸，相互交谈回家后的志愿。我想：一定立志走革命道路，不能再当亡国奴。我抱着姜兴齐的

骨灰盒，绕过了日本海，太平洋，朝鲜海等海域，漂泊了七天七夜，到达了我们的祖国大沽口，当我走下轮船时，见到什么都新鲜，都可爱，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 命运的选择

我们从大沽口坐上去天津的火车，听传达，到天津后，每人发给“金圆券”一千元（当时只能买面粮两袋）。我们万万没有想到这是一计。谁知，我们踏上国土，高兴得嘴还没有合上，国民党反动派又要发动内战，劳工们刚下火车，国民党开始抓兵。我想：几年来，我们吃了那么多的苦处，洋罪也受够了，还没有回家看看，就抓我们去当炮灰！我的决心已定，决不去当国民党兵，拿枪打八路军！当时思想斗争非常激烈。我怎么办？这关系到我的前途命运的大问题。我突然想起身上的疥疮，使劲地把手上、身上抓破，顿时鲜血滴滴嗒嗒地流。两个国民党官，从老远见了我，用手指着我说：“这小子够棒的，是个兵料”。接着两个兵上来拉我，我低声说：“我不够条件，满身都是疥疮，手上再说，你们都见到了，疥疮都连了裆了。在日本国几年都没有干活，走不了路”。又上来两个背冲锋枪的，好象是班长，拉着我走，我使劲趴在地上，两个拖着我走。后边两个扛步枪的用枪托戳我腿和屁股，我咬着牙，就是不起来。看到我真象病人，两个当官的说：“不要他了，兵料还有，滚蛋！”

我偷眼见到把史景友拉了出来，见到他们集合跑步进兵营了，才带着我的东西和姜兴齐的骨灰盒慢慢地爬。待我见到四周没有国民党军队了，我背起行李，手提骨灰盒，跑出了大院门口，雇了一辆人力车。拉往天津北站，坐上了开往保定的火车，我总算逃过了抓兵的这一关。

1946年初的一天下午，我下了火车，步行四十余里，回到了久别的家乡，所见到一切都觉得亲切，到了家门口，我像小孩似的大喊了一声：“娘！”他老人家头发也白了许多，面颊增添了无数的皱纹。我双手扑了过去，“娘！您受苦了。”娘瞪着昏花的眼睛，直楞楞地望着我，半晌才说出话来：“我不是做梦吧？”“娘！真是我。”她擦了擦眼说：“你走后，我听说到了保定装上了闷子车，日本人怕中国人逃跑，都给闷死了。你真的还活着？”她哽咽着，“娘——娘！见到我应该高兴，您干吗哭啊！我真的还活着呀。”她说：“你走后，我多次做梦，说是你回来了。可醒来，却是做梦，娘想你都想疯了，我见外边来人就打听你！”娘又摸了摸我的头，见了我腿上九岁时玻璃扎的伤疤，才放了心。

### 踏上革命征途

自回村后，经常与老友谈论革命的前途，他们已经是村干部了。春上，参加了民兵组织。当时的民兵是半脱产整天站岗，放哨，巡逻，配合土改，打击小股伪军，配合攻碉堡等任务。1948年我又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参战十余次，在解放保定战斗中荣立战功一次。1958年转业在公安战线工作，曾多次受奖。现已离休，还在社会上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发挥我的光和热。我自幼乞讨要饭，扛长工，当劳工，度过了小半生的苦难岁月。后半生之所以幸福美满，是党领导的结果，我永生不忘党的恩情。

（《房山文史资料》第5辑）

作者系原房山公安分局干部

## 龙宝峪惨案

赵润东

1938年2月18日,盘据在房山县城内的日本侵略军(据说在乔本指挥下),出动大批人马,突然从村东老牛沟北山扑向龙宝峪村。他们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制造了有名的龙宝峪惨案。

龙宝峪村位于房山城西8公里的群山之中。“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侵略军占领房山大部村镇。所到之处,烧杀淫掠,其累累暴行激起了人民的极大愤慨。当时,国难当头,各地方武装蜂拥而起。号称三路司令的胡振海(外号胡嘎吧)下属炮兵大队大队长寇大胡子率部驻在龙宝峪村,这里四面环山,难攻易守。登上山顶,居高临下,可与房山遥遥相望。为了骚扰日军,寇大胡子命令手下人每天都要冲着驻扎在房山山顶庙的日军打几炮,不让鬼子安宁。日子久了,日本侵略军断定“老便”的主力部队就住在龙宝峪一带。

2月18日早晨八点来钟,日本鬼子全副武装,由伪军配合,汉奸引路,径直朝龙宝峪村开来。日本侵略军武器好,力量大。而寇大胡子除了几门小炮以外没有过硬的东西。所以,寇抵挡不住,便撤到隔着一道山梁的黄山店村。

日本侵略军包围龙宝峪后就挨家搜查,发现剩下不多的老人和孩子。为了把老百姓斩尽杀绝,敌人施用了欺骗手段,命令汉奸装出十分客气和蔼的样子,让留下的老人把躲藏的人们找回来,并声称:否则就把全村的房子都烧掉,同时,汉奸还到黄院村通知老百姓到龙宝峪开会。上黄院村的麻三,黄院村的村长李凯以及部分没有逃走的村民都被带到龙宝峪东岭。一个个捆绑起来。龙宝峪村的李文启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在日本侵略军和汉奸的诱骗下,钻进煤窑,向躲在里面的几十个人说:“日本人好着哪!给烟卷抽,给块糖吃,让大伙都出去呐。”随后,又把亲侄子李增叫出来说:“你出去吧。因为你识字,出去写几个字,写明白了人家就不烧房子啦。要不,全村的房子都得烧喽!”当时,洞里人都很胆小,李增也很害怕。可是听了李文启的话,还是出来了。后来,窑里的人也陆续钻出来。结果,日本侵略军见一个抓一个,一个个都被捆起来共40多人,押到东岭下边一处叫下新房的外院里。这里是一家财主的四合院,座北朝南。日军端着枪逼着这些人从西墙根排队,排成两行靠着北墙排满后又弯回来,正好排头接着排尾。排在最头的是李文启,排在最后的就是李增。叔侄俩儿紧挨着。晚上,天气很冷,日本兵荷枪实弹严加看守,老百姓双臂被缚,蹲在墙根整整冻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八点钟左右,就听院外响起枪声。枪声过后,紧接着又是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三个全副武装的日本士兵排着队正步走出大门口,距人们约有7、8米远的地方立定等候命令。一会儿,就听一个日本军官哇啦哇啦地下命令,让被缚的百姓靠墙排队站好,三个日本士兵马上压上子弹,对准这些人开枪射击,枪声一响,中弹人立刻脑浆崩裂,一头栽下去顷刻毙命。自东向西,一次倒下两三个,不大功夫,就枪杀三十多人。

杀到最后,只剩下李文启和李增叔侄俩人,没等枪响,李增一头扎进叔叔李文启的腋窝里,只露出一后脑勺。就听叭叭两枪,李文启当场惨死在血泊之中。李增也随着倒下,子弹擦着后脑骨打过去,他顿时觉得一阵生疼,左手本能地去捂后脑勺。这时,又听一声枪响,左手立刻又中一弹,手指象被打掉似的又是一阵剧痛,鲜血马上涌出,顺着左手从后脑勺流到脖子上。他意识到自己没死,极力抑制着,一动也不动。

过了一段时间,枪声不响了。满院子尸体横七竖八互相叠压着躺了一片。墙上溅了不少血迹,地上流满一汪汪的血浆,尸首血肉模糊,惨不忍睹。这时,尸体堆中有人苏醒过来,吓得变了声音喊道:“得喽,咱们这回是全完喽!”声音未落,三个日本兵扭过身来,冲着地上的死尸叭叭又是一阵乱打,等了会儿,看

着再也没有动静了，才转身离去。

日本侵略军杀完人，又烧了房子，整个东峪的房子全燃起大火。火越烧越大，被枪杀的百姓们的尸体也烧着了。烟熏火燎，焦味难闻。趴在死尸里的李增觉得不跑非得烧死不可，于是挣脱身上的绳子，撒腿就往里院跑。里院后边是天沟，爬过天沟可以逃进山里。当李增跑到沟头，刚要往上爬时，发现东墙外的小树在晃动。他抬头一望，一个日本士兵正一脚登墙，一脚登着树杈端枪向门口张望。李增赶紧趴在地上装死。这时就听叭的一枪，也往院里跑的李春当场被打死。日本侵略军看周围没有活着的人，才离开新房。大约过了十几分钟，李增没再听见枪响。向四周一望，没有人，爬起来就跑逃出了院子。

8月13日早晨，日本侵略军又挨家搜捕把村中没跑了的老人李兴伍等十几人捉住后，强行押到杀人现场不问青红皂白，全部枪杀之后，才撤走。四处逃难的老百姓回到村中。当他们看到烧成的废墟家院，惨死在血泊中的亲人时，都惊愕不已，悲痛欲绝。在掩埋亲人尸骨时，人们发现有二人身受重伤，还有一口气。其中李凯，嘴吐白沫，人事不省，三天后死去。另一位是李贵，他精神受到严重刺激，嘴里不停地发出“嘟嘟”打机关枪的声音，几天后也惨死了。唯一的幸存者李增头骨和左手受了伤。经统计，日本侵略军在龙宝峪惨案中共杀死无辜百姓40余人，烧毁房屋124间，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房山文史资料》第6辑）

## 血洗定府辛庄

张玉泉

“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仅一个多月的光景，京南的大片国土便沦丧在日本铁蹄下。京西南房山、良乡平原地区硝烟弥漫，炮火连天。

定府辛庄位于京郊西南部房山县城东南，距县城六华里，座落在大石河西岸，清朝初年为官府庄园，一片平川。1937年旧历八月初，已侵占了良乡县城的日军部队，用坦克开道向西南的房山县城入侵，遭到了国民党29军的阻击，便驻扎在大石河东岸开古庄一带。这股日军，不断遭到我抗日军民的偷袭，时有伤亡。1937年旧历八月十一日，守在房山县城以北的国民党29军这个连撤到县城东南的定府辛庄，阻挡日军南侵。该连进驻后，军民携手在村北挖了约一里长的战壕，设立坚固的防线，配有机枪、平射炮把守。战斗打响后，半日之内击退日军三次进攻，打死打伤日军二百余人、炸毁坦克一辆，最后日军用飞机狂轰乱炸，轰平战壕，29军一个连全部牺牲。

旧历八月十二日，已被打红了眼的日军进庄，开始了残酷的屠杀，他们从东西北三面进村，挨门按户搜查，只要没有逃走的无一幸免。一伙日军进到张三炮的院子里，便满院追鸡，张的妻子从柴禾垛里出来制止，一枪被打倒了。见妻子被打死，三炮急得也钻出来，刚一露面被随手一枪撂在地上。剩下两个未成年的女儿，后来也被老便抢走了。

王德生和三岁的妹妹随母亲逃荒到石楼村姥姥家避难，鬼子进了石楼村他们藏到白薯井里，不懂事的妹妹总是哭叫，怕连累别人，又连夜跑出村，因妹妹又饿又害怕，哭叫不停，为了保着母子及乡亲的安全，母亲狠心把妹妹扔进河里。到顾册村躲了三天，回到家院墙塌了，三间土房顶子炸了七、八个洞。母子俩又到

村东去找给贾家看林的父亲，他已被日军砍死在南大地，两个月后才找到早已腐烂的尸体。

一个班的鬼子在翻译官的带领下进了村南头李士衡的家，拉出李的父亲盘问是干什么的，然后又检查膀子、手心、脚腕，就带走了，奶奶追出院里，李的父亲凄苦地叫了两声妈妈，什么也没来得及说。李士衡的爷爷怕鬼子再来，便把全家老小带出去避难。第三天李士衡和母亲偷偷进村寻找父亲下落，听说被砍在南大沟里，母子奔了南大沟，见到四、五具尸体，其中穿兰补丁褂子的就是他的父亲。

当年旧历八月二十日，日军一个小队又进村，大部分百姓都跑了。家住村南头的刘振才家只剩下一个呆傻的哥哥。几个鬼子一进院把他叫到跟前，一个鬼子使足了劲照他的脖子就一刀，把脑袋砍掉了，又在院子、屋内搜了一遍才走。

村中刘永家院子较深，村里七、八个没跑出去的男人都藏在这里，全部被鬼子用刺刀扎死，屋内外、大门过道儿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地，整个小院被血染红了。李大仲、刘建堂等几个棒小伙都被刺死在这里。还有一位住在村边的农妇，男人躲在外地，她被一日军小队长奸污了。

日本鬼子杀人手段十分恶劣，他们把逮着的成年男人，每两个人捆在一块儿，随意砍死一个，留下一个活着的，再踢一脚或打一拳，让他拉着死的跑，以此取乐。刘士、关起、张玉田等人与魏四、赵德山等被捆成对儿，有的被杀、有的幸存。

还有一小队鬼子把逮来的老百姓都集中到张宝生家院子内，男女分别排成两行，对面跪下，两个鬼子手拿敲鼓的锤子，从两行人中间铆足劲敲男人的头顶，让女人瞧着，每人被敲得从头上往脖子里流血，有的当场就趴在地上没有起来，其余的流尽了血算完了。

这样，日本鬼子先后三次进庄屠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整个村子，尸横遍地，血流连片，惨不忍睹。据不完全统计：杀死约七十余人，炸毁房屋二百余间。

（《房山文史资料》第6辑）

## 黄山店叛乱经过

赵润东

1945年秋，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抢占胜利果实，疯狂调兵遣将，大举向解放区进犯。我平西根据地的党组织为了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进一步壮大力量，扩充队伍，深入到乡村开辟工作，动员民兵积极参军。

这年11月的一个夜晚，在周口店一带担任第四区区委书记的杨春茂与区大队长杨永生、区民政助理王世英等同志，来到敌人经常出没的黄山店村召开民兵大会，宣传党的救国救民方针、政策，动员全体民兵积极报名参军，扩大解放军队伍，促进解放战争早日胜利。人们都称这次会议为扩军会。

扩军会在陈家店召开。陈家店座落在黄山店村小学校下面，是一所四合院，有正房、配房、还有过街门洞。这里是来往过客的必经之路，所以店主陈士平利用这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开了个骡马店，村里的各种大会常在这里召开。

这天，夜深人静，一片漆黑。全村民兵陆续来到会场。门外有民兵站岗放哨，屋里点着煤油灯，大家围

坐在土炕上听杨书记讲述抗日救国的道理，日本投降后的美好前景，以及这次征兵扩大队伍，保卫抗战胜利果实的重大意义等，希望全体民兵认清形势，踊跃报名参军。杨书记正在有条有理地讲述革命道理，而周围的部分人却坐立不安，神情诡秘，情绪异常。院子里也时有可疑的脚步声。此时，这里的气氛显得格外紧张。

杨春茂预感到情况异常，提醒大家：“注意，我觉得有动静。”

坐在一旁的安浩（村游击队长，后叛变）若无其事地说：“没事！外边下着三道岗呢。”

杨春茂继续做动员。

讲了一会儿，他发现屋里有人心不在焉情况异常，警惕地说：“不对！我看有动静。”

安浩再次对杨书记说：“放心，没事！”企图稳住他。

这时杨春茂发现事情不好，他判断院内有敌情时，马上伸手掏枪。就在这一刹那，安浩猛然间扑上去，拦腰抱住杨春茂，伪保安队破门而入，冲着杨春茂开枪射击。砰的一声，子弹穿过了他的胸膛，当场牺牲。此时油灯被打灭了。喊叫声、脚步声混杂在一起，屋内屋外乱作一团。

区大队长杨永生、民政助理王世英听到枪声，看着杨书记一头栽倒下去，心急火燎马上去搀扶。这时陈家店已被围得水泄不通，他俩又没有枪，只带两颗手榴弹。在这紧急关头，拉开导火索，将手榴弹扔到院中，轰隆隆一阵炸响，尘烟飞扬起来。外面的人叫着喊着四处逃窜。杨永生、王世英冲到院内，想突出重围，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只好趁着混乱，悄悄地隐蔽起来。

一阵紧张之后，院内有人大声喊道：“跑哪儿去啦？逮住没有？”

“没有！跑不出去。”有人随声应道。

“外面注意看守，里边的人，搜！看他俩藏在哪儿！”有人命令着一群人荷枪实弹，点着火把，搜查了每个角落。但是，连人的影子也没发现。

那人又问道：“外边发现跑了人没有？”

大门外的人马上回道：“没有！”

“嘿！跑哪儿去啦？”那个指挥者边搜边磨叨说：“肯定没跑出这院子，接着搜！”

一群怕死的家伙用枪顶着店主陈士平的后腰，让他领着翻了一遍，仍没见踪影。

杨永生和王世英手无寸铁，仅有的两颗手榴弹也投了出去。怎么办？在这生死关头，他俩决定强行突围。这时，叛乱分子搜到草棚，把两人堵在草棚里。“不许动！动就开枪！”

声音未落，几十支枪口对准了两个青年干部。有几个人窜上来架住他们，随后用绳子捆绑起来，连夜押送房山。杨永生和王世英宁死不屈，坚决反抗，一路上与叛敌顽强斗争。当走到房山城外牛口峪村附近的马刨泉时，叛敌将两人就地活埋。杨永生、王世英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年轻的生命。

杨春茂、杨永生、王世英三位同志壮烈牺牲后，上级组织对这事件进行了细致调查，得知，这是一次早有预谋的反革命叛乱。区委书记杨春茂等同志到黄山店村动员征兵工作时，叛徒傅连恒连夜跑到县城送信，保安团长张德祥马上派陈士林带领三大队、一个手枪队共三百来人将会场严密包围。村内全体支委和党员九人及二十多名民兵里应外合，导致了这场惨案的发生。

解放后，人民政府对叛乱的首恶分子安浩、傅连恒等人进行了镇压，对带人搜查杨永生、王世英二同志的陈士平判处徒刑。使他们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房山文史资料》第6辑）

## 坟庄惨案

赵润东

1937年旧历八月十二日,日本侵略军在山田指挥下进袭房山以南大部村庄。国民党军队溃退南逃,小股部队撤至长沟镇西面的坟庄村,边撤边喊:“老乡们,快跑吧,日本来啦!”村中百姓闻讯后惊慌失措,乱作一团,许多人顾不得家中什物,携老带幼、纷纷向西部山区逃跑。很快,村中除少数年老者外,其余全部逃去。13日上午,枪声响成一片,国民党军队在村南头还没撤完,日本军队已从村东进入。国民党爱国官兵借村南的小河及周围的玉米地作掩护,狠狠阻击日本侵略军,使日军有所伤亡。受阻日军穷凶极恶疯狂反扑,爱国官兵伤亡惨重,随后,日军占领坟庄。

日军进村后挨家搜查,见东西就抢,见人就杀。村民刘凤等正宰牲口,听到枪声就吓跑了,幸免一死,宰得的牲口肉被日本兵抢食一空。村民冯卫春得知日本进村,逃跑中慌不择路,被日军抓住,不问青红皂白上去一刺刀,从肚子扎过去。冯疼痛难忍一头栽倒地上抽搐不止。日军见他没死,继续用刺刀扎,并提来开水往身上浇。冯卫春被活活烫死。郑玉金的母亲见日本进了村,抱起未满周岁的小女儿玉荣往村北的小山方向跑。日军发现,穷追不舍,在身后连发数枪,郑母中弹死亡,小玉荣哇哇乱哭,爬到母亲尸体上找奶吃,其情景惨不忍睹。

村民冯陆周一家人和逃难来这里躲藏的亲戚没来得及逃走,被日军堵住。他们有的翻墙出去钻进了庄稼地,而冯陆周、冯陆坛兄弟三人和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没能逃脱,被破门而入的日军当场杀死。韩万友、薛起等人出家门往北跑,刚到村中大庙北测,被日军抓住,绑在大庙内的树上用刺刀挑死。韩万友的妻子见家人都跑了,不知要发生什么事,混乱中也顺着大街往北跑。当跑到大庙时,也被日军抓住,捆在树上用刺刀捅死。

逃走的百姓,有的躲在三座庵、水头、云居寺等地不敢回村,有的趴在村西谷地里不敢露头。日军大屠杀之后,又在村驻扎下来。砸门窗、劈劈柴,杀猪逮鸡宰牲口,整个村庄烟尘弥漫,怪味熏天,整整折腾了三天才撤离。

十几天后,村民们陆续回村,发现村子已破烂不堪,成了一片废墟,大街小巷满是鸡毛猪毛。人们寻找失去亲人时发现尸体都扔在村南的小河沟里,横七竖八互相叠压,已经腐烂。一群狗围着东拉西扯都吃红了眼。这里一条胳膊那里一条腿。已经辨不清谁是谁了。在这次惨案中,有七十余人被日军残害,房屋门窗全部被砸毁烧掉,喂养的猪鸡等被洗劫一空。

(《房山文史资料》第6辑)

## 三年劳工生活

朱荣口述 傅雅竹整理

我叫朱荣，今年八十二岁，是北京市房山区北良各庄村人，我永远也忘不了被抓到日本做劳工的那一段苦难经历。

1942年，我们这一带为敌占区，西边的共产党，八路军常到这里搞抗日宣传活动，号召无产者团结起来“打败小日本，穷人得解放”，并密切注意日伪军的行动，积极为抗日根据地报信。

早已受尽日伪反动派欺压的老百姓，听说打日本，解放穷人都非常高兴，愿意接受共产党的主张。

这年9月20日(农历)下午，邻村南良的付宝玉通知我 and 朱玉喜、朱永连、田友生和南良村的李克仁、付宝亭、付宝瑞、王二环等人到他家去开会。傍晚，我们背着背筐，各奔东西，绕道聚到了付宝玉家。一个叫宋广宽的八路军干部，给我们开了个十几分钟的会就散了。

不料，这事被李克仁报告给土匪头子王殿臣的秘书宁昆山了。说我们是八路军的人，并说我是八路军的“九县专员”。

当夜，我们全都被抓，带到了长沟“四分所”的日伪据点。

第二天十月初一，时值初冬，寒风刺骨，伪军把我们押到涿州大衙，交给了日本宪兵队。当天晚上，我被提审。一个鬼子坐在堂上，叽哩呱啦不知说些什么。翻译官说：“太君问你是不是八路军九县专员。”我说：“不是，是商人。”那时我是涿州“文兴斋”糕点铺的职员，卖点心。翻译说：“不整你，你不说！”他们立刻对我动了刑。仰绑在老虎凳上，往我的嘴、鼻子、眼里灌辣椒水，我一下就昏了。等我醒来，他们又问我是不是八路九县专员。我一口咬定是商人，我说：“你们就整死我，也是商人。”看我不认，他们接着灌辣椒水、泼凉水，就这样把我折腾得死去活来。最后一次醒过来时，翻译官对我说，有一个太君说认识你，看你卖过点心。我说：“认识我更好。”就这样才让我下了堂。

没想到，二十八天后，我和别的“犯人”一起被张德祥的部下邢汉章提至房山城后被送到了“北平日本劳工协会”。在押送途中，警察告诉我们，说到了劳工协会，九死一生，你们有亲的投亲，有友的投友。

我们被抓的几个人中，付宝瑞因年纪大了，田友生在伪军城有亲戚，他们在涿州就被放了。朱永连被亲戚用二亩地赎回去了。剩下的都押到了劳工协会。当时我们在一起的还有高庄的两个，石窝两个、石门两个，辛庄三个，下营的五个人。

到了劳工协会，是劳工们悲惨命运的开始。

日本人怕劳工逃跑，用绳子把我们拴成串。用汽车运到了天津塘沽。然后交给了一个叫“三岛”的日本兵。准备运往日本。

在塘沽，我们侯船又等了二十八天，劳工们的罪受大了。这里准备运往日本的劳工可多了，全国各地的都有，成天往这送。一到这里，我们的衣服就被扒光了，换上死人身上扒下来的衣服，那上面的虱子都带尾巴。

住在简易板房里，每条木板上只能盘腿坐下四个人，底下二尺深就是水，没黑天白日地坐在那里，每人每天只发给个小窝头，两瓣蒜，根本不让你活动。带着太阳生让睡觉，若困乏仰在了别人身上就得挨揍。你说撒尿呀，拉屎也不行。渴了也不让你喝，叫祖宗也不管呀！你就坐着吧！腿坐得都快折了。若稍有反抗，便会招来更加残酷的虐待。每天在这里被折腾死的不计其数，成车成车地往出拉，有的还带着气就被扔进“万人坑”。

上船这天，很多人站不起来，迈不开步！我们乘的是一艘日本火轮船，整整半个月才到日本。

一路海上的情景，惨不忍睹。劳工们由于晕船，呕吐不止，恨不能连苦胆都吐出来，翻肠倒肚。每天都死人，若死在中国的地界内，就被随手抛进大海。进入南朝鲜，死了就码在了船仓里。

进了日本，我们经过长崎，在门司下关港下了船。在门司旅馆休整了一天，澡池里放上药水让我们洗澡。衣服交给日本人消毒，拿回来一抖落虱子全掉了，这天吃了一顿饱饭。

随后，又坐上火车经东京倒车到了青森，晚上八点又上了轮船，到第二天早晨八点到了日本北海道的函馆，后来又到了札幌市的北美贝下车，走三里地后，到了目的地南美贝劳工拘留所。

这个劳工拘留所里的劳工，都是中国人。他们中有来自上海等地的大学生，各地商人，老百姓，新四军战士等。有的早来了好几年，有上千人。这里的劳工分北京队和塘沽队，我们属塘沽队。每个劳工都编上号。

拘留所附近都是煤矿，我们的任务，就是到一个大炭矿(烟煤)去装煤。这个矿每班能容一万人干活。

每天先步行三里到电灯房领灯，后坐七十里地的电瓶车到保安系下车排队，领工具，工头按号领人。

由于住地潮湿，每人身上都起了疥疮，刺痒、钻心、冒血。能用澡堂里的水狠狠地浇，浇了结嘎巴，结了还浇。那时，我身上长满了疥疮，在胸前拘起了一个大浓包，差点丧了命。劳工们干的是苦力，每天十个钟头为一班，十天为一个礼拜，每九天还要把第十天的活干出来，可劳工们每天吃的是什么？早晨一个杂合面小窝头就着凉水，再带上一个算是午饭，饿不到中午，就把兜里的那个吃了，等到中午开饭时，工头挨个检查，发现谁兜里装的是块石头，就挨顿揍。后来谁也不敢提前吃了。晚上更是难熬，一人一小木碗稀菜汤。

工头对劳工们想打就打，想骂就骂、有时正干着活，当头就是一棒，血顺着额头往下淌。谁管呀，人死了不如一条狗，拿中国人根本不当人。

1945年8月，小日本鬼子宣布无条件投降。

劳工们终于挺直腰杆，扬眉吐气。日本政府无条件地供给我们食品、衣物、让我们好好休养等待回国。

1945年12月，当了三年苦难劳工的我，死里逃生，终于回到了祖国怀抱。

1949年7月1日，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那以后，我在党的各项工作中，努力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把全部身心交给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

(《房山文史资料》第6辑)

作者傅雅竹系原长沟镇干部

## 坨里惨案

赵润东

1937年旧历七月十五日，侵华日军调集大批部队疯狂向京郊进袭，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所不为，法西斯的疯狂和野蛮暴露无遗。驻守在卢沟桥以南的中央军无力抵抗，且战且退，很快就撤至良乡、房山地区。侵华日军尾随而至，在坨里村制造了一起惨案。

坨里村地处房山城东北部，北 0.7 公里为现在的新农村，西北 1.2 公里是口头，南 18 公里即沙窝村，东南 2 公里为马家沟。这里东南是平原，西北为山区，四通八达，为京郊交通要冲。当中央军撤至口子山时，侵华日军已进入村东。他们先占领水池子西坡头，插上“膏药旗”，接着又在坡的高岗处阳坡顶上各插一面，随后在南坡、胡家坡小崖上边各插一面。在四周插好膏药旗以后，开始朝村里猛烈开火。一阵枪声过后，伏在口子山上的中央军朝对面日军砰砰打了两枪。随后，日军又是一阵密集的炮火。夹在两军当中的老百姓听到枪声不知所措，都携妻带女顺着大街小巷潮水般地朝西南方向逃跑。当时正值夏季，阴雨连绵，山洪暴发，河水猛涨，逃难的人群中孩子哭大人叫，一片混乱。人们顾不上河深水急，一窝蜂似的朝河对岸涌去。由于水流湍急，有的人刚刚下水就被汹涌的洪水冲倒，一转弯就沉入水底冲走了；没有冲走的人不要命地朝对岸爬；岸边杂草丛生，中央军还摆满了许多荆棘葛针作为鹿砦。人们顾不上针扎疼痛，手扒头拱，拥上岸边。百姓数以千计，而岸边的中央军不但不救助，反而用大枪往水里赶。因此，不少人掉入水中被洪水吞没。日本兵占领制高点后，立即向村中进犯。一进村就杀死林万友的父亲、刘殿永的父亲和王昆。7 月 15 日，年近 50 岁的王昆从坨里高线下班回来，不知道村中发生了什么事。他穿一身灰布衣服，在街上正碰上日本兵。日本兵不问青红皂白，马上把他押到陈家院中。王昆还未反应过来就被刺刀挑死。一同被挑死的还有口子村的穆墨艳。村民宋国山的妻子听到枪声慌忙朝大街逃跑，日本兵紧追不放，从背后开了一枪，当场死亡。日本兵打死宋妻还觉得不“过瘾”，又照旁边的碾砣开了一枪，子弹把碾砣打了一个大坑。这碾砣至今还保存着。村民郑兰生被日本兵捉住，被迫为日本背手榴弹。他累得迈不动步，实在背不动了。日本兵见他没有用了，随后把他枪杀。刘景义的妻子在慌乱中跑出家门，日本兵见了追上去将她杀死。刘景义见了不顾一切地冲上去。几个日本兵端着刺刀马上将他围住，使他动弹不得。刘急得直叫老总，紧紧攥住一个日本兵的刺刀不放，这个日本兵使劲一拧，刘景义的一个手指就断了，刘连连求饶。日本兵看他确实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才饶他一命。村民王振生的父亲王田被日本兵捉住后让他当夫子，逼他给日本兵烧火做饭。王田不甘作亡国奴，趁机逃跑。结果被日军抓回，把他押到大庙里，牢牢捆上，轮番毒打。日本兵认为王田是中央军的密探，此次逃跑是去报信。因此，毒打之后仍不出气，又照着他的臂膀砍两刀，砍下一只胳膊，用这只胳膊狠狠打他。王田被打得死去活来，加上失去一只臂膀的疼痛；最后再也支撑不住。日本兵见状又打了一枪，王田死去，当时年仅 43 岁。据王振生回忆，7 月 15 日早上没吃饭，他和母亲、妹妹、两个弟弟一块逃走，父亲没来得及走就被抓去了。他们逃走的人先来到南观沟，又跑到英水一带。几个月的弟弟有病没法医治，不久就夭折了。听说日本到了黄花岭，母子们又逃到南窖。直到八月二十稍稍稳定一些才回来。寻找到父亲下落时，只见父亲生前穿过的衣服，一双圆口鞋和一堆白骨。其情景令人惨不忍睹。

在这次惨案中，宋傻子一家全部被杀害。秦二掌柜的一家十几口人死于日本鬼子刀下。另一股逃难的百姓逃到房山城北的羊头岗村。其中秦连州一家八口人及一部分逃难者躲在村东头一口白薯井里。由于井下藏了几十口人，声音嘈杂，孩子哭闹，被追赶的日本兵发现。就投下一颗毒气弹（熏炮），井下几十口无辜百姓全部丧生。被日本兵杀害的还有秦玉荣、张六爷、大林春、耿大个子、翟大猪、刘江的父亲、老陆等。在日军进犯的日子里，短短几天坨里村就有 128 人惨遭杀害。被洪水冲走而幸免一死的有二人。其中一人是金凤州的母亲，一人是十五岁的王二刁。她们被水冲走后，抓住岸边的蒿子死死不放，后慢慢爬到岸边不敢露头，怕被人发现。到了夜里找点枣儿吃，以此充饥。这样在水里呆了很长时间，看形势稳定后才回到村中。这时的坨里村人烟稀少，一片狼藉。侵华日军在坨里惨案中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房山文史资料》第 7 辑）

## 羊头岗惨案

杨建中

1937年农历八月十三下午,天色灰蒙蒙的,飘着细雨。二十多架三个脑袋的日本飞机擦着树梢在村上空盘旋轰炸。崔君家西屋三间,刘福家西屋三间被炸毁;王庆明家碾盘被炸飞,其祖母被炸死;另有多处炸成一人多深的坑,残垣断壁。不计其数。飞机飞走以后,一队鬼子兵闯进村来,奸淫烧杀,家家门窗拆走烧掉,鸡猪被杀光。

天放亮,一场大规模的屠杀开始了。两个日本兽兵追奸一个王姓的女孩。女孩逃进赵朴玉家,钻进了他家的柜底。鬼子兵向外拖人时,女孩大声呼喊救命。赵朴玉躲在门后怒不可遏,抄起顶门杠向鬼子头上砸去。另一个鬼子哇哇乱叫,将赵朴玉和小女孩刺死。这就招来了大批鬼子兵,挨家挨户搜捕,把搜到的人押到村西赵家下坎的打谷场上。赵朴玉一家五口,刘全福一家五口,刘玉福一家四口,刘二定一家七口,还有赵广玉、崔志会之母,大鼓刘,常五奎等多人。这时恰逢八十亩地等几个村的几股逃难者路过此地,也被鬼子押到打谷场上。敌人先把男人和小孩扎死,扔进了谷场西南角的白薯井里,妇女被轮奸后推进薯井。人们发出阵阵哀嚎。鬼子向井里扔好几颗手榴弹后,在井口盖上一张大方桌离去。谷场上到处是散乱的头发、衣服、鞋子和片片血污,惨不忍睹。

十几天后,逃难的人陆续回村,在白薯井的西侧挖了一条斜沟,将死难的共62人拖出,让家属认领。一时哭声震天,全村举哀。十几具尸体血肉模糊,无人认领,就葬在羊头岗村西坡下。几座荒坟野冢,化做日寇侵华史上的几个标点符号,启迪和激励着后辈儿孙。

(《房山文史资料》第7辑)

## 日寇在坨里一带的统治

赵润东

1940年至1943年,正是日寇对房、良地区实行残酷的法西斯统治时期。自房山区坨里高线站以里向山区延伸,包括坨里、河北镇红煤厂、花港、长操、大安山、南窖等地,日军分别驻守一个班的兵力,修筑炮楼,安上岗哨,把守交通要道,对我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禁运军用物资、金属、建筑材料以及粮食、布匹、盐、医药等生活日用品,通过挖沟筑墙、开河、修路、建碉堡,制造无人区等野蛮手段,企图切断根据地与敌占区,根据地与根据地以及山区与平原之间的联系。

日军统治时期,烧杀淫掠,无所不为,杀害中国人的方法非常残酷,如活埋、打靶、吊死、刺杀、灌水胀死、毒气毒死、铡死、锯死、喂洋狗、煮死、腰斩、悬崖摔死以至肢解、剜心、凿眼、剥皮等,其暴行罄竹难书。驻守在坨里的二十多个日本兵,挨家抓鸡宰猪,将全村家禽牲畜一扫而光。老百姓出入,要向日本

兵鞠躬行礼，稍有慢怠，就用枪托砸、皮鞋踹、抽嘴巴。有的被罚站在墙根双手举石头。妇女们去地里种庄稼，回来后，日本岗哨阻拦，强迫妇女们脱光衣服走过去，之后哈哈大笑，肆意蹂躏良家妇女。

日本侵略军想尽各种办法，对中国人民进行惨无人道的迫害。他们在长辛店建了一所人间地狱，驯养洋狗基地，专门用来吃中国人。这支驯狗队的头子叫加藤，因此洋狗队的番号就叫“加藤部队”。洋狗由驯狗技师吉田和一批日本兵驯养。每天训练时，要么让一名日本鬼子身穿帆布衣，扮成八路军便衣或普通老百姓，手、脚、脸等各部位都带好防护具，然后当靶子做示范，让洋狗追咬撕扯；要么事先在院内摆上扎好的草人，穿上老百姓的衣服，在草人的肚子上、脸上等部位贴上肉。驯狗的日本鬼子放开绳索，洋狗便张开血盆大口，窜过去连撕带咬、扯下一块吃一块。日本鬼子捉住中国人就送到洋狗队，活活让狗吃掉。这些狗吃入都吃红了眼，只要见到中国老百姓，上去又抓又咬；直到把人咬死啃光骨头为止，其情景惨不忍睹。洋狗吃完人以后，训练洋狗的鬼子还要仔细地给狗刷牙漱口，然后哈哈大笑。

为了大量掠夺中国的煤炭资源，大批原煤源源不断地被运往日本国土。因此，侵华日军在坨里一带修复高线和铁路。1940年夏天，阴雨连绵，常有山洪爆发。为防止洪水冲毁铁路，日本鬼子勒令附近村民，出工卖苦力，在铁路沿线垛好沙土包作拦洪坎。之后又设岗看守。当地老百姓吃尽了苦头，非常痛恨日军的罪恶行径。趁鬼子不备纷纷前来，倒掉沙土拿走麻袋。这使日军十分恼火。一天，坨里村三个儿童谢德、刘景玉、范成贞也去倒麻袋。因身单力薄搬运困难，每人只倒了一条麻袋。事后有人告发，日军就命令“地方”（村公所爪牙）去抓这三个孩子。抓到后用绳子捆起来，带到娘娘庙（当时村公所）看管。然后报告坨里高线警务段。警务段康段长马上带两个警察气势汹汹地赶来，将三个孩子押到警务段。没过十分钟，日本鬼出来，用皮鞭狠狠地抽打，打得谢德三人嗷嗷哭叫，疼得在地上打滚。毒打之后，又把三人紧紧捆绑起来，背上插一个木牌，上写“军用品盗人”押着游街示众。三个瘦弱的孩子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游完大街又是一顿毒打，直到太阳落山才把三个关进一所小黑屋里，等待发落。

第二天早八点，警务段派人把三个孩子押送去长辛店“加藤部队”。这个驯狗基地位于长辛店铁路工厂的西部，有8个大院，狗队占据的是9号至22号这一大片院子，院子两侧还有一大片空地。基地四周是高高的围墙，墙上架着电网。日本鬼子全副武装，岗哨林立，戒备森严。在空地的北部有上千间狗房。狗房高一米多，水泥地面。一条洋狗住一间，由一个日本鬼子看管训练。平时，这里有三、四百条洋狗，最多时可达千条。这些狗十分凶狠，让人看了毛骨悚然。谢德等三人先被带到一所房里。一个翻译官审讯，一个日本记录。问：“你偷什么着？”12岁的谢德早给吓坏了，回答说：“偷麻袋。”“偷几条？”“偷一条。”翻译官又问刘景玉、范成贞，二人都说没偷。结果又遭到一顿毒打。打完后重审一遍，然后三个人被塞进一个狗房里相互挤压，动弹困难。这期间，他们目睹了每天驯狗的情景，每天吃些洋狗吃剩下的废物，看着一排排狗房里的恶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是死是活。

谢德等三人在狗房子里一囚就是七天，七天后才分开，一人一个狗房。后来传出音信，让村里作担保方可放人。当时村长表示不作担保。因此，日本鬼子十分生气，命令老百姓挖好土坑，准备活埋三个孩子。晚上10点钟以前，三个孩子家长闻讯赶来，竭力求饶、阻拦也无济于事。这时，正在给日本人做饭的同村刘景和知道后也赶忙出来讲情。结果讲情不成反遭一顿毒打。眼看三个孩子就要被活埋了，刘景和急得不顾身体伤痛，跪在地上边爬边求饶，大声呼喊“黄会长，快救救人啊！”一个姓黄的人听到呼声，赶来询问怎么回事，刘景和声嘶力竭地说：“黄会长，我三个兄弟要给活埋了，快救命啊！”黄会长见状，问清情况后对日本完山说：“我担保。”完山说：“黄会长保可以，刘保不行。”之后，看看三个孩子瘦得皮包骨，喂洋狗不值得，就又训斥一顿，每人罚二斗老玉米。刘景和替三人垫上，日本才放人。由于村民刘景和极力搭救，谢德等三人才幸免一死。日军在中国国土上犯下种种罪行，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房山文史资料》第7辑）

## 佛子庄惨案

张成基 姜兆风

1939年腊月十八,九团攻打北窖高线公司。北窖离房山城四五十里,是房良重要产煤区。日寇利用这里的“高线”(空中索道,索道上挂罐斗),源源不断地将煤运送到日寇侵华指挥中心北平,其中相当一部分用于军工生产。当时,九团团部设在长操,上级命令九团炸毁北窖高线中心站。锅炉房是北窖高线运输的枢纽,是九团攻打的最主要目标。决定:一营负责牵制南窖的敌人,三营负责主攻北窖,炸毁锅炉房,二营在佛子庄阻击河南据点增援日伪军。北窖战斗打响后,驻扎在河南据点的日军很快得到了消息,马上派一辆汽车载着全副武装的鬼子兵三十多人,在前面开路。车后尾随着数百名日伪军,向佛子庄蜂拥而来。负责阻击敌人的二营,把一个连的兵力布置在佛子庄村东头的庙儿岭下。这个连的连长就是佛子庄村的李星。他对地形十分熟悉,把仅有的一挺机关枪布置在一个小土坡上,封锁住河沟的马路。当鬼子的汽车开进伏击圈时,李星一声令下:“打!”机关枪、步枪、手榴弹一齐冲着鬼子的汽车猛烈开火,鬼子兵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打得懵头转向,急忙跳车顽抗。我军占着有利地形,居高临下狠打。没等鬼子辨明情况,连长李星就率领战士们,勇敢地向敌人冲去,和敌人展开了搏斗,只用二十多分钟,就把三十多名鬼子全部消灭了。这时,尾随汽车后面的几百名日伪军,刚刚走到黑龙关村南头的水磨房,就知道前面的汽车遭到了阻击,再也不敢往前走了,掉头就往回跑。

在这次阻击战中,随车来的一名姜翻译官没有被打死。他腿部受了伤,躺在河滩装死。战斗结束后,逃回了河南日军的据点,把日军在佛子庄村遭到阻击的情况作了详细汇报。日军头目听了勃然大怒,立即向他们的上司作了汇报,并谋划了一起报复性的空袭佛子庄行动。三天后,(1939年腊月二十一下午两点,)日寇的十二架飞机,三架一组,共四组,从东南方向佛子庄村上空飞来。由于飞机多而且又飞得低,声音特别大。村里很多人都从屋子里出来看热闹,一点躲藏的思想都没有。只见三架飞机从南岩和东岩间向村子里俯冲下来,同时将炸弹成排扔下,然后就朝西边飞跑了。飞机是一组接着一组,炸弹是一颗挨着一颗,每颗炸弹落地都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炸弹落地后就是一个两三米深的大坑,四五百斤的大石头都从坑里翻上来。弹片横着飞,杀伤力很强。村民们被这突如其来的轰炸吓得惊慌失措。霎时间,房倒屋塌,血肉横飞。半个小时过后,飞机飞走了,留下的是一幕幕惨不忍睹的悲惨情景。

姜永珍一家八口,飞机轰炸时,妻子栗氏坐在炕上穿锅拍,不满周岁的长孙在炕上睡觉。小女儿姜富芳当时六岁,在院子玩。同院的五妈看见飞机来了,急忙对几个孩子说:“别玩了,你们快回家,飞机来了,要死死在个人家里去。”姜富芳就往自己家里跑,手刚拉开门,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二女儿从院子里的厕所出来,手提着裤子还没有来得及系,一颗炸弹从房顶掉下来,正巧落进炉坑里爆炸了。整个三间房都被炸得无影无踪了。妻子栗氏和长孙被炸到街上的乱石堆里,被活活摔死了。刚要进屋的小女儿,当时吓呆了。在院子里的二女儿被埋在了土里,外面只露着两只脚。同院的姜永魁的腿和上身也都埋在土里,只有脑袋还露在外边。他大声喊:“快救人啊!快救人啊!”大伙来到院子刚要刨姜永魁,有人发现地面上露着两只脚,便喊:“快都过来吧,先刨这个吧,看看还有没有气,头露在外边怎么也死不了。”大伙急忙跑过来,将二女儿从土里刨出来,见她只把两颗门牙碰折了半截,身上擦破了点皮。姜永珍的次子姜少顺,被炸那年十八岁,家里为他准备齐了结婚用的东西,再过五天就该给他办婚事了。被炸的这天早晨,父亲叫他白天赶着毛驴去英水驮两回烧煤,给

了他煤钱。他上午只驮了一回，中午又和父亲要煤钱。父亲说：“早晨不是给你两回的煤钱吗？”他说：“再驮一回我就一分钱也剩不下了，不给我点零钱，下午我就不驮去了。”父亲说：“再过几天你就要结婚了，还要小孩子脾气，下午再驮一回去。”他根本没听父亲的话，他在屋里听见了飞机声，拉开门就往外走。刚走到大门口，几颗炸弹落在街里，把大门口过道上的柁檩震塌下来，他被活活挤死在柁檩之间了。

姜永珍一家八口人，被炸死了三口。六间房炸塌了三间，炸飞了三间。粮食、家俱、衣物都被炸得一干二净。

姜元许的儿子叫麻蛋，和姜少宗的弟弟小儿，两个人正在西边拉大锯。忽然，看见从村的东南方向飞来十多架飞机。麻蛋一边拉锯一边对小儿说：你看，从那儿飞来了一群机(鸡)”。小儿说：“机(鸡)来了，来了多少，让他下几个蛋咱们尝尝。”话音刚落，三架飞机俯冲下来，紧跟着就下了几个“大蛋”，落在他俩附近。几声巨响，俩个人被炸得血肉横飞。在收尸时，根本没处去找尸体，只是捡了几块骨头，几块肉。

姜玉信家里来了亲戚，妻子到街里去找他。走到半路看见飞机在轰炸，转头就往回跑，跑到半路就躲进一家过道里，吓得双手捂着肚子。几颗炸弹落在附近，炸弹的铁皮穿过捂着肚子的手打进肚子里。顿时，一只手鲜血淋漓，肠子从伤口流出出来，亲人用手将肠子硬塞了回去，杀了一只鸡，用鸡皮把伤口补上。但因为当时没有医疗条件，弹片无法取出来，几天就死了。留下一个男孩刚刚几个月，因家里无人抚养，父亲忍痛让人家抱了去。

姜元影的哥哥挑着水桶去前街挑水，走到半路，几颗炸弹落在身边，两只水桶被炸到几十米以外，尸体无影无踪，只从百米以外的河滩捡到了半截小辫，从辫子上扎的头绳亲人才认出是他的。

姜玉瑞的妻子，尸体都被炸飞了。只从附近捡到几半截肠子，放进棺材里。

姜元恩的两个儿子，一个十八岁，一个二十岁，都被活活炸死，夫妻俩把两具尸体抱进屋里，哭得死去活来。

被炸死的还有李如松的父亲，杨文友的父亲，姜振芬的妻子，姜玉仁的妻子，韩兴宝的哥哥，姜玉章的儿子，姜元少的女儿，姜永俊的儿子和女儿，姜元昆的妻子和一个孩子等，共计五十二口人。炸伤六十人左右，有的折胳膊断腿，终身残废；有的耳聋眼花，精神不正常。由于佛子庄村四面环山，飞机轰炸时俯冲受限，村里东西三条街，只炸了两条。后街靠山，飞机无法轰炸，一大部分炸弹都扔在了河滩上。如果把把这些炸弹都扔在村里，佛子庄村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就更为惨重了。

轰炸后的佛子庄村前街、中街到处是死尸。有六七十岁的老人，也有几个月的婴儿，有的脑袋开了花，有的从嘴里直流血。这儿一只胳膊，那儿一条腿，树上挂着一件鲜血淋漓的破棉袄，墙根有一件还裹着半截腿的裤子。孩子哭着找妈妈，父母泣不成声地寻找孩子。丈夫哭妻子，妻子哭丈夫。这一幕幕悲惨的情景，让人看了绞心。当时，正是十冬腊月天，村民们饥寒交迫，悲痛欲绝，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很多人家被迫沿街乞讨。

日军在佛子庄村制造的这起骇人听闻的惨案，距今已有五十五年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欠下中国人民的一笔血债，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要用这些活生生的历史材料，教育下一代，使他们要懂得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只有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繁荣富强，任何国家才不敢来欺负我们。

（《房山文史资料》第8辑）

作者姜兆风系佛子庄学校教师

## 日寇在南窖统治的六年

张玉泉

南窖位于京西南的深山之中，距房山西北部 70 余里。该村历史悠久，人民勤劳。周围的群山中不仅有丰富的地下煤炭资源，而且是京东南广阔平原的屏障，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日寇为了掠夺这里的煤炭资源，破坏我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工作，于 1939 年 4 月至 1945 年 6 月，在这里统治了六年之久，当地人民受尽了蹂躏。

1939 年 4 月 13 日凌晨，一个中队的日本兵全副武装开进南窖村，在伪大编乡乡长罗桂德的接应下，进驻村中心范家和杨家大院(当时百姓称这里为狼窝)，立即召集地主、汉奸、伪大编乡、还乡团的头子们开会训话，筹划建立伪政权和武装，以巩固他们在这里的统治。

### 奴役

日寇驻扎的第三天，便遭到我抗日根据地八路军的袭击。为了防范抗日军民的打击便开始了工程浩大的修岗楼、筑地堡、挖壕沟、村头路口建栅门等工程，通过伪大编乡、维持会三天两头催款、要材料、出民工。由伪大编乡委派工头监督民工。稍有懈怠，轻者挨罚，挨棍棒，重者致残或砍头。日寇在北山山顶上建有三层楼高的炮楼，楼下有暗堡，配有重武器，楼旁还建了 10 间平房做饭厅、仓库，四周是 2 米宽 3 米深的壕沟。周围拉上电网，网上挂满罐头盒，遇有动静就发出响声。岗楼内的日寇吃、喝、用都由老百姓按时往上送，上下山往返 10 多里，都得人背肩挑，或毛驴驮。逢年过节还要送烟、酒、肉、水果。如不按时送到，日本兵便拿汉奸们问罪，或下山到百姓家里抢。伪大编乡的伪军，伪警察在南山建了两层楼高的炮楼，他们的吃、喝、用也由老百姓定时往上送，稍有不顺心便拿老百姓出气。他们还在村内南、北、西三条主要路口修建了大门，安上铁栅栏，昼夜有日伪军站岗，(街上设流动岗哨)。老百姓出入要出示良民证，还要给日军鞠躬、问“皇军好”，如若违反，不仅不让进出，还要挨整。一次，李丙山父子到山上种地回来晚了，进山门时没鞠躬，问好。日本兵不仅打了他们，还让他们双手举起一块大石头，嘴里叨一块小石头罚站。

日军出村去扫荡，或攻打八路军驻地，都要从村里要夫子，跟在他们后头背弹药，扛粮食。战斗打响后让他们抬伤员，必要时把民夫推到前边挨打。1941 年秋，岗楼里的日伪军去攻打我革命根据地马安时，从村里抓了一大批人去给他们运枪炮弹和粮食。只有 10 多岁的李全中也被抓来，让他背一篓子手榴弹紧跟在后面跑，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趁督后路的日本兵不注意，扔下篓子钻进了草丛。那次许多被抓走的都没能回来。

### 封锁

日军为了把我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困住，对生活必需品如粮食、食盐、火柴、袜子等实行禁运封销，如发现有人运送，立即杀掉。致使南窖的老百姓很久没有盐吃，买不到日用品。一个外村人从县城给家住南窖的妹妹送来两双洋袜子，路遇日本兵，不由分说，被就地扎死。杏园村陈清奇到村里卖针线也被逮进岗楼，逼他交钱。第二天就被砍了头。南窖一带的百姓终日提心吊胆，不知何时丧命。

老百姓不仅要忍受日伪军的折磨，还遭受着天灾的痛苦。从1941年至1944年，南窖地区连年发生水、旱、虫灾，所收无几。加上粮食、副食禁运，老百姓只得捋树叶，挖草根充饥，但没有咸盐又难咽下。当时村中有个叫“义合成”的小铺子存了30多缸咸菜汤，被百姓们抢购一空。

老百姓被逼得走投无路，不少人冻饿而死。1942年春，青黄不接，董江的妻子带儿子去山上挖野菜饿死在山上，撒下皮包骨头的儿子爬在妈妈的身上惨叫。那几年树叶被捋光了，草根被挖净了，在这危难之际，伪还乡团长的儿子程朴，明目张胆地干起拐卖人口的勾当。那几年先后有数十名青壮年被骗到口外卖苦力，一些年轻的妇女则被卖到妓院。

### 清乡

驻扎在据点的日军时常被我小股八路军，民兵袭扰。为此日军曾几次出动袭击我八路军驻地，每到一处便烧、杀、抢、掠。据南窖3里的水峪村就在一次扫荡中被烧掉半条街。为了防御我八路军的打击，监视我地下工作者和老百姓的联系，他们三天一大清查，两天一小清查，有时成帮结队，有时三五成群。更多的是换上便衣，分散到村内外各个角落寻找“可疑”的人，一经发现立即抓捕。1942年春，村民冯大朋从山外买了一小袋盐去山里换玉米吃，路遇日军被带到岗楼里，说他私通毛猴子（八路军），用刺刀挑死。

1941年秋，一队日本兵全部换上便衣窜到南窖附近的中窖村清乡，把村民都集中到街中训话，最后把七八个“可疑”的人带进岗楼里审讯，把他们仰面捆在板登上，用小米掺上煤油再兑上水往肚子里灌，肚子鼓起来后再上去蹬，鬼子、汉奸在一旁哈哈大笑。有个叫杨玉清的被蹬坏肠子，当场死去。

更狡猾的是日军小队队长别虎，经常穿当地老百姓的衣裳四处打听情报，用汉语与老百姓对话，遇上青壮年军民便问：“兄弟，你抗战不？”如果你说：“抗战。”他立刻凶相毕露把你带走收拾你，很多无辜百姓被他亲手杀害。

他们在清乡中发现背背篓的，担担子的、驴驮的，都要检查，如有“禁运”物品，你就没了命。农民孟二印从外村借盐回来，在街上被迎面走来的别虎发现，别虎便瞪起凶恶的眼睛盘问：“背的是什么？”孟说：“玉米。”别虎强行检查。机智的孟二印放下肩上的盐袋，正在别虎低头检查时，摘下头上的毛巾顺胡同溜了。别虎立刻通知各路口堵，还派人四处搜捕，结果一无所获。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南窖据点的日军感到末日来临，龟缩在炮楼里加紧战备，放松了对南窖地区的统治。当年7月我驻七区的八路军、武工队一举端了炮楼，摧毁了所有的工事，结束了日军在南窖长达六年多的统治，南窖人民重新见了天日。

（《房山文史资料》第8辑）

## 日军飞机坠毁紫金岭始末

栗景鸿

抗日战争期间，在房山城西涑利水村境内的紫金岭上，曾坠毁一架日军的军用飞机。下面简述一下经过：涑利水村地处山区，周围山势多陡崖峻岭，沟壑纵横，地势险要。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8年6月初的

一天，大雾弥漫，来利水的村民听到一阵飞机驶过的呼啸声，声音由远及近，由小到大，到后来，仿佛飞机就在头顶上掠过，人们正在惊惶不定的时候，突然听到村南的山上“轰”的一声巨响，飞机呼啸之声消失，紧接着听到一阵机器滚落之声。由于当时雾气很大，人们弄不清情况，谁也不敢到山上去看，怕招惹灾祸。

事情过了四五天，人们没有发现什么新的情况，于是偷偷地去山上查看，发现了坠毁的飞机残骸和两个驾驶员的尸体。

据村里老人回忆，日本侵略军的这架飞机是撞在一座当时在日军的军用地图上标为“紫金岭”的山头上(当地村民称为“韦子洼大尖”)。坠毁的飞机可能由于当时做超低空飞行，由于雾大难以辨别航路而撞到山上。

飞机撞到山上，一直滚落到山下。机身被摔得七零八落，散了一坡，正副驾驶员都被摔死。当时村里人没有见过飞机，很是好奇，有人就拣了一些机身碎片残骸，有人将死尸身上佩带的手枪摘走。十几天后，邻近的圣水峪村的百姓又将飞机的两个轱辘卸下搬走。

半个月后，驻房山县城的日军才闻讯带着大队日伪军，来到出事地点，将两具驾驶员尸体运到黄山店村的一个大影壁下焚化，将骨灰带走。同时将飞机上装置的机枪卸下，连同散落的大部分机身运走。只留下飞机发动机，由于笨重，未能运走，后来遇到山体滑坡(泥石流)被埋在山下，至今尚未发现。

事情过后，日军认为飞机坠毁是被驻黄山店的八路军部队击毁，遂对黄山店和涞历水村进行了一次报复性行动，烧毁了村舍，在房山土地上又欠下了一笔血债。

(《房山文史资料》第8辑)

## 石楼惨案

赵连成 口述 王国林 整理

那是“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驻在宛平城的中央军88师和国民党政府军29路军难以抵抗。他们边打仗边往南撤退。当时，我还不足二十岁，我记得：8月13日下午5点多钟，鬼子乘坐4辆大卡车，刺刀上挑着太阳旗，轰轰隆隆地开进了石楼村。

村里老百姓闻讯，纷纷出逃。可是有人说：日本兵跟中央军打仗，不会杀老百姓，咱们是平民百姓，碍不着他们。我对这些话，将信将疑，就没外逃。

日本兵的卡车开到郭家大坑边上，因道路泥泞而陷入泥塘，四、五十名荷枪实弹的日本鬼子杀气腾腾跳下卡车，冲进村里。到处抓人，先后就有三拨人被抓。将被抓的人胳膊倒背双捆，用绳子拴成串儿，十多人一堆儿，共分成三堆儿，我和我爸爸、杨世昌他爹、张四、赵皮匠、还有车顺等十多口子是一堆儿。

我们这堆人被鬼子关在郭士洪家院子里，另外两拨被关在郭振邦家和老张家场院里。天色黑了，鬼子让几个抓来的乡亲帮助烧水作饭。日本兵吃饱喝足了，怕抓来的人跑掉，就开始杀人了。只听鬼子军官叽里呱拉喊了几声话，就开枪了。我听见枪响了，就顺势倒在地上，压在谁身上或被谁压在底下都不知道。后来，我感觉左胳膊钻心地疼痛，就咬紧牙关不敢出声。直到8月14日，太阳出来才渐渐苏醒，浑身是血，我这才发现左臂中了三发子弹。穿了一颗炸子儿，打在我左胳膊肘上，另一颗打在膀子上击穿后，又穿进了肘窝。

日本鬼子杀完人，惟恐还有人活着，就挨个儿用刺刀戳、或一脚使劲踢。因天黑，鬼子还打着“自来火”

照照，见没什么动静，就留下几个兵放哨，把抢攢成堆儿，登上汽车背靠背睡觉去了。

那时，我满身的血迹，因未伤要害而幸免一死，可身上有绳子绑着无法动弹。幸亏被事先藏在庄稼地里的乡亲宋宽发现，他把我的绑绳解开，是他扶着我离开死人堆儿，摇摇晃晃走到了我家“腰南地”，恰巧我二哥在地里，找了一领旧席子，让我躺在上边。二哥给我找了一盆儿凉水，又扒了两块白薯，削了皮儿，我边啃白薯边喝凉水！我说：“二哥啊！快逃吧，反正我伤成这样儿，死活不敢说，你和家里其他人快逃命吧！”我兄弟二人洒泪分了手。

第二天。我伤势稍有好转，带上一床旧被子，忍着伤疼，匆匆忙忙从西营道奔西逃荒去了。日本鬼子在我们村杀害三拨人老老少少共三十五人。至今已有五十七年的光景，这笔血债不能忘记。

（《房山文史资料》第8辑）

# 永寿禅寺惨案

张玉泉

在周口店猿人遗址的北侧翻过一道山梁，即是椅子山，山下是一块三面环山一面沿沟的盆地，约十亩有余，地平如镜，当地人称十亩坪。这里原有元代一太监建的寺院叫永寿禅寺。寺院座北朝南，院里尚有钟鼓楼分立两侧，后院高台阶上尚存三座无梁殿，中为千佛殿，东西两侧为配殿，均已残破不堪。院里原有数十颗松柏和楸树覆盖着整个院落，此寺在民国时期最鼎盛时有三、四十位僧人，每年浴佛节（阴历四月初八日）烧香拜佛者络绎不绝，挤满了寺院。

抗日战争时期，永寿禅寺曾多次遭到日军的破坏。最严重的一次是1938年旧历正月十九日，住在黄院西坡上的抗日救国同盟军胡振海的三路军，发现驻房山的一队日军从县城出发行至周口店东南，胡振海部即向日军开炮。日军寻着炮声即向周口店村西北进攻，很快占领了龙骨山以北的山头。日军冲进永寿禅寺，当时正在庙里教小和尚认字的教师宋雅三（黄院人）连忙举着自制的日本旗迎接日军进院，他向日军解释：“这里没有毛猴子（八路军），都是僧人和给庙里干活儿的。”那个翻译官问：“毛猴子都哪去了？”当时的住持叫能玉；比较年轻，他惊慌失措地说：“……这胡子……不知道，什么叫胡子……”日本鬼子一听，认为他在装糊涂，不像是和尚，便叫跟着来的伪军到寺庙门外抱上几捆苇子，泼上汽油点燃了，就往禅房的窗户里塞。不一会儿，除去千佛殿之外，其余的殿宇和几十间禅房全部被熊熊大火吞没了。中层的大殿因全部是松柏木框架，火舌从窗里往外窜，把院内的松柏树和楸树也点燃了，整个寺院成了一片火海。

这队日本鬼子见火着旺了，连忙往出撤，怕三路军过来袭击。住持能玉象丢了魂似的对大家说：“庙都烧了，咱们也没地方去，跟他们走吧。”一部分人也不知道怎么着好了，就跟在日本鬼子后边。刚出了大门日寇头目又卷了回来。他跟翻译官说了几句。翻译官就让庙里所有的人排成一个横队。他把队里的三个小孩子，一个叫牛志和（9岁）是给庙里放牛的，一个叫常林和小柱子的（10岁、是刚出家的小沙弥）都扒拉出去，说：“你们都到别处庙里去！”没等站齐队，鬼子便举枪向他们射击，人们应声倒在血泊中。

这排队的人中有个叫曹四的给庙里干活儿的民工和一个叫能达的和尚，等鬼子刚要扣动扳机，就在别人身后躺在地下装死。一阵枪响后，横七竖八的死人把他俩压在了底下，鲜血流在他们身上。他俩被遗漏下。

正当翻译官叫他们排队时，还有三个人乘混乱之机躲藏起来，逃了活命的一个法号叫仁慈的和尚，钻进钟楼里躲起来。还有一个叫牛二秃一个叫常海的，是给庙里担水的，一见鬼子卷回来叫排队，他俩就溜进厨房钻到桌子底下藏起来，躲过了灭顶之灾。就这样，前后有八个人幸免于难，其余 21 人全被枪杀(其中僧人 7 人，14 人是附近百姓，有在庙里干活儿的，住闲的，避难的)这 21 具尸体横倒竖卧地躺在寺院大门口内，烧着了松柏树枝的火炭掉在了死者的身上，有的衣服被引着了，有的尸体被烧焦了。整个寺院弥漫着烟雾和异味，大火从上午烧到晚上。十亩坪上一座好端端的寺庙就这样变成了一片废墟。21 具尸体一周后有的被认走了，剩下的被当地乡亲掩埋在附近的山沟里。

日本帝国主义留下的这笔血债，人民永远不能忘记。

(《房山文史资料》第 11 辑)

## 二站惨案

张润生 口述 张玉泉 整理

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不到两个月的光景，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便踏进了房山境内。当时国民党二十九军和地方武装英勇抵抗日军的野蛮入侵，给予沉重打击。这样就使他们更加疯狂、野蛮和凶残，所到之处烧、杀、淫、掳无恶不做。

光我们石楼一带，日军血洗过的村庄，就有很多的无辜百姓被杀。有名的“二站惨案”就是一例。我是“二站惨案”的幸存者，当时我才十八岁。

那年阴历八月十一日我和附近几个村的乡亲们正在石楼村南挖壕沟，为阻止日军南侵，这是国民党二十九军让干的。干了不久，就见日本的飞机一架接一架过来轰炸。后来就听说日军要来了，挖壕的人都四散了，我也回到家里。当天夜里鬼子进村，我一家五口人逃到四个地方避难，母亲和弟弟跑到孤山口，爱人跑到坟山的姑姑家，父亲跑到南边去了，我和村里部分人跑到南庄附近，碰见本村的张忠一家，又跟他们去了二站村天主教堂，听说那里的传教士能保老百姓平安无事。

二站教堂座落在村北，两层大院，有十几间房子。前院住的是给教堂干活的人，后院西侧是能盛一千多人的大教堂，北边是传教士办公用的一拉溜北房，西礼堂小跨院有一条约两米高，一米半宽的地道，从南向北直通北墙外的草地里。

我和张忠等人到了教堂一看，前后院呆满了人，妇女和孩子都在屋里躲着，男的都挤在两个院子里，院里没地方坐，我到后院去找个地方坐会儿，正好碰到我们村的陈西山，便找块木板坐在墙根里。后来教堂统计人数说要做小米饭给大家吃，据说是有 360 多人。

八月十二夜里，日本鬼子进了二站村，当时没进教堂，直到天亮以后才一回回地进去，察看避难的人的情况，这时院里的人谁也不敢出去。八月十三下午四点左右，二站村公所管事的人让男的都出去，大伙儿都以为让男的离开教堂可能是给日本人去干什么活儿，就把我们 110 多人都弄出来，赶到二站村西小西庄大沟里，让我们脱下衣裳检查身体，一头上有戴草帽印儿的说是戴军帽的印儿，肩上有担担的印儿说是扛大枪扛的，脚腕上有打腿带的是绑裹腿绑的，手上有茧的说是捋枪栓捋的。总之，被赶来的全是“八路军或是国民

党二十九军”。每两个端着刺刀的鬼子轰三个老百姓往西边和北边地坎子上赶，上了地坎子便是一片谷地和白薯地。走进不远，在你不知不觉中，小鬼子便使足了劲，从后边一个箭步跨上去用刺刀扎进了你的后背，好端端的汉子，有的跪在地上，有的趴在地上，还有的仰躺在地上，横七竖八的，胸口或脊背上咕嘟咕嘟地冒着鲜血，有的还嗷嗷地叫。这样一拨儿一拨儿的人都被他们杀了。最后还剩下我们十来个人了，鬼子见黑影下来了，又是阴天，就把我们都一齐赶上了北边地坎子。我想跑肯定是跑不了的，南边有一挺机枪架在墙头上，四周还有马队围着来回转游。在以前我听说过有装死后活命的，我想怎么也是这样了，怕也不成了，便决定装死。当几个鬼子开始从前面动手杀别人时，我便顺势躺在了死人堆里，头冲北脸朝东，一动不动了。鬼子把人都杀完了又看了看，还有没有活着的。一个鬼子见我身上没有血，便用粘满鲜血的刺刀扒拉我的头，我没敢动，鬼子就用刺刀使劲向我身上戳了三刀，一刀刺进左臂，一下就穿透了，另外两刀分别刺在右部肋骨缝儿间和右胸上端，我当时穿一件十多斤重的破棉袄，幸好没扎到要害处，才留下这条命。

我一直躺在死人堆里不敢动，快到半夜时，月亮出来了，特别亮，我睁眼一瞧四周还有日本鬼子围着，这时我身上有好多血块儿，感觉又湿又凉，浑身没了一点儿劲儿。

等到月亮平西，我慢慢爬出了白薯地，又爬到教堂后边的玉米地里，想找点儿吃的。忽然听见从教堂里传出两声枪响，估计日本鬼子又在杀人了。后来才知道，小鬼子要强奸避难的妇女，传教士进行阻拦，鬼子当场开枪将传教士杀死，还钉在十字架上。

天放亮了，我在玉米地里见到了一些乡亲，一老妇人给了我一块茄子吃，中午又把我搀过二站来到吉羊村南的豆地里。午后三点左右又遇一个青年给我一块包袱布让我包扎伤口用，还给我弄了些芝麻吃。

阴历八月十五早上，在乡亲的帮助下我走到双柳村河边时，咬着牙脱下棉袄，衣裳粘在伤口上，脱下的满是干血的棉袄都能立在地上。中午我回到夏村，见到父亲及邻居，大家哭成一团。歇了会儿，我让父亲去通知同去教堂避难的乡亲的家属，叫他们去收尸。他们到了遇难地点时，尸体已难分辨，只凭服装辨认亲眷。有的运回家来，有的就地埋掉了。这次惨案共杀死 110 多人，只有我和南庄的一个人幸存。

（《房山文史资料》第 5 辑）

## 太和庄惨案

赵润东

1937 年“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就占领了房、良地区，紧接着，日寇以很快的速度向房山西南地区大举进犯。九月十六日，日本侵略军占领房山县城。九月十七日以后，长沟地区沦陷。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淫掠，致使数百名无辜百姓受尽蹂躏，惨遭杀害。

面对日寇的野蛮行径，房山人民奋起反抗。地方武装也纷纷组织起来。当时，一路（当时称华北抗日同盟军，老乡们称之为“老便”）司令周文龙率领三千余人活动在长沟、窦店一带。其部下朱龙队长带领全队人员驻扎在太和庄天主教堂里。他们骚扰日军，捉拿日本探子，并捆在教堂里进行审讯。由此，一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太和庄惨案发生了。

那是 12 月 23 日（农历十一月二十一）拂晓。天上的繁星还未退尽，许多人还在睡梦之中。日本鬼子全副

武装突然从太和庄村东北的砖窑沟偷袭过来。他们包围了村庄，并在村西交通要道“沿村沟”对面的大坝上架设机枪封锁路口。大约四、五点钟，村东北忽然响起枪声，随后枪声象炒棒豆儿似的响成一片。听到密集的枪声，村中几百名百姓从熟睡中惊醒，吓得不知所措。有的人缩在屋内不敢出门，有的人慌不择路四处乱跑。驻扎在天主教堂里的“老便”听见枪声，举起陈旧的土枪朝着东北方向“砰砰”就是几枪，边撤边喊：“老乡们，快跑吧，日本来了。”随即，枪声、喊声充满整个村庄，人们乱作一团。

一阵枪声过后，日本鬼子便从村东北角跑进来了。村民孙明发现日本鬼子，径直朝村中跑去。鬼子端着枪，一边射击一边追赶。孙明一口气跑到十字街，眼看就要被抓住，他突然一拐弯，跑到于凤全家，这里有个厕所，上面盖着一块大石板，下面埋着一口大缸，里面满是粪便。他急中生智，掀开石板跳下茅坑，蹲在里边不敢露头，日本兵追到这儿；里里外外搜查一遍没人影。孙明幸免遇难。而于凤全的父亲却被发现，日本鬼子不由分说，上去就用刺力挑，于父当场被杀死。

日本鬼子来到村中十字路口，朝着东、西、北各个方向又乱放了一阵枪，紧接着又有个日本鬼子朝秫秸垛、草垛放了火焰喷射枪，大火马上燃烧起来；很快蔓延到住户的房屋。于永生家墙头上的草着了，路北的草房也着了。人们赶紧往外跑。到了门口，见有日本鬼子把守，马上跳墙往南跑。王志平的母亲住在村西北角。听见枪声，又见自家房子起了火，一边跑一边呼喊：“了不得了，把我的房子给点着啦！”她跑到村中，又转头往回跑还嚷：“我得救火去。”一会儿，她跑回家里，泼灭了大火。

日本鬼子见人就杀，见草垛、房子就放火。孙秀一家更惨。全家十四口人，没来得及逃跑，全被堵在家中。无奈，只得扒墙往外跳。结果，跳过一个被日本鬼子挑死一个。这样，被凶恶的日本鬼子挑死七口人。孙士元的奶奶、父亲、叔叔等一家人也拼命往外跑。日本鬼子看见孙奎，端着刺刀就冲了上去。老太太看见日本鬼子要刺杀自己的儿子，冲上去，使尽全身力气，双手把刺刀紧紧攥住。日本鬼子用劲一拽，老太太的手指立刻就断了，鲜血马上涌了出来。这个鬼子又追上去，照准孙奎的后心就是两刺刀，孙奎扑倒在地，惨死在血泊之中。孙士元的父亲见日本刺死了弟弟，背着孩子就往村北方向跑。日本鬼子紧追不放，朝他打了两枪，结果把帽子打了两个窟窿。日本鬼子来到于福家，于福年迈的母亲说：“我们都是好人，别打死我们。”日本鬼子见老太太跑不动，就哇啦哇啦地嚷一阵，示意让老太太出去。老太太吓得哆里哆嗦，背着小闺女就往外跑。结果没跑出多远，日本鬼子就朝她打了两枪。老太太背上的孩子被子弹击中当即死去，鲜血顺着老人的脊背往下淌。王以寿见日本鬼子杀人放火，吓得无处逃跑，就钻进于永家的草垛里躲藏起来，结果被日本鬼子活活烧死。

一时间，太和庄浓烟四起、枪声一片。群众扶老携幼，前呼后拥，没头没脑地顺大道往西逃。日本鬼子穷追不舍追上的用刺刀挑死，追不上的就开枪射击。有些跑得快的刚刚来到沿村沟（现在长沟粮管所墙外），被早已架好的机枪扫射击中。整个一条沟，死难者如同谷个子似的横七竖八倒了一片。其中有孙秀、姜恒一家人、姜茂恒的妻子、姜小奇、李德福兄弟俩，姜玉坤的父亲、叔叔以及所有逃到这里的人。尸体有趴着的、仰着的、蜷着的，有当时未死挣扎、呻吟的。大人被打死了，有的婴儿还活着。刚刚出生几个月的姜家女婴哇哇地哭着，在死尸堆里爬着，其景令人惨不忍睹。

从拂晓到正午，日本鬼子整整扫荡半天，以后从西长沟向东撤走。当他们来到东长沟时，又将四名无辜百姓杀死。人们听得枪声稀了，窥探日本鬼子走远了，这才从四面八方赶回村中。他们来到现场，寻找亲人。一看，大家都呆了。死尸一片，血流满地。有的鼻子耳朵打豁了，有的脑袋开了花，有的浑身穿了很多孔，实在难以辨认。乡亲们怀着极为悲痛和刻骨仇恨的心情掩埋了亲人的尸骨。

在这次惨案中，全村有78人惨遭杀害，有数十间房屋和许多柴垛、草垛被放火烧光。事件已经过去五十余年了，但人们永远不会忘记这段悲惨的历史，人们将永远记住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

# 曹家房惨案纪实

张成基

1942年，抗日战争处于艰苦时期。面对敌人的烧杀抢掠，平西抗日根据地军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给日寇以狠狠的打击，同时付出了血的代价，史家营地区曹家房惨案就是一例。

## 割线

12月6日晚，宛平县四区武装部和区小队接到上级命令，要他们于7日夜在民兵的配合下，割掉西斋堂村西至下清水村东共15华里的电话线，以破坏日寇和伪军的通讯联络，打击日伪的嚣张气焰。接到命令后，武装部立即进行部署，从东小区的金鸡台、青土涧、西岳台调来第一连，又从西小区的史家营、曹家房、莲花庵、秋林铺调来第二连，共调集民兵160名，7日中午集中到莲花庵村待命。下午，区大队长张秀峰、小队长董春印进行了战前动员。张秀峰大队长首先讲了此次活动的目的和意义。他说，由于我们经常破坏敌人的通讯线路，鬼子已把每根电线杆底部用水泥、石块铸了一个三到四米的墩子，墩顶又用水泥将电线杆铸死，相当坚固。周围还用带刺的梢子和铁蒺藜绕着，给我们完成任务造成了很大困难。要胜利完成任务，首先要清除这些梢子和铁蒺藜，打开一个通道，然后架上梯子，爬上电线杆剪掉电线。如果能在一个小时内把这条电话线路毁掉，就取得了一个大胜利。董春印小队长给各村民兵分配了任务段，并做了具体部署。他说，我们夜间行动，敌人不易发现。一旦敌人发觉后追来，区小队要坚决阻截敌人，掩护民兵撤退。到达指定地点后，区小队按原定路线返回莲花庵。区小队的具体任务是，一班到西斋堂村西高地警戒敌人，三班到下清水村外阻击来敌，二班跟随指挥部机动使用。

动员后队伍立即出发，奔向各自的任务段。晚9点半，破交战斗开始。由于民兵们心中有数，战斗紧张而有序，仅用了半个多小时就胜利完成了任务，大部分电线杆被砍倒，收回电线400多斤，还有一部分铁蒺藜。到8日早上8点，各部未遇到敌人，均顺利返回莲花庵。指挥部的领导表彰大家，认为任务完成得很好，给了敌人一次很大的打击，同时指出要防止敌人发觉后对我进行报复，做好防犯准备。

随后，区小队领导开始研究下一步行动。最后决定董春印和支部书记张文亮带一、二班到杨林水村活动，副队长史福成和司务长张成第带三班留在附近活动，可住在曹家房村瑞云观。当天，各班分别行动，三班暂时在莲花庵驻下。10日上午，三班接到区小队长董春印传来的上级命令，当夜配合宛平四区民兵骚扰庙安梁据点的守敌。晚饭后，宛平四区教导员史增智带一个班民兵与三班直奔庙安梁据点。夜10点，向敌据点开了火，双方相互对射了几十分钟。三班撤到曹家房村的瑞云观，庙里的老道看到我们来很害怕，但也同意我们驻扎，11日休息了一天。当夜，驻在杨林水的董春印和张文亮研究认为，三班驻在曹家房处境危险，必须立即撤离，以防敌人围剿。于是当夜10点和后半夜2点连送两村分别插有火柴和鸡毛的急信，命三班火速撤出曹家房赶到杨林水。三班接命令后，准备早上5点吃完饭后撤出曹家房。

## 报复

驻东斋堂、下清水、杜家庄等据点的敌人在8日早上发现电话打不出去,同时又收到情报,告知昨夜来了大量八路军砍倒了电线杆,并剪走若干处电话线。敌人得到消息,惊慌失措,立即下命令,发现八路军立即消灭。在10日夜曾遭我军袭击的庙安梁守敌经过侦察,发现曹家房村的瑞云观里有八路军。于是,赶快布署,密谋在12日早晨包围曹家房村。

12日早晨,在我三班尚未撤出曹家房村瑞云观时,庙安梁的敌人在四点多钟偷偷地从据点出发,顺梁坡上一直向西,由孤石安直扑曹家房村外的东大坨,然后分四路将村子实施了包围。5点左右,我放哨民兵宋振欧听见嘈杂的脚步声,往北一看,发觉日本鬼子已快到身边了,他不敢应战,赶紧向山下跑。由于事发突然,宋振欧没有时间打开手榴弹盖,未能向村里报警。

不久,敌人围攻的消息被我方获悉。约5点半左右,天已逐渐亮了。敌人的枪声响成一片,村里的群众都惊慌起来。三班战士在班长的带领下冲出了庙门,但弄不清鬼子从哪里来的,四面又都有枪声,不知向哪个方向突围。情急之下,三班班长只好带着战士们向西边的莲花庵方向冲去,没料到正碰上东山坡上敌人埋伏的机枪阻截,战士张国权(青士涧村支部书记张国万的弟弟)和任成稳(秋林铺村刚入伍一个月的新兵)当场牺牲,战士任显利的两条腿也被打伤,昏迷过去。敌人追过来,将三人棉衣扒掉,冻在那里。事后任显利被救,送到后方医院将伤治好,回到柳林水村任该村支部书记。当时还有一名军分区的司务员也被敌人打死在山坡上。区小队司务长张成第和军分区另一名后勤人员被抓住,用铁丝穿着锁子骨捆在庙里。鬼子找到庙里的老道张礼成和尼姑陈智芳,查问八路军是什么时间、从哪里来的,一共有多少人等,二人都说不知道,鬼子便将这四个人一起带回了据点。

村里群众认为曹家房村离庙安梁据点较远,中间还隔着大村涧、史家营两个村,沿路又有我方多道岗哨,即便敌人来了,岗上一报警,也能及时跑出去,所以产生了麻痹思想。没料到敌人从村子背面偷袭,枪声一响,就乱跑起来,造成了许多人员伤亡。在这场惨案中,村妇联委员张国敏、民兵张朝辉和张朝汉、村文书宋连居等11人被枪杀,村长杨春的父亲杨德柱等3人被打成重伤,张成第、张礼成、青年抗日先锋队员陈文通等7人被抓走。

## 就义

敌人从曹家房村撤出后,将抓来的7人带到庙安梁据点住了一夜。第二天早饭后,张礼成、陈智芳和群众石廷儒父子被送到清水据点,后经昌宛房联合县委等方面的工作,四人被取保回来。张成弟、陈文通和军分区的那位后勤人员被送到杜家庄据点,遭到日本鬼子的严刑拷打,边拷打边逼问三人说出我党、政、军组织机构以及人名单、作战计划等。三位同志横眉冷对,宁死不说。两名战士只承认是八路军,陈文通咬定自己就是老百姓。鬼子三番五次给他们压杠子、灌辣椒面,施以酷刑,仍一无所获,便气急败坏,决定将三人杀害。

1943年2月2日,敌人在杜家庄设立刑场,召集所辖各村群众前往。三位被捕同志被带到刑场。经过五十多天的非人折磨,三人早已遍体鳞伤,寸步难行。当日军头头宣布执行时,敌人先放出了数条狼狗,冲三人乱啃乱撕。张成弟三人临牺牲前声音嘶哑地冲群众大喊:“同胞们,别伤心!中国人是杀不绝的!日本的狗命长不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最后胜利是我们的!”日军头头见此情景,慌忙命令鬼子用刺刀向三人猛刺,三位同志倒在了血泊之中。

三名同志的牺牲,激起了平西根据地军民更高的抗战热情,他们肩负起烈士未完成的使命,又开始了新的战斗。

(《房山文史资料》第13辑)

## 黄院村惨案

宋 湘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者策划“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国民党中央军部分爱国将士进行了顽强抵抗。8月中旬中央军在房山大石河沿线布防，与日寇展开激战。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中央军终于溃败南逃，9月16日日军占领房山县城。

敌寇逼近，老百姓人心惶惶，纷纷逃亡。我的故乡黄院村地处房山城西20里、周口店镇西8里的一道山沟里。我全家人于9月9日（我出生刚刚7天）沿岳各庄、长沟、南尚乐、张坊一线逃至涞水县沈家庵村。

国民党军队南撤，日寇继续追击，主战场南移，房山地区短暂平静，逃难的人们陆续回家。我全家人也回到黄院村。此时，乘乱从房山县监狱逃出的胡振海、白秀亭以及周文龙、陈东来等人迅速纠合中央军的一些散兵及当地农民组成十路杂牌武装，打起“抗日救国同盟军”的旗号，一时声势浩大。由于这些人是一群乌合之众，没有明确的政治方向，他们既打日本人，也残害当地百姓，所以不仅没有得到群众支持，反被百姓称之为“土匪”。其中“三路”司令胡振海系房山县周口店镇娄子水村人。周口店地区不少人参加了“三路”。“三路”司令部即设在娄子水。北距娄子水只有6华里的黄院村成了“三路”的驻地。1937年11月，“三路”乘日寇“后方”空虚之机，曾两次攻进房山县城。日寇遂调集重兵围剿。

1938年2月18日（旧历正月十九）凌晨，日寇从周口店出发讨伐“三路”。行至周口店猿人遗址（龙骨山）北面椅子山腰十亩坪永寿禅寺，屠杀寺僧及避难群众20余人（其中有黄院村民宋甲三），然后放火烧毁禅房数十间。

日寇从龙骨山沿鹰窝岭、木岩寺、金山寺、阳溪岭一条山路向西进袭，上午到达黄院村龙宝峪（黄院村包括上黄院、下黄院、龙宝峪三个自然村；龙宝峪在上黄院以西3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龙宝峪始建行政村与黄院村分离）。此时“三路”早已闻风而逃。日寇抓住龙宝峪村民10余人，谎称“中日亲善”，让人给上、下黄院捎信“只要欢迎皇军，皇军一律优待优待的；如果不来欢迎，就要杀得鸡犬不留”。上、下黄院一些村民听信了日寇的欺骗宣传，也惧于“不欢迎就杀人”的威胁，当日下午10多名青壮年一起到达龙宝峪村。日寇先后将这30人驱赶到龙宝峪上新房一个山神庙前的院子里，院墙上架起机枪。夜幕降临，日寇凶相毕露，枪声大作，30名乡亲刹时倒在血泊里！然后，日寇又往乡亲们身上浇上汽油，架上柴禾，放火烧尸，其状惨不忍睹！

大屠杀后，日寇又到处搜捕藏匿群众。当得知大劈柴沟一个煤窑里有人时，便在窑口堆上柴草点燃，浓烟灌入窑筒，10余人窒息而死。我的伯父宋兆林等人躲入通风道幸免于难。

就在日寇将要开始大屠杀时，上黄院村民宋纯见事不妙，乘鬼子不备之机越墙逃回。进村就大喊：“老乡们快跑吧，日本鬼子在龙宝峪杀人啦！”村中年轻人有的被骗至龙宝峪杀害，有的提前逃走，尚在家中的都是老弱妇孺，纷纷向各条山沟避难。我的母亲抱着出生不到半年的我，我的伯母领着我6岁的堂兄、3岁的堂姐，逃到村东约2里地的金山寺沟一个山洼里隐藏。日寇连夜从龙宝峪到了上黄院，先抢掠财物，又放火烧毁民房数十间。我的出生地、我家南园子的两间西房也被完全烧毁。

日寇见村中无人，便到各山沟搜捕。在金山寺香水泉煤窑及附近山洞搜出10余人带到金山寺，连同寺中道人一并枪杀。日寇没有发现我们的隐藏处，我们幸免于难。据长辈人后来对我说，当时村中火光冲天，

浓烟蔽月，金山寺杀人的枪声、惨叫声清晰可闻。2月19日(正月二十)清晨，日寇撤回周口店。

当时，上、下黄院和龙宝峪合起来仅有百户人家，一夜之间被日本鬼子残杀50余人，烧毁房屋百余间。全村顿时陷入一片凄惨的悲啼之中。从我记事时起，家长及村中长辈都不断给我讲述故乡这一段血泪历史。至今我尚能记起当时遇难的部分乡亲的名字。

在龙宝峪上新房遇难者：

宋 巡 我的祖父宋莲的胞弟，因排行第三，又是麻面，故人称“麻三”。

宋 泽 六、七十年代曾任村支部副书记、生产队长的宋克平的三叔。

宋清泉 五十年代曾任村支部书记的宋绍堂之父。

宋 堂 六十年代曾任大队会计的宋克社之父。

宋 维 六十年代曾任村支部书记的宋守义之父。

张国栋 我家东邻张国梁之兄。

张 顺 张国梁之弟。

武七爷 五十年代初曾任村支部书记的武孟荣之弟。

张士琪 我家东邻张士文之兄。

宋 × 宋侃之弟。

宋克× 宋克恩之弟，小名“夹板子”。

李 凯 下黄院人。

李 × 下黄院人，宋克平之妻李凤兰之伯父。

李 贵 下黄院人，李怀金之父；当时遭枪击、火烧未死，抬回家后精神失常，三天后死去。

在金山寺庙前遇难者：

宋天凤 宋克通的祖父。

付 × 付振全之父。

张老道 张国梁之弟，金山寺道人。

李廷玉及其妻、子、女一家6口。

国恨家仇，世代难忘。明年2月18日是我的乡亲们遇难65周年纪念日，谨以此文表示对遇难乡亲们的深切悼念！也表示对日本军国主义不散阴魂的声讨与警惕！

(《房山文史资料》第16辑)

## 今昔永定河

奉有鹏

永定河——在房山区的东部边境，是有名的地上河。河底比堤外村庄高出四至五公尺。是首都和房山区防汛的重点，大河西堤是保卫房山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屏障。

1985年中央将永定河确定为全国重点防汛的“四大江河”（即长江、黄河、淮河、永定河）之一。

永定河的堤防工程，始建于清康熙三十七年，直至解放前夕，除了有七道老丁坝和临时性的埝工之外，根本没有永久性的护岸工程。解放后，五十至六十年代，做了一部分砖护坡和短丁坝，并且铺设了一些铁丝石笼，但是都做得很浅，未超过河底冲刷深度。七十年代以后，才开始改做浆砌石护坡，铁丝石笼护底至冲刷深度以下的永久性工程。截止到1985年，累计完成3604米。在大宁险工段，做了浆砌石直墙加前戗护岸工程875米，1980年又在北京市水科所的帮助下，试做了163米长的沥青铺垫护底，砼予制块，用水泥砂浆和沥青砂填缝的护坡工程，总计加固险工4642米。对于浆砌石护坡工程也是逐年发展和改进。1978年以前，做的是浆砌毛石护坡。1979年至1981年，又改做了毛料石混合式护坡。1982年以后，通过进一步改进，做的全是浆砌料石护坡。不仅质量上有较大提高，而且外观上也显得平整和美观了。

堤防管理机构，远在清朝时期，房山（当时为良乡）管所内在朱岗子和公议庄先后都设立过“水衙门”，河官为六品（良乡县系为七品），可直接命令良乡县令，对破坏堤防者，有直接处罚的司法权力。但是尽管如此，对永定河说来，仍然是经常泛滥成灾。据历史记载，永定河每隔几年就要决口一次（1800年至解放前夕，西堤决口约三十次）。1924年（民国十三年），夏场村东大堤决口，全村房屋全部被洪水冲走，劳苦人民妻离子散，离乡背井，外出逃荒。当时国民党的“水衙门”不但不顾人民死活，反而借大堤决口，大肆搜刮民财，工程未作几处，大量的钱财都流入了贪官污吏的腰包，所以既未除害，也未兴利，堤防内外，沙丘起伏，杂草丛生，真是一片凄凉景象。故有“盐碱沙黄芦苇草，夜间睡觉蛤蟆吵”的民谣。

解放后，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沿堤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了主人，积极地投入了沿河治水的斗争，加强了对永定河的管理、整治，还新建了大量的防洪抗洪工程，确保了堤防安全。1956年以前，虽然也出现过几次较大洪水，但是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经过沿堤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努力，没有发生过决口事故。沿堤人民的生产、生活也随之而发生了变化，依靠集体的力量，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平沙丘，战荒滩，引永定河水建大宁灌渠，使当年的盐碱沙荒，变成了稻麦两茬的高产农田，作到了除害兴利，改变了落后面貌。

在管理机构的建设上，“永定河防汛指挥部”是在1949年建立的。但还只是解放初期的一个临时性汛情机构。随着形势的发展，于1959年正式建立了作为常设专管机构的“永定河办事处”负责管理河道堤防的日常工作。逐步建立健全了堤防管理的规章制度。为了便于防汛、施工和造林的取土用土问题，根据历史习惯。规定了大堤内外坡脚两侧，各有三十米宽度的护堤地。其所有权属于国有，所有护岸丁坝上下游坝脚以外，亦有十米的取土区属于国有。对于防汛，工程检修以及护堤林木的管理，都有相应的制度，就其性质来说，纯属于单一的国家管理。到1964年根据水电部指示精神，实行国家专管与群管相结合的办法，由沿堤长阳，葫芦堡、窑上三个公社（乡）十七个大队（村）三十六个生产队，抽调护堤员三十八名，到大堤常年担任护堤任务，组成了群众性的社队护堤员队伍。这支亦工亦农的管理队伍，在保护堤防工程设施和植树造林等管理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十年浩劫影响了堤防建设的发展速度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加之地理环境处在僻壤荒郊，战线长，交通不便，职工的生活条件差，思想不稳定纷纷要求调动工作，也给永定河堤防建设带来了一定困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通过三中全会文件的学习，解放了思想，锐意改革，除作好防汛和施工外，还充分利用大堤的水土资源和有利条件开展了综合经营，种粮，种菜，种苗圃还发展一些养殖业。从1981年起办事处做到了经费自给，同时也改善了职工的生产和生活条件。1982年以后，用自己的资金，新建了办公宿舍大楼1100平米，改建和新建了管理所的平房17间；美化了庭院新建了假山、鱼池和花圃，新制了家具和办公桌椅，室内陈设有沙发，茶几，风扇和彩电。各管理所都设置了半导体收音机，电视机和电扇……1983年还拿出一万二千元的资金，给县水利局购置锅炉和暖气片，1984年上交利润两万元；1985年在上半年就提前超额完成了水利局下达的利润指标。

今天，一进永定河办事处的大院，再也见不到过去那所破破烂烂的“大车店”了，在你面前呈现的是一座优美的花园和干干净净的办公大楼了。

防汛专用的通讯设备，在上级领导的支持下，已将电话明线改为架空电缆，并且在汛期，还增设了防汛电台和管理使用北京防汛自动化雨情遥测系统(用电子计算机控制的测报仪器)加速了汛情的测报，使汛期的通讯报讯工作得到了有力保障。

(《房山文史资料》第1辑)

## 致《房山政协报》编辑部的信

王乔年

《房山政协报》编辑部：

编辑同志，您好！

在最近，一个偶然的机会有幸拜读了贵报总第四期(1986年11月28日)，其中刊有署名赵润东写的《从当“国大”代表到参加北平和谈》的一篇文章，其中有点疑问，请恕我冒昧地提出来向赵润东同志请教。文章里还有一处提到有关国家领导人朱学范副委员长的历史身份问题，与事实不符，应当予以尊重更正。

### 质疑

(1)文章里提到郭维农先生竞选“国大”代表之事。按：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举行国大选举并召开伪国大有两次：一次在1946年11月至年底，这就是历史上所指的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破坏政治协商会议(指旧政协)决议，单方面非法召开伪国大”那一次。亦即国民党历史所谓的“立宪国大”。因为在那次“国大”上通过了伪“宪法”，为蒋介石要当伪总统铺平道路，提供“法律依据”。其实那次所谓的“国大选举”，并没有举行真正的普选，只不过由各省、市、县的国民党党部指定而已。另一次“国大选举”，即文章里所提到的“1948年初，选举在旁山县伪参议会进行。”据我所知，当时北平市的“国大选举”是在1947年秋举行。事先在1947年夏先举办“候选人登记”，这种“登记”有严格的条件限制，仍等于变相的由国民党指定。所谓“举行普选”，不过是掩人耳目而已，这次“国大”是在1948年四月间召开的，即国民党历史上所谓的“行宪国大”，在那次“国大会议”上，蒋介石当选为伪“总统”。李宗仁当选为伪“副总统”，实现了蒋介石想当“总统”的美梦。——郭维农先生当选“国大”代表，当然是指1948年上半年里的所谓“行宪国大”了。

(2)文章里提到：郭维农先生曾见过蒋介石、李宗仁、孙科、俞国柱和“英德惠”等人。“英德惠”可能是莫德惠之误吧？

(3)文章里所提到的：郭维农先生曾参加“国民党社会人员集训队”。据我所知：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在抗战胜利后曾举办两期对工会、农会干部的培训。它的全名是“中央训练团社会工作人员训练班(农工干部班)。”时间是：第十期——1947夏(六、七月间)。第十二期是1948年四、五月间。班主任是国民政府的社会部长

谷正纲和国民党中央农工部长马超俊。郭先生所指应是该训练班第十二期。

(3) 文章里提到：“1949年四月，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和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在北平和谈失败。留在北平的‘国大’代表则组成‘华北人民和平促进会……’”。我记得：一、“华北人民和平促进会”是由华北五省两市(平、津、冀、晋、热、察、绥)的参议会和北平、河北的群众团体所组成的。当然，代表中可能有的人具有“国大”身份，然而该会却并非“留平国大代表所组成”的。郭维农先生就是以“河北省农会代表”身份署名参加的(当时郭先生是用郭树棠的名字签的名。)二、文章所述时间有误。“华北人民和平促进会”是北平解放前夕，北平城被解放军包围后于1948年底成立的。该会派出城的、促和代表团的时间是1948年1月18日下午二时许。而南京和谈代表团是在北平解放以后，解放军大举渡江之前来到北平的。文章叙述的先后次序恰恰是颠倒了的，应改正过来。

(4) 文章里最后提到：“夜里谈判开始。解放军政委莫文骅(现炮兵司令员)代表叶剑英讲谈。”其中所说莫将军是“炮兵司令员”，应改正为“装甲兵政委”。

### 请予更正

文章说：“……在‘国大’开会期间，他(指郭)与现在的国家领导人朱学范(当时为国民党中央政府邮电部长)并排而座。”这与历史事实不符。朱学范同志是我国工人运动杰出的领导人之一，北伐时期是全国邮政系统工会组织的发起人。后来曾任全国劳动协会理事长，他还是世界工联副主席。1937年，他响应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于1938年起即采取与陕、甘、宁边区总工会成立联合组织的各种步骤，后来又与解放区工会联合会共同发起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那次会议上，朱学范同志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以后，全国劳动协会参加“全总”为团体会员，继之又自动结束“劳协”组织，与“全总”在组织上统一起来。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出任了新中国的第一任邮电部长。朱学范同志出身于旧中华邮政，是上海邮局的中级职员，他担任全国劳动协会理事长以后，即追求进步，响往革命。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开始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所以自那时以后，他就处处响应共产党的号召，逐渐把全国劳动协会组织引导到与解放区工会组织合作的道路上来，使之更有利于革命的发展。1945年10月，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谈判，签订了历史上有名的“双十协定”。嗣后，几经波折，又在1946年1月于重庆召开了有各民主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史称旧政治协商会议。)经过艰苦斗争终于达成了政治协商会议决议，确立民主建国纲领，举国欢庆。不料“双十协定”与“政协决议”墨迹未干，蒋介石就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撕毁“协定”与“决议”，企图单方面非法召开伪国大，再次发动内战，并制造了血腥的“一二一”惨案与“校场口事件”，打伤民主人士郭沫若、朱学范、马叙伦等多人。蒋介石为了伪造民意，要求全国劳动协会发表声明支持国民党非法召开的伪国大，遭到朱学范同志严词拒绝。自此以后，朱学范同志即遭到国民党的种种迫害，致使全国劳动协会不能进行正常活动，“劳协”被迫不得已于1946年11月间迁往香港，朱学范同志与易礼容同志(“劳协”领导人之一。)在香港组成了中国劳动协会临时中央总部，并发表声明，揭露国民党的种种阴谋与暴行。并命令在国内的“劳协组织”转入地下。因此蒋介石对朱学范同志恨之入骨，派军统特务到香港把朱学范同志刺伤。嗣后，朱学范同志即去欧洲参加世界工联大会，会后，应苏联工会代表的邀请去莫斯科疗养。伤愈后即转道回到祖国东北解放区哈尔滨，并参加了在那里举行的全国第二次劳大。

从时间上讲，朱学范同志从1946年11月以后即被迫流亡到国外后来由苏联转道进入东北解放区。他绝不可能在1948年4月国民党召开的伪国大会议上与郭维农先生“并排而座”。这显然与历史事实不符。

从朱学范同志的个人经历上讲，他是旧中华邮政职工出身，终生从事工人运动活动，从未做过国民党的官员，何来“当时他是国民党中央政府邮电部部长”之说？

从国民党南京国民政府(中央政府)的组织系统上讲,它并无邮电部的设置,只有邮政总局和电信总局,它们均隶属于国民政府交通部管辖(当时的交通部长是俞大维),又怎么能有“朱学范当时是国民党中央政府邮电部部长”之说?

故此请贵报编辑部调查核实,予以更正为感。

此致

敬礼!

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常委、前全国劳协驻北平联络员

王乔年

1988年10月15日

(《房山文史资料》第2辑)

## 致房山政协文史办的信

赵润东

政协文史办公室:

关于东城文史办公室转来王乔年先生对原《房山政协报》中《从当“国大”代表到到参加北平和谈》一文提出质疑问题,现给予回复:

1. 质疑中提出“文章里提到郭维农先生竞选‘国大’之事,时间应为1948年上半年的所谓‘行宪国大’。经再次与郭维农了解核实,认为“质疑”提法正确。
2. 质疑中提到英“英德惠”可能是莫德惠之误吧?这一问题在报纸出版后即被发现,实属排版印刷误。
3. 质疑中提到“郭维农先生曾参加‘国民党社会人员集训队’应为‘中央训练团社会工作人员训练班(农工干部班)’”。经与郭维农核实,郭认为该提法正确。
4. 质疑中提到关于北平和谈的时间颠倒了的问题,郭维农因年纪已高,又年深日久,因此讲记不清了。
5. 关于莫文骅“炮兵司令员”应改正为“装甲兵政委”的问题,与郭维农谈及此事,郭讲当时记不清了,王乔年委员提法正确。

关于现在的国家领导人朱学范当时为国民党中央政府邮电部长并与郭维农并排而坐这一问题,王乔年先生佐证了大量材料,并提出非议。本人带着这个问题两次找到郭维农,反复核实是否与朱学范并排而坐,郭维农先生一口咬定,确定无疑。郭讲,当时双方交换了名片,片子上署名是朱学范,郭署名“郭树棠”。王乔年先生在证明材料上讲得较为详细,无论“从时间上讲”,还是从朱学范同志的个人经历上讲,郭维农都不可能与其“并排而坐”,“这显然与历史事实不符”,然而,郭维农先生当时只有三十九岁,会议期间又交换名片,郭维农先生所讲“并排而坐”大概不会是年高胡涂而言所至。另外,王乔年先生佐证出“朱学范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他出任了新中国的第一任邮电部长”。而郭维农讲他“当时为国民党中央政府邮电部长”,这可能是郭对当时的朱学范同志不甚了解所至。

以上提出的“质疑和更正”,本人又两次找到郭维农先生了解,交谈回忆当时情况,现将调查核实(只对

郭维农所讲)结果写出,再次交到办公室,以作回复。

此致

敬礼!

房山区政协文史委员会委员 赵润东

1988年12月6日

(《房山文史资料》第2辑)

## 致《房山文史选辑》编辑部的信

王乔年

编辑同志:

您好!

上次我写给《房山政协报》编辑部的信,蒙您赐予刊登在《房山文史选辑》第二辑的“求同存异”专栏里,同时又发表了赵润东同志的复信。对此,我表示深切的谢意。

为了澄清国家领导人朱学范先生的历史事实,我再次写了这封信,并向赵润东同志商榷。

(一)《选辑》第二辑刊载我的原信,有两处错字,请赐予更正:

①第124页第一段末尾,“予以尊重更正”,应为“郑重更正”。

②第127页第一段末尾,“全国第二次劳大”应为“第六次劳大”。

(二)赵润东同志的复信曾讲:经反复与郭维农先生核实,“郭维农先生一口咬定”曾在伪国大与朱学范先生“并排而坐”,并说:“当时双方曾交换名片”,这是“确定无疑”的事实。赵润东同志并说:“当时郭维农先生只有三十几岁,会议期间又交换了名片,郭维农先生所讲曾与朱学范先生并排而坐,大概不会是年高糊涂而言所至”。

为此,我曾走访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工运史资料办公室”前主任陆象贤同志,蒙他送给我一本由他主编的《中国劳动协会简史》,(陈云同志题写书名,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据此,我摘录了书内有关朱学范先生1946年11月12日被迫出国后的行程顺序以为佐证,证明在1948年四、五月间伪国大在南京召开之际,朱学范先生正在东北解放区哈尔滨市为筹备召开全国第六次劳大而操劳。朱先生分身乏术,不可能身在解放区而同时却又在南京出现而参加伪国大。而且,朱先生是为反对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反对国民党非法召开伪国大、拒绝拥护伪国大而遭到国民党的迫害与通缉的,因而被迫出走香港,并在香港被国民党派遣特务所刺伤的。因此,朱先生也绝不会违背自己的宗旨而后来去南京参加伪国大的。这是历史事实,不容歪曲。

以下是《中国劳动协会简史》中对于这段期间史实的摘录。

(1)1946年11月12日,朱学范先生被迫出国到香港,同时中国劳动协会总部也被迫撤到香港办公,成立“劳协”临时中央。(《劳协简史》104页)

(2)1946年11月25日,朱学范先生在香港被国民党派遣特务刺伤,住进玛丽医院。(《劳协简史》第104页。)

(3)1947年6月1日,朱学范先生与刘宁一同志一起,到达捷克首都布拉格,参加了世界工联的三个会议。(执行局会议、执委会议、理事会议。)(《劳协简史》第110页。)

(4)1947年11月,朱学范先生到达法国首都巴黎,出席世界工联执行局会议。(《劳协简史》第113页。)

(5)1947年末,朱学范先生到达瑞士日内瓦,参加国际劳工组织理事会议。(《劳协简史》第113页。)

(6)1948年1月,朱学范先生接受中共中央邀请,途经苏联去我国东北解放区。同时,接受苏联工会中央理事会的邀请,在莫斯科曾做短暂参观休养。于1948年2月28日到达哈尔滨市。(《劳协简史》第115页。)

自1948年3月15日以后直至同年8月1日,在东北解放区参加全解放区职工代表大会及全国第六次劳大的筹备工作。(《劳协简史》第116页至118页。)

(7)1948年8月1日,全国第六次劳大在哈尔滨市开幕,8月10~11日,朱学范先生在六次劳大上做了《国民党统治区的职工运动》的报告。(《劳协简史》第120页。)

(8)1948年8月22日,六次劳大闭幕,朱学范先生在会上致闭幕词。(《劳协简史》第120页。)

(9)在全国第六次劳大会议上,朱学范先生当选为执行委员,并被选举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劳协简史》第120页。)

由以上记载证明:朱学范先生自1948年2月28日到达东北解放区哈尔滨市起,直至同年8月22日第六次劳大闭幕,朱先生做了上述的一系列繁多的活动,从未离开解放区。况且朱先生自1946年11月12日被迫出国以后,也从未再回到国民党统治区,这是历史事实,是有档案可查的。他根本不可能出现在南京伪国大会议上。又何来与郭维农先生“并排而坐”呢?

那么,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邮政工会系统的高层次领导人中有没有参加南京伪国大会议的人呢?答曰:不但有,而且是有人在。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水祥云先生(现在在台湾)。他的工会职务头衔是:上海市总工会理事长、全国邮务总工会(该会不设理事长)常务理事兼组织部部长、全国总工会(该会不设理事长)秘书长,同时他也是中国劳动协会的右翼领袖人物之一,他曾担任过“劳协”的常务理事,并曾一度任该会书记长等重要职务。就是他,在朱学范先生被迫出国以后的1946年11月17日,与当时的国民政府社会部训导司司长陆京士相勾结,盗用“劳协”的名义,在上海《申报》上发表拥护伪国大的电文。朱学范先生立即在1946年11月18日的香港《商报》上发表声明,予以反击、驳斥,做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水祥云先生就是以出卖“劳协”有功,受到国民党的赏识,在“国大”会议上当选为主席团成员的。我想,郭维农先生会认识这位水祥云先生的吧?

最后,让我再说一句,我上次写给《房山政协报》编辑部的那封信,是曾经请朱学范先生看过的,事实不会有出入的。故此,再次请您进一步调查核实,予以更正为感。

我们应当遵照已故周恩来主席的教导,对文史工作要做到“存真”、“求实”。因此不避繁琐的再次提出商榷意见,请您原谅。

此致

崇高的敬意!

王乔年

1989年7月30日写于北京

(《房山文史资料》第3辑)

## 住持盗经版 县令查办

田福月

著名的佛教圣地房山的云居寺的石经，始刻于隋大业年间。历经唐、辽、金、元、明六个朝代，一千余年。刻经 1122 部，3372 卷，刻石 14278 块。工程之大，历史之悠，可称世界之最。在这样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怎样保护这珍贵的历史文物。是极不寻常的问题。明代曾发生过寺内主持盗石经渔利的事件。

据《白带山志》载，明代万历年间，朝廷对房山石经极为重视，视为国宝，曾派憨山和紫柏(注)两位名僧到云居寺参拜佛教石刻大藏经、了解保护情况。同时察看了佛宝(佛舍利)的保护和珍藏情况。然而却招至了当时的主持僧擅发贪欲之心。在两位名僧视察不久，便进行了挖掘盗卖石经的活动。从中渔利。据日本学者本善隆在(1935 年)《东方学报》上载：“在压经塔下的东南丛林中有一块小碑，碑文字样格式如下：

房山县奉 巡关察院明文

照得西域寺塔下有石刻藏经，被主持僧人擅发渔利，深可痛恨。

除究革外，仍委房山县曲史督，用砖、石修砌永不许开发以致损坏。违者该县严行究处，勿得宽纵，故兹刻石禁示。

万历十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奉立

从这块碑文来看，寺僧挖掘石经贪渔利是从明代开始的。到了明末，有知县的命令(指碑文)寺院才得复兴。

本善隆在文章最后写到：“我访问的时候(1935 年春末)还有这块小石碑，对以后的人说起这件事时，都说没有这块碑了。”(是否在 1939 年日伪修岗楼拆南塔时没了，已无法考证)。

从此碑文上已雄辨地证明：历史上确实有寺中僧人盗卖石经的不道德行径。同时亦证明当时的县令通晓保护历史文物的重要，其有远见卓识的眼光。

注：

憨山，名德清；紫柏，名真可、字达观。二僧同是明代四大名僧成员。明万历十五年到云居寺探宝。时过五年(即万历二十年)二位经手将云居寺的佛舍利运往京城皇宫中供奉。

(《房山文史资料》第 8 辑)

## 日军在房良地区暴行大事记

区史志办

自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 20 余日，日军侵入房良。迄 1945 年 9 月 2 日，日本政府正式签定无条件投降书，各地侵华日军始按中国政府指令撤退，残踞房良之日军，自房山、良乡、张坊、塔照、长沟等据点撤

至良乡、琉璃河火车站,乘火车再倒轮船辗转返国,凡八载有余。日军在房良这片土地上所犯罪行,有文字记录或由历史见证人回忆而有案可稽者凡数十端。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期间房良两县被日军杀害之无辜百姓约2540人,被烧民房14688间。而实际数字,当比这要大得多,可谓罄竹难书。兹辑录一二,以做历史见证。一则可揭示日本军国主义者丑恶面目,另则可鉴示后人,勿忘国耻,而时时励民族自强之志。

8月1日:日军侵占良乡城。

8月18日:因17日夜,退至琉璃河之中国守军自东南角攀入,袭击侵据良乡城日军,以大刀砍杀日军数十名。日军疯狂报复,杀城内无辜百姓数十人。

9月15日:日机轰炸房山城,城内烟焰弥漫,瓦砾成堆。城东北角监狱铁门炸开,数名死刑犯惊惶逃散。

9月15日至17日:定府辛庄遭日寇铁蹄践踏。因该村百姓曾助中国守军掘战壕,送弹药,击退日军数次进攻。日军穷凶极恶,于该村连续烧杀三日,计杀死无辜百姓60余人,焚烧房屋无数。

9月16日:日军占据房山城,并兵分数路,血洗房山城附近村庄。一路由乔本带领,进袭山口、良各庄、西庄一带,一路日军直扑寰店、望楚、于庄、苏村、下坡店,另一路奔坨头、支楼、梨园店……日军逢人就戮,刀枪齐下:坨头村被杀40余人;支楼村被刺刀挑死14人;双柳树村被枪杀39人。过石楼村时,坦克陷入泥塘,日军抓村民37人往外牵曳。坦克牵出泥塘,日军则将这37人尽数捆绑,并驱赶至一处院落,集体枪杀。连被零星杀害者在内,石楼村被日军杀死凡50余人。

9月17日:一路日军践踏交道、北柳子、丁各庄、大韩继、南韩继、云峰寺等村,另一路则进袭西长沟、东良各庄、双磨、坟庄一带。其中双磨村被杀10人,西长沟被杀8人。日军进入某村,为满足淫乐,将村中男人集中一起,扒光衣服排好队,令村中女人观看。

同日:二站惨案发生。自9月14日起,二站村及附近村庄逃难百姓数百人,相继躲入该村天主教堂避难。女人、儿童躲进地窖,男人则于院内闲散隐蔽。是日上午,日军闯入教堂,先将法国神父枪杀于院后。下午,天降细雨,大屠杀开始。日军将百余人分三批带到村外,列队以排枪射杀,未死者则用战刀砍死。除20余人在押至村外途中逃掉外,计80余人遇难,尸横遍地,血腥十里。

9月19日:日军进袭后闫村,将6名百姓押至一薯井旁,一人颈上一刀,杀死推入井内。

8月20日至9月20日:坨里一地被日军杀死130余人。

9月×日:日军窜入江村,以长绳将8名百姓串缚,用战刀砍死。

10月17日:日军先以飞机至千河口村上空侦察,继之趋兵包围。村中百姓大部逃散,16人被捉。日军将16人每人一刀一枪,杀死后推至崖下。尔后又遣飞机轰炸该村,致6人殒命。

10月19日:日军将千河口村90余间房屋焚毁。

12月22日:因华北抗日救国同盟军周文龙部于太和庄、西长沟一带驻扎,且司令部即设于太和庄天主教堂内。是日夜,自涿县县城起程之日军七八百人悄悄将东长沟村包围,并有一支由太和庄村北围堵。翌日拂晓,双方交火,周见日军来势甚猛,遂率部仓惶而逃。太和庄百姓亦于慌乱中出逃,仓惶中不辨方向,向南向西逃遁者侥幸得脱,向西北沿村方向出逃百姓遭日军机枪扫射,老少妇孺计76口陈尸于村外荒沟。日军进村,又挨户举火延烧,火光冲天计烧毁房屋200余间。是日,东长沟百姓亦有37人蒙难。

1939年4月:日军以重兵2000余向平西根据地进犯。进袭房良之日军自房山城出发,经南窖、下石堡,直扑霞云岭、东村一带,因遭根据地军民反击,很快败退,败退时沿路烧杀。计15村房屋被烧,多名妇女遭辱。

1940年3月9日至22日:日伪军近万人分十路对平西根据地“扫荡”。进犯房良根据地之日伪军分别从河北、红煤厂和南窖出发,袭击大安山、柳林水及下石堡等地。此次日军扫荡,仅金鸡台一村,即有31人被杀,150余间房屋被烧。大安山损失更甚:42人被杀,900余间房屋被焚,15万斤粮食被掠,禽畜几乎

被抢掠一光。

1940年10月12日至26日：日伪军再次对平西根据地扫荡，进袭房良根据地之敌，自大石河谷和拒马河谷两路分进，至东村一带合击。十渡村700余间房被烧；前石门被烧房屋100余间；平峪村被焚房屋597间，羊棚30个，两位未及转移老人被枪杀。秋林铺、莲花庵、史家营、金鸡台等七村大部房屋亦被烧。

（《房山文史资料》第9辑）

# 日军在米粮屯、詹庄村一带的暴行

孙寿郃

“七七”事变后，活动在良乡、宛平一带有两支地方武装。一支是以晓幼营村地主王凤来和王庄村恶霸高洪钟为首的联庄会。另一支是活动在米粮屯、詹庄、安庄、大马村一带的“箍子军”。“箍子军”为首的有石羊村的王昆、段昆和固村的杨贤等人。

1937年农历十一月初，“箍子军”收缴了米粮屯村村民七支用于自卫的枪，并与王凤来高洪钟开了仗。王、高的人马损失很大，于是便对这一带村民恨之入骨。王凤来投降日本后便想借助良乡、长辛店日军的力对曾经驻扎“箍子军”的米粮屯、詹庄、安庄等村进行报复。

农历十一月十三日，天刚蒙蒙亮，米粮屯村民老早起来，有的在给牲口铡草，有的忙着收拾货物到良乡赶集。就在这时，日本鬼子进村了。紧接着枪声、惨叫声连成一片。

“日本杀人啦，赶紧跑哇！”村里住大庙的老道疯了似地跑进做小买卖的郑德贵家。当时院中有六个人正在铡草。一个姓马的村民冲着老道嚷：“跑什么！日本人也是人。是要钱是要粮，我给他们立字据。”日本兵在大门口一露头，他迎上前：“我们是铡草的！我们……”鬼子兵二话不说，一阵乱枪把六个人都撂躺下了。随后点着房子和草垛。

马连志的母亲在农历十一月十二日夜里刚生下小孩，日本兵端着刺刀闯进来，冲着马连志的母亲和接生婆的肚子就是几刺刀，肠子流了一地。就连刚出生的婴儿也被日本兵用刺刀挑死了。

村民王连，那年十七岁。那天早晨他正在门口干活，爷爷王理熬好一锅白薯粥，催他快进屋吃饭。听到枪响，看见鬼子端枪正追村民王大山、王二山哥俩。王连见状就往村西跑。到了村边又往南跑。王大山、王二山哥俩往芦尚坟村山坡跑，日本鬼子端枪瞄准儿。砰！砰！两枪，这哥俩就倒下了。

鬼子进了王连的家，他的爷爷王理、父亲王长贵和小弟王源被堵在北屋。把王理逼到东北墙角，对着他当胸一刺刀，他用手握住刺刀，鬼子又把刺刀往外一拔，王理的手指就掉了。他从墙角跳到炕头，又被鬼子捅了数刀，惨死在炕上。父亲王长贵抱起小儿子王源往西里屋躲。他面向墙角用身体护着王源。鬼子追进去，从背后扎了王长贵九刺刀。刺刀透过前胸，又把小儿子的肚皮扎破两个口儿。鬼子走后王连回到家，见父亲还有口气儿，就用排子车拉着父亲和小弟到南岗洼找医生看。王长贵在半路上就死了。

郭亮的大爷会说书，能看病，人称郭大先生。也在当天被日军打死在家里。

村民郑望，那年十二岁。那天早晨哭着喊着要跟父亲上良乡赶集，父亲不帶他去，他追到院外没找到父亲却撞上了日本兵。他拼命向东大堤跑，子弹从腿边飞过打得大堤上的黄土直冒烟儿。幸亏没被打中，死里逃生。

村里有好几个小孩死于日军的刀枪之下。赵凤山的小妹妹，还有小伙伴董葵儿，遭枪杀后又被鬼子丢进火里。日军在米粮屯村共杀害村民八十三人，烧毁房屋一百多间。村庄在不到一小时的功夫就变成了人间地狱。

日本兵从村里撤出后，汉奸说走错了路，又调头往回走，这时大火把藏在草垛中的弹药烧炸了。这些弹药是二十九军退却时遗失，被村民捡回来的。鬼子们以为“箍子军”来了，又杀了个回马枪。本来跑出去又回来救火的村民王德明和马殿甲又挨了两枪。王德明当场丧了命。

日军进詹庄村时，大多数村民纷纷逃难去了。一些老人孩子没及时逃走，被打死二十八人。还烧了几十间房。

詹庄村幸存者张宗奎老人那年二十三岁，他说：“我母亲半身不遂，房子烧着了，我母亲从屋里拄着一只破凳子爬出来，鬼子没有杀她。”下午他从良乡姨家回村，地主张泉、梁军、梁斌家的大房还在着火。张玉家开豆腐坊。他有四个儿子。除小儿子张世斌在城里学徒外其余三个都跟他卖豆腐。那天正好良乡大集，爷儿四个起大早挑四挑豆腐到集上，卖完往回走。半路听说日本进了詹庄。放心不下家里的老小和磨坊的豆腐。非要进村不可，结果全都给打死了。张世斌的媳妇和小闺女也让鬼子给剖了腹。

詹庄村与安庄村一路之隔，个别人给村民传信，让他们赶紧逃命，但有的村民为了保护家产不愿走。安庄村朱顺的母亲、媳妇和十几岁的闺女三人都惨死在屠刀下。母亲临死还用身体紧紧护卫着当时只有几岁的儿子朱广洪。幸存者朱广洪现在身上还有日军留下的刀痕。

安庄村西的杨德才，本来已经跑出去了，得知老母尚在家中，又返回来时被日军拦住了。手无寸铁的杨德才与日军夺枪，被几个日本鬼子刺倒。

日军从安庄过刺猬河向大马村进发。大马村村民见大队日军跨过刺猬河，纷纷向西北逃难。日军从东边进村，先烧了大庙西北王前家和大庙南边老金家几间房，又打死了从山东来这里靠打铁谋生的一个小伙子。

日军在京西的这次暴行给米粮屯一带人民带来了永生难忘的耻辱。

(《房山文史资料》第9辑)

## 日伪时期孤山口村人民的生活

蔡连昆 张 珍

房山区城西南约三十多华里的孤山口村，在抗战时期是一条通往我抗日根据地的交通要道。

1939年春，日本鬼子为了占领孤山口村这个战略要地，出动飞机对该村及其周围山庄进行狂轰滥炸，全村百姓惊恐而逃。不久汉奸维持会说“皇军”保护老百姓，不许全村百姓出门。让每户出一个人到村东头集中，迎接“皇军”进村。

这天，只见架着机枪、大炮的坦克开路，随后有二百余人的鬼子兵，全副武装，杀气腾腾地向孤山口村扑来。一时枪声大作，喊杀声震天。这次扫荡后留下一个日军小队，三十名日本鬼子，驻在了孤山口村。

这个小队开始驻在唐家大院，不久又在村西的一个小山头上建起了岗楼。同时，又动用了附近村庄的上千名民工围着岗楼开山凿石挖了一条宽三丈深两丈的战壕，当地老百姓称为“毁民壕”。修建岗楼的工程是强迫附近的天开、赵各庄、长沟三个伪大编乡出动上千名民工卖苦力，到1941年秋才完工(村内百姓都叫它“日本

大楼”)。同时，国民党伪军共百余人住在岗楼山下的平房内，配合日军监视、破坏我八路军的抗日活动。在村内，日军还秘密安插了特务，伪长沟警察所还派了专职警察，保卫日本岗楼安全，监视这一带我军抗日活动。对可疑人员，轻则弄到岗楼毒打，重则弄到村西捆绑在木制的“十字架”上，当成射击的活靶子杀害。

日本鬼子制造的白色恐怖，给当地老百姓带来深重灾难。当时，流传着这样几句顺口溜：“小日本，上山坡，凶又狠，要吃喝，百姓被迫当民夫，挨骂挨打枪把戳，天天挨饿卖苦力，弄得百姓没法活。”日本鬼子把孤山口的村民当成奴隶，随意折磨、迫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繁重的徭役负担。孤山口村当时二百多户，共设二十个甲、两个保。除日伪军经常向村里要民工干杂活儿外，每天还要出动一甲的劳动力(二十人左右)负责给日军担水，从山下送到山上岗楼里。送到后，还要逐桶检查是否有毒，让担水人自己先喝口自己担上来的水。全村劳力每二十天轮一次，一直担了五年，直到日本投降。

二是抽调勤杂工厨师到岗楼内长期为鬼子服务。日本鬼子稍不随心，张嘴就骂，举手就打。偷跑了的就扣上私通八路军的帽子，抓回来毒打，甚至殃及全家。

三是让汉奸组织“新民会”。为控制全村青壮年外出活动，组织全村18—45岁的青壮年搞军训，每周一期，轮流训练，从来都没进过学校的青壮年农民，参加军训时，有的不会走正步，“新民会”教官劈头盖脸就打。

四是毁民房修公路。孤山口村内街道高低不平，宽窄不一，日本鬼子为了走坦克、汽车，大量拆毁民房砍树木，在村内从东头到西头修建了一条马路。许多村民房屋被拆，无家可归。

五是欺压百姓。驻孤山口村的鬼子到处乱窜，调戏污辱妇女，辱骂儿童。一天，村民少年蔡旦子背着筐拾粪，走到日本岗楼山下，碰见三个日本鬼子，其中一个叫高桥的见蔡旦子两眼直勾勾地看他们，开口骂道：“小孩，你王八蛋！”倔强的蔡旦子立即回敬了两句：“你王八蛋！你王八蛋！”高桥翻了脸，怒冲冲地追来，蔡旦子见势不妙，扔了背筐，飞快地向村南河滩跑去。日本兵穿大皮鞋追到大河滩，跑不动了，蔡旦子才免遭一场劫难。

六是经常向村、乡要年轻妇女，到岗楼里陪日本鬼子睡觉。弄得村里百姓的良家青年女人人自危，人心惶惶。

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孤山口一带的广大人民没向日本鬼子低头，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斗争，有力地打击了日本鬼子的嚣张气焰。1941年，日本驻进孤山口不久，中共房山县委派四区区长李正保到孤山口村，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活动。李正保经常在夜间到孤山口村的西水巷的一间看地房内召开抗日骨干会。他通过公开身份是为日伪服务的联保主任、秘密身份是我军地下联络员的王森，了解了日本岗楼内的人数、武器装备及活动情况。我游击队及民兵，根据已掌握的情况，经常向鬼子岗楼开枪射击。给鬼子造成很大压力。因此，原来鬼子经常明目张胆地出来活动，后来慑于八路军的威力，就龟缩在岗楼内不敢再轻易出来活动了。甚至后来驻长沟日军给他们送给养，为防止八路军拦截都要出动坦克护送。

我军想方设法破坏敌人封锁，同日伪争夺粮食和物资。1943年夏，房山县四区区长王晓天和县委敌工部长韩小兆，让王森从孤山口村征五千斤小麦送解放区。王森按每甲250斤的任务，下达任务仅一个晚上，就收齐了。不料，被驻村日本特务孟兆瑞发现，报告了日军。日军派了三个鬼子，带着洋狗，找王森搜查小麦，又将王森带到岗楼去见日军小队队长佐藤。自从日本驻进孤山口村，王森为掩护自己真实身份，就有目的地跟佐藤和日军老兵松下等交上“朋友”。逢年过节，他主动为日本“庆贺”，请客送礼，平时没事，也去岗楼找日本说“工作”、聊天。因此，他进出岗楼很随便，成了日本小队队长的座上客。王森见到佐藤后，发现小队队长满脸不高兴，佐藤对王森说：“孟兆瑞告你私通八路，给八路军准备粮食，良心坏了。”王森当即解释：“我的没坏，是孟桑的坏了坏了的。他昨天向我要金票的，我没给他，这是他陷害我。我的麦子是为大编乡准备的。”佐藤听完，立即把孟兆瑞叫来，孟进门就被日本鬼子一阵拳打脚踢。佐藤把王森叫到他屋请他吃饭喝酒，一直到晚上王森才回村。回村后，王森将计就计，立即秘密组织五十名青壮劳动力，当天夜里将五千斤麦子一斤不少地送到了解放区霞云岭村。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王森秘密地将中共房山县敌工部印发的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宣传画报在据点散发,驻守在孤山口岗楼的日本鬼子,个个象泄了气的皮球,有的哭泣落泪,有的惊慌不安。不久,军心涣散的日本鬼子狼狈地逃到长沟,结束了在孤山口村的统治。

日本鬼子在孤山口村统治达五年之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英雄的孤山口人民,英勇顽强地与日本侵略者战斗了五年。

(《房山文史资料》第9辑)

作者蔡连昆系原区个体协会会长

## 跟日本工头的斗争

王国林

1945年4月的一天,我为了生活下去,经别人介绍,去村北采石场干杂活。采石场是琉璃河水泥厂的采石车间,具体地点是周口店村西南的半山坡上。

那时,采石场的总工头是个日本人,凶狠狡诈,骄横跋扈,不可一世。作工干活的都叫他“日本矿长”。领我们干活的小头头叫刘宗清。是一个30岁左右的农民汉子,周口店村人。

采石场全场作工的中国人(周口店地区的居多数)共三十六、七个。这其中,有开机器(打风钻)采石的,有给石料过磅的。当时我干的活儿是装车。端荆条编成的叉子(和簸箕相似)将碎石灰石装上斗车,运往车站的大仓,再装火车好运往琉璃河水泥厂。

和我一起干活儿的人很多,都是附近村子的乡亲、百姓。我记得有张大个子,田玉楼、田的侄子田均、新街村的老骆、大刘明等人。我们作一天工、卖一天苦力气,工钱只够买二升玉米粒。传说,如果活儿干的好,还能发给日本票一两元。进了采石场,先干活儿,后吃饭。饭食很简单,小米饭、老咸菜。所说小米,是陈米,有些霉气味,没办法,真难下咽。

当初干活时,刘工头曾经说过:“日本矿长”不会亏待我们。干一天发一天工钱。可一晃四、五天过去了,一分钱也没见着。大家觉得,这样的苦累活儿,干下去实在没劲!就采取软磨硬泡的办法“磨洋工”,谁也不卖真力气干活。卖苦力作工的吃喝很差,然而“日本矿长”却坐在矿长室享清福。日本人专门有中国厨师侍候,一日三餐专有人送饭,沏茶倒水、十分周道。日本矿长根本不把中国作工的人放在眼里,对作工的打骂是家常便饭。我就曾经不明不白挨过汉奸、监工头的耳光。心里想:中国人就可以随便被打骂吗?这笔帐迟早要清算!七、八天过去了,干活的工钱依然分文没给。日本矿长对我们的“磨洋工”现象看在眼里,活“茬儿”干不出来,就拿刘工头出气,大骂工头儿无能。亲自出马,带领工头、汉奸、监工的亲自来作业组“督战”。让我们作工的排成队,挨个儿训斥、打骂!乡亲们被逼无奈,抄起了石块,向日本、汉奸还击!日本矿长见势不妙,拼命向矿长办公室跑去!当时,我一飞石打去,石块擦着“日本矿长”的帽沿而过,日本矿长狼狈逃掉。这时,别的伙伴、乡亲也纷纷抄起石块或其它工具,准备还击。工头、监工的慌忙劝解,

日本矿长溜进屋里，再也不敢露头。

厨师这时提着洋瓷饭盒来给日本矿长送饭，饱尝日本汉奸苦头的乡亲们，怒气未消。心里想，你打我们作工的苦力，你也休想再享清福。手中石块一齐砸向“洋瓷饭盒”，吓得厨师逃之夭夭。我们这些作工的苦力，心里别提多痛快了！这场斗争弄到这一步，再干不去，决不会有好的结果。再说日本人真的动起枪来，我们不是干吃亏吗？大个儿老张站在高处，向采石场作工的乡亲们招呼一声：“咱们不干了，赶快逃吧！”就这样我们四散逃跑，各奔西东。

这件事过去五十年了，使我认识到：团结就是力量，齐心协力才能胜利。日本侵略者被打倒、无条件投降，关键是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团结起来了，才取得了抗战的胜利。

（《房山文史资料》第9辑）

# 回忆日军在房良一区犯下的罪行

马良民

抗战以前，良乡一区原属房山三区，南半部分属良乡县和房山县的部分村庄。“七七”事变后，长辛店、良乡等地成了日军进攻的目标。日军分两路进攻，一路沿平汉铁路线进犯，在南岗洼村打死七、八个人，在长阳村打死了朱黑子、小路等人。另一路沿大灰厂村进犯，到达沙锅村驻扎。村里的老百姓都跑了，日军抢光了村里的猪、鸡，还到各村搜查可疑的人抓回沙锅村，如魏各庄村张家饭铺的张老头就是其中一个。

日军把抓回来的人都叫坐在田家大院门口的台阶上排好队，让他们互相打嘴巴，侮辱中国人。沙锅村魏广被日军先砍掉一只胳膊，用他的胳膊再打他，然后把他大卸八块。其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

日军还在瓦窑村西北坡上搭帐篷驻下，白天到村里来抓鸡抢东西、侮辱妇女。

1937年8月，日军在王庄村驻扎，并修建了岗楼。在村东张家坟修建临时飞机场时，未成熟的庄稼被全部砍掉，还让村里百姓用碌碡轧飞机场。驻扎在飞机场的日军每天到村里抢掠长达一年时间。同时还在高正忠家搞起了“宣抚班”，鼓吹“大东亚共荣圈”来欺骗群众。

9月，日军来到晓幼营村。该村王凤来投靠了日本，当了汉奸，欢迎日军。日军在该村横行霸道后，又去吕峪沟烧了两间房子。然后又奔北四位村抢劫。

从8月22日到9月22日，日军在侵占良乡和坨里高线大楼后，在坨里一带杀死了一百三十多人。各村建立了伪保甲组织，坨里、王佐成立了伪大编乡。

此时，山区、平原各种地方武装蜂拥而起，抗击日本侵略者。但也有打着抗日旗号趁火打劫的。如有个叫付德才的成立了联庄会。有二十多人，两条大枪。他带人来到米粮屯村弄走四支大枪，又到詹庄、安庄、固村转了几天，又回到米粮屯村驻下。驻到第七天时，王凤来和东王佐村的周均带着伪军来对付德才，付带着他的人跑了。王凤来进村打死了该村王江，抢了许多东西，回去向日军报告米粮屯有土匪。

1937年11月13日，日军在早七点包围了米粮屯村。太阳一发红，枪响了。一部分老百姓逃跑了，未跑的老百姓仅一个钟头时间就被杀死了八十三人。马庆一家被打死七人、刺伤一人，马三家被打死二人，刺伤一个小女孩。八十多岁的孟三老人被打死，郝平家被打死三人，跑到他家的邻居四人也被打死。日军烧毁

民房三十七间。

日军由米粮屯村又奔詹庄村进行烧杀抢掠。在该村打死二十八人，仅张世魁一家就被打死七人，梁德旺一家被打死三人，高树章家被打死四人，共烧毁民房一百二十八间。

日军又奔安庄村烧杀，打死朱广洪家二人后，奔果各庄打死一人。在大马村打死十一人，王继太一家被打死三人，烧毁方敬家房子十一间，方清家房子八间。

(《房山文史资料》第9辑)

作者系原良乡县副县长

## 一位老人的控诉

顾淑莲

7月11日，房山区坨里镇敬老院71岁的老人王德广向笔者哭诉了日本兵杀害他哥哥及几位乡亲的经过。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农历七月十五，日本兵从良乡下火车，攻占了房山区崇各庄乡。为了达到彻底毁灭百姓家园、消灭山区抗日军民的目的，日本兵刚刚驻扎下来，就疯狂地向坨里、河北地区打炮，紧接着就派兵进占了坨里。

农历七月十六，日本兵进驻到坨里镇，老百姓纷纷逃散，离家出走。

王德广的哥哥王六，当时仅有26岁，没来得及逃走，被三个日本兵抓获并进行狠打。王六精心驯养的一条狗见主人有难，立刻扑向了日本兵撕咬。凶狠的日本兵见此情景更是穷凶极恶，用枪打死狗后，又抽出洋刀把王六的脑袋砍了下来！全村百姓早已逃离村庄，哪有人帮助收敛尸体？年迈的父亲只好用破席将他卷起来。最后，他的尸体被恶狗撕烂。

王德广在悲愤之中，又接着叙述了邻居两位老太太惨死的经过：村民顾士江和他的妈妈以及村民顾士德的妈妈三人，当时在这个村名叫“园子口”的地方躲避。由于七月雨水大，到处是水，带着的衣服及破被无处可放，三人只好轻手轻脚、小心翼翼地用手挖沟排水。突然，沟口走进两个日本兵，由于水流声大，三人谁都没发现。只见其中一名日本兵猛地从身后抱住了顾士江，另一名日本兵嗷嗷叫着想用刺刀从背后刺死他。但顾士江身大力足，一挺身一跺脚就将两个日本兵挣脱开，并将其中一名推倒在地，急忙跑进茂密的庄稼地里。两名气急败坏的日本兵见顾士江跑了，一下子将吓得哆哆嗦嗦的两个老太太用刺刀扎死。

王德广满脸泪水地说：仅一个月时间，辛开口村就有7人被日本兵杀害。当时“中央军”就在辛开口的西坡和二寨坡上，据说没有命令不能还击，因此不少官兵被炮弹炸死。他又接着说：日本兵撤走后，我和本村卢旺、王有德跑上山去观看，只见数不清的官兵，密密麻麻，你挨我、我压你，惨死在坡上。由于天热，死的人又多，所以绿豆蝇遮黑天，整条街都是臭味熏天，太惨了！

(《房山文史资料》第9辑)

作者系青龙湖镇工会主席

## 雷加在石楼村

卓成栋 王国林

文化大革命后期城里的许多干部下放到我区劳动，作家雷加就是其中一个。他先在吉羊村呆了三个多月，后又调到石楼村。

这位高高的个子魁梧身躯的下放干部，一进村就引起了村民的注意。进村后大队把他安排在社员张克明家北屋居住。与他同来的还有一个下放干部叫王义，他们自己起火做饭。王义被安排到村中棉田里干活，雷加被安排在九队。当时正值种麦时节，雷加也和社员一样到麦田里平地。九队队长张秀对他分外照顾，因为他瘦高的身体，干起活来弯不下腰，耨小苗时人家蹲着干，他跪着干。次年麦收时张秀把他安排到麦场上干。翻麦子、扫场、轧麦子、上垛、灌包、摊晒。干活中雷加只知低头干活，没多余的话。可是要是到了“歇盼”时，他的话匣子便拉开了，而且说话诙谐而风趣，平易近人，是一个十分和蔼的人。

有人说雷加是个乐天派，可他也有难处时，比如住在老张家北屋生地炉子，他可真犯了难。火怎么弄都不行，不是没火力，就是灭火，为这吃饭成了一大难题。有时人家都上班了，他还没吃饭呢。为此房东没少帮助他。有时干脆把雷加的饭锅端到自家火上，有时还帮他把饭做好。每天还抽空给他管火，睡觉前提醒他别中煤气。

雷加也有自己的办法，为了不误工。他经常买回一些挂面，用小铝锅煮挂面吃，直到时间特别充裕时，才熬玉米糝粥，蒸窝头、熬菜什么的。

后来“一打三反”运动开始，因有大量的材料去整理，雷加很少下地干活了，大部分时间坐在屋子里写。写累了就到院里转一转，或到街上走一走。

雷加没有一点干部的架子，见了大人拉呱，见了小孩逗逗，他和房东大娘很说得来，聊起天来很风趣。加之他文化知识渊博，一谈起来往往吸引很多旁人。前院左家上初三的左金荣最爱听他与其母谈话，小金荣这时便歪着头把小手支在下巴上听得津津有味。时间长了，他和左邻右舍混得很熟。人熟是一宝，他生活中很多难题也就容易得到解决。比如说小金荣在下学后便经常帮他看看火，打扫卫生，有时还帮他抄抄材料，甚至做一些简单的饭菜。

雷加十分乐意助人，左金荣帮他，他便反过来教她写作，帮她修改作文。左家生活有困难，他主动帮助，双方建立了亲密的友谊。雷加离开石楼村后，到如今仍与左家有联系。1977年左金荣去北京在天安门前与雷加合影留念。1982年雷加回石楼登门拜访了左家，雷加的女儿生孩子，左金荣还特地为其购买了母鸡送去。

1971年村中召开批判会很多，有时雷加参加，还在会上说上几句。有时村中党员活动，雷加还给党员们上党课。村党支部有事，有时也找雷加商量，并请他出主意。雷加抽烟很凶，晚上写材料一根接一根，纸烟接不上了，就卷“大炮”抽。

农村搞运动，文字工作很繁重，他经常工作到深夜。何况写完材料之后，他还搞一些创作。所以时间对他来说就更为紧张。他把创作的作品常让一些村中人品评，语言是否与石楼村民靠近。他在石楼村创作一篇小说，主人公是根据村中人的原形塑造的。中学生左金荣是这部小说的第一个读者，她对小说结尾部分很感兴趣。

雷加最喜欢在村子里串，与他投脾气的，他可以聊上一大阵地。雷加在石楼村呆了三年多（从1969年到1972年），与石楼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当他离开村子时深有感触地说：“石楼人太好了，石楼人在我心中

留下了永远也抹不去的印象，我还会回来的。”

1982年，离开石楼村整整十年的雷加骑着自行车又来到石楼村，他目睹村中的变化，见到以往的老熟人，满肚子的话说了整整三天，尤其谈到那阵子他做不熟饭吃炒疙瘩时的情景他笑得是那么开心。临走时他紧紧握住村支书张秀的手说，石楼村是我人生的转折，我爱石楼村，更爱石楼村人民。

1987年，75岁高龄的雷加又来到了石楼村，同年《人民日报》上便刊载了雷加的散文《再去房山》，讴歌了房山人民在党的改革开放的政策下发展经济走致富之路的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

(《房山文史资料》第11辑)

## 芦川北平与梅傲雪

张玉泉

1994年5月3日，房山区窑上乡官庄村的农民梅傲雪象过年一样，喜气洋洋地迎来了他的日本朋友——日本驻华使馆前文化参赞芦川北平。芦川北平应邀来京又专程到梅傲雪的农舍探望老朋友，使梅傲雪一家和市、区、乡有关部门的领导都感到格外高兴。

一个贫苦农民是怎么与一位日本外交官交上朋友的呢？事情是这样的：

1979年12月24日，天上飘着零星小雪，房山区城关南大街上，中年农民梅傲雪正在摆地摊卖字，一辆挂黑牌（日本驻华使馆）的轿车在他的摊旁停下，从车上下来一位中等身材的日本人，他就是日本学者、日本驻中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芦川北平先生。芦川先生下车后站在地摊前反复端详一幅大字条幅之后，又上下打量这位憨厚的农民。将信将疑地问：“这字是你写的吗？”

“是。”他肯定地答道。

“能不能再写一幅？”芦川先生客气地说。

“好！”梅傲雪应声后，端上墨砚到旁边卖炸豆腐摊的炉子上化化墨，便铺上纸挥毫写下“阳春白雪观南北，万里霞辉花满园”的条幅，劲秀、雄健的楷书跃然纸上。芦川先生不禁脱口赞叹：“好字！好字！风流潇洒，静雅清秀，别具一格！”

这时芦川先生向他表明身份和意图，他说：“我是日本人，我看你写得不错，想求先生几幅墨迹。”梅傲雪谦逊地说：“我写得不好，要好就上荣宝斋去卖了。”芦川先生又问清他的姓名、职业和详细的家庭住址。然后又从车上取下一些纸给梅，便告辞了。

三天后（1979年12月27日）芦川先生给梅傲雪寄来第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梅先生雅鉴：

街头一会，言谈甚欢，观君大作，敬佩万分，叹先生寄寓农舍户牖，草成一首赠君，请先生不吝指正。

书法篆刻艺精纯，  
岂是寻常辈里人。  
喜看金石成鼎鼐，  
忽觉龙蛇走风云。

寄怀翰墨乾坤大，  
诗词常吟笔墨新。  
冷眼横扫三千界，  
红梅傲雪占芳春。

临行前一定请君挥笔操刀，吾赠使馆官员、天皇陛下及亲友，君之大名定能震动吾国，邀君访日有望矣，不日前去拜访。

敬祝  
冬安！

日本芦川北平敬上  
1979年12月27日

梅傲雪于当日给芦川先生回了信，并附诗（奉和芦川先生）。从此，他与芦川北平开始了长达二十余年的交往和书法艺术的交流活动。

这位热心的日本朋友离任回国后，主动寄来宣纸，并把梅的作品推荐到东京书法展览会上参加展出。1981年底的《光明日报》和《农民日报》先后以《农民梅德顺（梅傲雪）刻苦自学书法成才——日本东京书法展览会展出他的书法作品》和《墨香飘海外》为题，报道了他的事迹。

梅傲雪于1941年5月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自幼酷爱书法艺术。在十年动乱中，在生计艰难的情况下也未放弃他对书法艺术的追求，在田间地头的空隙，在耕耘故土的同时，他也耕耘着另一块“土地”——砚田。他为自勉自励，把自己的书法作品署上了“梅傲雪”的名字。“文革”后期他为了聊补无米之炊，开始了走街串巷卖字画的生涯，终于在房山街头遇到了知音——芦川北平先生。

梅傲雪苦攻真、草、隶、篆，尤以行书擅长。在芦川先生的帮助下，于1983至1984年在日本东京举办了三次书法展览。1983年被特邀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北京分会理事。其自学成才的事迹曾在《日本医学报》上刊登。作品被日、韩、印、美、奥……等国际友人收藏。1992年加入日本书道家协东瀛印社。东瀛印社1992年8月15日刊登出以“京华梅傲雪”署名的巨幅字“藏龙”，引起了日本书法界的极大关注。

1985年4月中日友好协会邀请芦川北平先生来京进行友谊活动，结束前芦川先生邀请梅傲雪到东交民巷松鹤饭店他下榻的地方会晤，互相切磋书法技艺，并与他合影留念。1994年5月初芦川先生再次应邀来京给一位中央的老同志和一位书画大师看眼病后，特意到梅傲雪的家看望他，并送来日本东瀛印社的聘书。值此，这位外交官与京郊房山农民梅傲雪的友谊和书法艺术交流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房山文史资料》第11辑）

## 曹家与房山

孟庆先

《红楼梦》一书的作者、一代文学巨匠曹雪芹的祖上或近亲，与房山会不会有什么关系？答案是肯定。据七十年代发现的《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在三房十一世曹德先的名下载：“……葬顺天府房山县

张坊镇西涑水县之沈家庵村北<sup>①</sup>”。关于这块曹氏莹地，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先生曾先后五次前去考察，取回了墓地界石并拍摄了大量照片。冯先生认为，曹家的入辽(阳)始祖是曹俊，五庆堂是曹俊以下的三房后代，而曹雪芹则是四房之后<sup>②</sup>。不过，此说在红学界争论甚大，且这块曹氏莹地又在涑水，故我们可置之勿论。另据新发现的雍正元年四月初九日《总管内务府奏查抄李煦在京家产折》及所附清单，内有“房山县除坟园地及看园子之人外，丁府新庄有地十七亩……瓦房二百一十间，偏厦子二十八间(下略)<sup>③</sup>”。李煦同雪芹家的关系非同一般。李煦之妹为曹寅的继室，亦即曹雪芹的祖母<sup>④</sup>。李煦、曹寅均为康熙帝的心腹，且康熙的后几次南巡，李、曹两人共同接驾。曹寅、曹颀(雪芹之父)<sup>⑤</sup>的病故，均是李煦奏报，曹颀承袭江宁织造，也是李煦宣旨<sup>⑥</sup>。李煦晚年的命运十分凄惨：雍正元年即被革职，雍正五年，以七十余岁的高龄被雍正“宽免处斩，发往打牲乌拉(雍正朱批)”，雍正七年，死在黑龙江，时年七十五岁<sup>⑦</sup>。关于上文提及的查抄李煦在京家产折，有几点颇堪注意：

一、丁府新庄。是否目前尚沿此庄名?此份奏折系译自满文，新庄亦可译为辛庄、欣庄等，有兴趣者不妨查一查。

二、坟园地。我的推断，这坟园地就在丁府新庄左近。李煦之父、官至广东巡抚的李士楨，死后葬在“通州城西之王瓜园<sup>⑧</sup>”。那么，房山县的这块莹地，会不会埋葬李士楨的先人，后来又埋了李煦、其妻韩氏及其后人李鼎等人呢?雍正六年，曹家被抄，这并未影响曹寅的胞弟曹宣(荃)及其堂兄曹宜这两支，其中仍有人加官进爵，在京当三、四品的官<sup>⑨</sup>。然而到了乾隆初年，曹家除雪芹尚有迹可寻外，其他人(如曹宜、曹顺、曹颀等)却忽然从历史上消失了。不仅官书不载，就连私家笔记也讳莫如深，故时人屈复对曹家有“何处飘零有子孙”之叹<sup>⑩</sup>。尽管红学家们有种种推断，因无史料实物佐证，迄今无定论。

曹雪芹的祖上相当显赫：曾祖曾玺，“江宁织造三品郎中加四级，赠工部尚书銜。妣氏孙，康熙保姆，封一品太夫人”；祖父曹寅，“管理苏州、江宁织造，通政使司通政使，巡视两淮盐漕监察御史”。他们死后葬于何处，至今仍然是个谜。

当人们的目光一齐投向香山及京东一带而毫无所获时，我们不妨也在房山地区搜寻一下，看看有否找到李家或曹家的蛛丝马迹。笔者愚见是，曹、李两家同属正白旗，都是内务府包衣，且关系又如此特殊；既然李家能在房山置办房地产及墓地，似无理由排除曹家这样做的可能性。联系到《红楼梦》中秦可卿托梦王熙凤“趁今日富贵，将祖莹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亩……便是有了罪，他物可入官，这祭祀产业连官也不入的；便败落下来，子孙回家读书务农，也有个退步”。我想曹玺、曹寅等人未必无此见识。

房山地区不乏有识之士。倘或“东方不亮西方亮”，在上述问题上有所突破，譬如，查出曹、李两家，尤其是曹家的有关文物(文献、墓碑、墓石及其他地下发掘物)，那将不仅对红学研究，而且会对房山地区的文化、旅游乃至经济，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

拙文定成后，蒙《燕山油化报》社的张广明先生见告，所谓“丁府新庄”，其实就是“定府辛庄”，离房山县城南不远。

注：

①冯其庸《曹雪芹家世新考》增订本第508页。

②见注1第41页及该书载冯其庸所绘。《世系表》。

③《历史档案》1981年第二期，转引自王利器《李士楨李煦父子年谱》第503-509页。

④朱淡文《曹氏宗族年谱简编·康熙二十六年条》及该条注释，载《红楼梦学刊》1990年第二辑。

⑤关于曹雪芹的生身之父，目下两说并存：

(1)曹颀。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人物考》。

(2)曹颀。王利器《耐雪堂集》第310页。王先生认为雪芹是曹之妻马氏的遗腹子，也即是《八旗氏族通谱》中的曹天佑。笔者采用王说。

⑥除另外加注外，以上所述，散见于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及《李煦奏折》。

⑦王利器《李士桢李煦父子年谱》第503-556页。

⑧(清)杜臻《广东巡抚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公士桢墓志铭》转引自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第101页。

⑨朱淡文《曹氏家族败落原因新论》载《中外学者论红楼》第70—87页。

⑩朱淡文《曹氏家族年谱简编·乾隆八年条》载《红楼梦学刊》1990年第三辑。

(《房山文史资料》第12辑)

作者系原燕山联合对外贸易有限公司经理

# 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

## ——日寇在房山的血腥暴行

侯国智

1999年底，日本东京最高法院，宣判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的日本老兵东史郎败诉，这种倒行逆施，使中国人民无不义愤填膺！日本某些人忘记了中日重新建交时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语重心长的那句名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日本右翼分子，为何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做此颠倒是非的判决呢？其根由来已久：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美帝国主义者为了抗苏扼中，就把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置其卵翼之下，百般呵护。日本右翼势力，自恃有美国撑腰，对其军国主义前辈在东亚、在中国所犯下的罪恶滔天的血腥暴行，一贯采取不认罪、不谢罪、不服气的态度。

一位哲人曾经说过：“一个忘记自己历史的民族，必定要成为一个愚蠢的民族”。抗日战争时期房山区所属良乡、琉璃河地区，是北平的南大门，地扼平汉铁路咽喉，为日寇南侵必经之地，日寇必踏平而后快！因此，房山地区为日寇侵华时的重灾区之一。当时，日本侵略者曾给我区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造成我区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对于这一系列残绝人寰的暴行，我们将永远不会忘记。为了使日本民族中的某些人不再愚蠢下去，也为使中华子孙牢记日寇侵华强加给我们烧杀淫掠的耻辱，现将日寇在我区犯下的血腥暴行，以时间为序，粗略统计于后。

1937年7月26日 日寇初窥房山

7月26日，芦沟桥的硝烟未熄，小股日寇就开始进犯良乡东关的梅花庄与苏庄一带。

8月1日沙锅村惨案

日寇初占良乡城，过长阳，杀我同胞朱黑子与小路，到沙锅村，抓“可疑”人员到田家大院门口高台上排队，让他们互打嘴巴。把魏广的一支胳膊砍下做棍棒，抽打魏广，然后将他大卸八块，制造了日寇侵占房山的第一起惨案。而住在瓦窑村外的鬼子，则到村中捉鸡抢猪，强奸妇女。

8月18日 良乡城惨案

8月5日，国民党29军收复良乡城，15日日寇复占良乡。17日夜，29军派人从城东南角翻入城中斩杀日寇，18日鬼子疯狂报复，杀我同胞十余人。

8月 开古庄惨案

8月中旬之后，在良乡站稳脚的日寇，出城向西蚕食，到开古庄，强迫百姓到小学门口大槐树下集合，然后用机枪扫射，我十余同胞遇难。日本鬼子又到南梨园、炒米店挑杀村民李贵、李七、李树、陈水德之兄等青壮年几十人。

8月19日 大石河沿岸战斗

8月19日，国民革命军26路军赶来，沿大石河西岸布防。驻饶乐府团，组织“登峰队”，趁夜涉水过河斩杀日寇，后被鬼子包围，几百名战士为国殉难。日寇用飞机大炮，猛轰驻守南观、羊耳峪、八十亩地等处池峰城31师，部队死伤逾千，26路军被迫后撤。驻守瓜地某团，留一班掩护，与鬼子展开白刃格斗全部壮烈牺牲。

8月20日 坨里惨案

从良乡出发的日寇，经闫村、吴庄、南坊、北坊抢占坨里运煤高线。前边用坦克开道，车后拖粗大圆木，将公路两边未熟庄稼，拖成席地，造成数百亩颗粒无收。在坨里，日寇炮轰正后撤26路军余部，死伤无数。随后对我坨里同胞、辛开口同胞进行野蛮屠杀。鬼子用刺刀挑扎、打活人靶、铡刀铡、锯子锯、军马拖、灌凉水、开水烫、毒气熏、吊绞、砍头、劈肩、腰斩、挖心、凿眼、剥皮、肢解、活埋、喂狼狗等骇人听闻的残酷手段，将王六、王田、顾士德之母、顾士江之母、王昆、穆墨艳、郑兰生等130余人杀死，宋傻子、秦二掌柜全家被杀光。秦连州一家八口与乡亲十余口人躲在白薯井中，鬼子向井中投入熏炮(化学武器)，将十余口人全部杀死。

9月14日 定府辛庄惨案

日寇追后撤的中国军队至定府辛庄，把一连中国军人用大炮轰光，然后冲入村中屠村三天，王德生、李士衡二人之父，张三炮全家四口等60余人尽遭屠杀，随后烧房240间。9月24日，鬼子又窜入村中，砍了刘振才傻哥哥的头，刺杀了躲在刘永院中的刘建堂与李大仲等7人，还奸污住在村边一农妇。

9月16日 日寇初占房山城

日寇用飞机大炮轰炸房山城，城内顿时火光四起，硝烟滚滚。房山监狱被炸开，房山县城被占。

9月17日 饶乐府惨案

日寇窜到饶乐府村，王德福之母，石老道、白拐子遇难。

9月17日羊头岗惨案

日寇窜到羊头岗，赵朴玉一家五口、刘全福一家五口、刘玉福一家四口、刘二定一家七口、崔志会之母、赵广玉、大鼓刘、常五奎等60余人遇难。八十亩地等几股逃难之人，被鬼子劫住，把男人、小孩先行杀死，妇女被奸污后投入一白薯井中，后向井内扔手榴弹。十几天后逃难者回村，在井西侧挖一斜沟，拖出62具尸体。因血肉模糊，将无法辨认的十余人同埋在羊头岗村西山坡之下。

9月17日 坨头惨案

日寇窜到坨头，杀我同胞40余人。

### 9月17日 双柳树村惨案

日寇在双柳树村，杀我同胞39人，其中二十多个青壮年，是强令推出陷入泥水之中的日本军车后集体屠杀的。

### 9月17日 石楼惨案

日寇从村东头窜入，挨户搜查。于北胡同杀我同胞5人。在东街魏家门口杀2人，将一老太太下身捅一刺刀，她爬到自家门口含羞死去。在村西南角，鬼子劫住侯敏晖、侯敏明、郭六、郭七、赵连城等37名回村农民，强迫他们推出陷入泥水中日本军车后进行集体屠杀。除二人机警逃跑，赵连城胳膊中一枪昏死捡了一条活命外，无一幸免。赵连城臂中子弹，27年后才手术将弹头取出。石楼全村死难50余人。

### 9月17日 支楼惨案

日寇到支楼村，用刺刀挑死我同胞14人。

### 9月17日 二站法国天主堂惨案

二站村，有一法国教士开办的天主教堂。信徒与附近村民360余人，躲入天主堂避难。岂知日寇根本不讲什么国际法，闯进天主堂，把110名青壮年拉出去集体屠杀。除了途中跑了二十几人及18岁的张润生和宁宾二人装死捡了两条命外，其余屠戮净尽！杀完人的鬼子返回天主堂，向妇女寻欢作乐，法国神甫提出抗议，鬼子立即开枪杀了主持正义的法国神甫，并将其尸体残酷地钉在十字架上！

### 9月17日 坟庄惨案

日寇追国军到坟庄，进村挨家逐户搜查，见东西就抢，见人就杀。冯卫春与郑玉金二人之母、冯陆周、冯陆云兄弟二人及一个孩子，韩万友、薛起等70余同胞，惨遭毒手，屠后，日寇捉鸡抢猪，劈门砸窗，连续祸害三天。

### 9月17日 双磨与西长沟惨案

在坟庄的日寇分兵到双磨，杀我同胞10人。到西长沟，我8同胞遇难。

### 9月19日 后闫村惨案

日寇窜入后闫村，抓我同胞6人，捆成一串，驱赶到一白薯井边，用刀活活砍死后，投入井中。

### 9月 江村惨案

日寇窜入江村，抓我同胞8人，押到村南活活砍死。

9月19日，按农历正是民族传统的合家团圆的中秋佳节，仅这一天我房山无辜同胞被日寇屠杀有500余人之多！这些惨遭鬼子杀害的同胞，因后来无法及时收殓，天气又热，苍蝇宗、大蛆耩、野狗吃，几乎个个面目全非，无法辨认。据老人讲：野狗吃死人肉，吃红了眼，见活人就呲牙，连叫声都变成了狼嚎！

### 10月17日 千河口惨案

日寇向张坊沟进犯，先派飞机到千河口侦察，后闯入村中，抓我同胞16人，押到悬崖，杀一个推下一个。鬼子撤出后又派飞机轰炸，又炸死6人。两天后鬼子又突然闯进村中，烧房90间。

### 11月27日 日寇再占房山城

11月1日，地方武装胡振海攻入房山城，日寇闻讯，派出军队3000人，飞机九架，坦克十余辆组成讨伐队，重占房山城。

### 12月15日 米粮屯地区惨案

天蒙蒙亮，日寇闯入米粮屯马连志家，见马母刚刚生一婴儿，端起刺刀把马母及接生婆刺死，把婴儿挑在刺刀尖上。随后在村中捕杀王大山、王二山、王德明、王理、郭大先生等83人。村民王长贵用身体护着儿子王源，背后被扎九刀，两刀从肚皮穿出，把王源肚子上戳了两个口子，王长贵不治身亡。马庆一家七死一伤，马三家二死一伤，郝平家死三人，邻居四人，八十多岁孙三老人也未幸免。日寇随后闯入詹庄，卖豆

腐的张玉及三个儿子同时遇难，张世斌的妻、女被鬼子开了膛。张世魁家七口，梁德旺家三口，高树章家四口等共计 28 人被杀，烧房 128 间。日寇窜入安庄，朱广洪家二人，朱顺之母、之妻、之女遇难。朱广洪被母亲护着，捡了一条命，到今为止还留着日寇的刀疤。日寇窜到果各庄杀一人。窜到大马庄打死王继太等 11 人，烧方敬房屋 11 间，方清房屋 8 间。

12 月 22 日 太和庄惨案

日寇于 22 日拂晓扫荡太和庄，村民闻讯外逃，向西北沿村大沟逃跑的村民，迎面遇到鬼子机枪扫射，王志平、于福之母及女儿，于凤全之父，姜玉坤之父、之叔，孙奎，孙秀全一家七口，姜恒全家，姜茂恒之妻，李德福兄弟二人，以及王以寿、姜小奇等 76 位同胞，立即倒在血泊之中。鬼子杀人后，又闯进村中举火烧房，村子处处冒烟起火，200 间民房转眼化为灰烬。

12 月 22 日 东长沟惨案

日寇从西长沟又向东长沟扫荡，又杀东长沟 37 人。

1938 年 2 月 18 日 周口店永寿禅寺惨案

周口店猿人遗址北面椅子山下，有一块平地叫十亩坪，元代建有永寿禅寺一座。日寇于 2 月 18 日突然闯入，一把火烧了几十间禅房，在庙门口，杀宋雅三等 21 人。其中有和尚 7 人，该寺主持能玉亦同时遇难。

3 月 19 日 龙宝峪惨案

2 月 18 日 8 时，鬼子闯入龙宝峪，见村中逃难老幼，欺骗他们找回村民，“保证不杀人”。有人信以为真，到废窑中叫出李贵、李增、黄院的李凯、上黄院的麻三等 40 人，鬼子则见一个抓一个，押到东岭新房院内冻了一夜，19 日晨 8 时开始集体屠杀。李增装死脱身，李贵未死成精神病，也不久死去。鬼子又抓李兴伍等十多人，拉到屠杀现场继续屠杀，随后把东峪房子点燃，又当场打死李春。

4 月 10 日 西庄惨案

百余名鬼子闯入西庄，当即杀死村民郭振荣，冯材和赵老五，又抓走冯兰、冯敏忠等 20 人，到房山后将其中 12 人枪杀。

8 月 饶乐府修飞机场

日寇强占百姓耕地 300 亩，并抓百姓为其修飞机场。

8 月 8 日 王家台惨案

汉奸偷袭我八路军一个营部加一个连，一百五、六十人，除个别突围外，都在战斗中牺牲。

9 月 轰炸佛教圣地

日寇飞机轰炸千年古刹云居寺与西域寺，动用飞机七架。

9 月 长沟村西惨案

日寇围剿地方武装周文龙部，百余人遇难。

9 月 娄子水惨案

日寇围剿地方武装胡振海部，百余人遇难，随后放火焚烧胡振海老家娄子水村。后来胡振海被鬼子抓住杀害于涿州西合村。

10 月 15 日 扎官庄惨案

又是一个中秋节，日寇诱骗地方武装陈东来部，杀 20 人，抓走近 30 人，烧房 40 多间，还抢走许多牲畜。

1939 年 4 月 刘兴跳崖牺牲

日寇进攻南窖，包围正在病休的南窖区工会主任刘兴，刘冲出跑向后山，鬼子穷追不舍，将刘兴逼到悬崖，刘兴跳崖，壮烈牺牲。

4 月中旬 大抓劳工

日寇诈骗地方武装仁大牙部，200 余人被送往日本去当劳工。

4 月 23 日 双窖东沟山坡战斗

日寇进犯下石堡，企图消灭我房良抗日政府，我部队阻击敌人，掩护老乡撤退，三战士英勇献身。

4 月 24 日 下石堡惨案

日寇扫荡下石堡沟 15 个村，烧下石堡房 760 间，郑万深之子被活活烧死，砍伤一村民，抓走四村民，上石堡 70 户有 50 户房被烧，15 个村子的房皆遭破坏，还有多名妇女被鬼子奸污。扫荡后在南窖安插了据点。

春 强挖孤山口封锁壕

日寇抓天开、赵各庄、长沟三乡百姓，去孤山口岗楼挖封锁壕，要求挖宽三丈，深二丈，十余里长。要求各村派“花姑娘”到岗楼“陪鬼子睡觉”，还常常抓来“可疑”分子钉在十安架上打活靶。

9 月 云居寺惨案

本月，日寇两次轰炸云居寺。第一次，九架飞机分成三组呈品字形飞来，炸死当地农民七人，庙内和尚一死一伤。第二次，炸穿释迦殿南配房，毗卢殿顶和天王殿前石狮子的右腿。

10 月 下石堡第二次惨案

下旬，日寇飞机轰炸下石堡，郑家 11 口人被炸死 6 口。

10 月 窑上村战斗

我八路军朱占魁部攻打窑上日伪军，牺牲战士 30 余人。

1940 年 1 月 26 日 佛子庄惨案

日寇 12 架飞机轰炸佛子庄，遇难者 52 人，炸伤 60 多人，李如松、杨文之父，姜元恩的两个儿子，姜永俊的儿子和女儿，姜元坤的妻子和儿子，姜振芬和姜玉仁的妻子，姜玉章的儿子，姜元许的儿子麻旦，姜少宗的弟弟小儿，姜元少的女儿，韩宝兴的哥哥，都在此次惨案中蒙难。姜玉瑞的妻子被炸飞，埋葬时只找到几截肠子放在棺材里。姜元影的哥哥，只找到半截小辫，还是从头绳上认出来的！

2 月 10 日 日寇再炸云居寺

日寇 12 架飞机，轮番轰炸云居寺三个多小时。

3 月 9 日 大安山惨案

日寇派十路大军，搞破坏春耕大扫荡。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到大安山的日寇，杀我同胞 42 人，烧房 900 余间，抢粮 15 万斤，禽畜被掠一空。

3 月 9 日 金龙台地区惨案

到金鸡台、金龙台、金林台扫荡的鬼子杀害我同胞 42 人，烧房 150 余间。刘巨良年迈的祖父、刘巨宦、瞎二富，于兴武、苗玉和、张显臣、董四光、张二零、谭二壮、董春雷，妇女董永芝，刘玉忠、于兴隆、张小柱，还有 70 多岁的张显金等，都是这次惨案遇害者。在这次扫荡中，日寇还抓了一个十二岁的要饭的，在村中央被鬼子踢来踢去，又用刺刀挑来挑去，把五脏六腑全甩出来，余下的烂肉喂了狼狗。抓到一名侦察员，捆上双腿倒拖在马后，拖跑得只剩下两条小腿。30 多鬼子轮奸了一名有病的媳妇，最后被日本鬼子拉着双腿，掰成了两半。

3 月 9 日 柳林水惨案

鬼子在柳林水，杀了任显进 70 多岁的老娘，任显华、任老套等 5 人。

3 月 19 日 水湖口战斗

我八路军阻击扫荡金鸡台返回据点的日寇，壮烈牺牲 18 人。

8 月 20 日 对平西秋季大扫荡

日伪十万人分二十路对平西地区(含房山西部山区)进行秋季大扫荡，杀我同胞 109 人，抓 1200 人，烧

房 12043 间, 抢粮 17200 石, 抢大牲畜 6800 多头。我房山柳林水马文彬此次遇难。扫荡后, 日寇在房山地区半壁店、南尚乐、塔照、张坊、娄子水、长操、红煤厂、大安山、宝地洼建起据点, 20 多鬼子还轮奸了堂上村的安李氏。

8 月 20 日 平峪惨案

日寇窜至平峪一带, 杀二老人, 烧房 1937 间。抓到前石门妇联主任张玉清, 日寇逼问我军用物资藏于何处, 张玉清至死不说, 壮烈牺牲在敌人的刺刀之下。

10 月 13 至 17 日 莲花庵惨案

日寇窜至莲花庵, 杀我同胞任全水等 9 人, 烧房 200 多间, 在韭菜台, 将一席匠五十多岁老伴奸污后开枪打死。

10 月 13 日 秋林铺惨案

日寇进犯秋林铺, 杀我同胞 7 人。烧房 300 多间, 任显民、李荣、李老太太被鬼子射杀, 任显耕七十多岁老母被烧死。任宏广被一枪打倒未死, 被鬼子扔入火堆烧死, 一妇女被奸污。

10 月 13 日 曹家坊惨案

日寇至曹家坊一带, 杀我村长及妇女主任等 7 人, 烧房 100 多间。宝地洼村长杨连通、元港村长安守邦及其弟安守疆, 西苑村教委于喜怀同时蒙难。史家营房 200 多间, 西岳台房 100 多间, 青土涧房 200 多间, 金鸡台新搭简易房 200 多间, 均被焚毁。

10 月 17 日 东安岭战斗

为粉碎日寇秋季扫荡, 我七团二营五连战士在史家营东安岭伏击日寇, 20 余名战士英勇献身。

10 月 火烧云居寺

秋季扫荡的日寇, 放火焚烧云居寺。使千年古刹断壁残垣, 一蹶不振。

11 月 13 日 庄户台惨案

汉奸捕我区区长王英武, 区干部景一民等 11 人, 七人被害。随后堂上、黑牛水、宝水、龙门台, 相继发生惨案, 我县、区、村干部 46 人被抓, 遇害 21 人。

12 月 9 日 王老铺惨案

汉奸抓我区、县、村干部 40 余人, 20 人遇害。

12 月 10 日 上石堡惨案

上石堡党支部书记于进深, 农会主任李福贵, 抗联队长解景材, 民兵队长王兴云被害, 房山地区第一个建立的党支部惨遭破坏。

1941 年 2 月 柳林水第二次惨案

日寇再次进攻柳林水等西北山区, 在柳林水等地残酷杀害我同胞 7 人。任显富被折磨得遍体鳞伤后, 被扔到水塘中冻死。到西岳台杀死张国富及妇女刘小燕。在青土涧, 杀死张成本媳妇。

2 月 29 日 柳林水惨案

日伪突袭柳林水, 抓走我同胞 8 人。其中有小学教师史广润, 村长任宏铎, 村民史万水, 柳林水村民兵中队长马玉福, 贸易所长宋广宽、区宣委史万章、区民政助理高奉林等 8 人。高凤林被残杀, 其余被花钱保出。

夏起 房涑毁民壕

日寇为控制我军民抗日, 搞强化治安, 搞保甲制度、颁发“良民证”, 填写“自首书”等, 同时对我平西根据地搞“铁壁合围”。强迫百姓出工, 挖房山至涑水的封锁壕。该壕北起周。口店, 南连娄子水村西, 黄元井村北, 向西经北正、蔡家口、北白岱、史各庄到张坊, 全长 35 公里, 宽 5 米深 6 米, 约开土石方 100 万立方米。各村 15 岁以上男子必须出工。有的村劳力不够, 竟把 12 岁孩子和 70 岁老头驱赶到工地挖土。

石楼最多时去 150 人，吉羊去 300 人，韩村河去 200 人……，可见动人工之多。民夫一去几个月，不准回家，庄稼成熟，没人收割。稍不满意，即遭鬼子毒打。日寇称之为“惠民壕”，百姓叫它毁民壕，直至 1943 年春才完工。壕上每隔三里五里建一岗楼，由日伪军把守。

6 月—8 月 东港村惨案

日伪包围东港安子沟，打死我战士 5 人。8 月在东港小檀港抓我工作人员王玉民、韩华青、周大邦，严刑逼供一无所获，鬼子竟将雷管、炸药塞入三人肛门内，当众将三人炸死！

8 月 23 日 马安惨案

七月，日寇搞第二次“强化治安”，8 月 23 日又发十万鬼子、伪军扫荡平西。一路日寇闯到马安，杀我一区区委书记傅兴远及 13 名百姓。烧房 470 间，返回至八渡，烧房 300 间。并在西庄、王老铺安上据点，在十渡、六渡留兵驻守。

8 月 八里塘战斗

为反击扫荡，我军一个排在八里塘战斗中英勇牺牲。

10 月 5 日 史家营惨案

日寇在史家营杀我张二伯，宋老伯等同胞 8 人，打伤 20 人。

10 月 5 日 中窖惨案

日寇抓走我同胞 7 人，然后灌入煤油泡过的小米和水，灌饱后再用皮靴登踩肚子，相玉清肠子断裂，当场死亡。

11 月 1 日 第三次强化治安

11 月 1 日至 12 月 25 日，日寇搞第三次强化治安，对我根据地进行深入封锁，控制粮食，搞“囚笼政策”，使我军民处于极度困难之中。

1942 年春 增建据点

日寇继续搞强化治安，经济封锁，增修大安山、长操、南窖、孤山口、周口店、下庄、张坊等处据点。

春 南窖惨案

日寇抓住用盐向山区换玉米吃的冯大朋和外村来送洋袜子的某人，杀掉。

4 月 15—16 日 元港村惨案

日寇用钉子把民兵队长肖仕儒钉在门板上示众，还不准亲人收尸。其母也被抓去，几乎折磨致死。

4 月 房山惨案

日寇把石楼郝二旦抓至房山喂了狼狗。

7 月 黄院惨案

区长王建带二战士去黄院工作，与敌人遭遇，一同牺牲。

10 月 庙安惨案

日寇活埋宋显华。

11 月 征粮惨案

游击大队长孙天付与一战士去东港征粮与敌遭遇一同牺牲。

11 月 金龙台第二次惨案

日寇活埋宋守富。

11 月 下旬金林台惨案

日伪抓一老太太张荣根，将其活活打死。

12 月 5 日 抓劳工

日伪在高庄、石门、辛庄、下营抓朱荣等 15 人为劳工，送日本做苦工，过非人生活。

汉奸王兰亭曾抓劳工四次，每次 200—300 人，送日本受苦受罪，石楼侯国升，赵老八，张小二都在其内，张小二死在日本。

12 月 10 日 曹家坊第二次惨案

凌晨 5 时，日寇偷袭曹家坊，打死战士张国权、任成稳，文书宋连居，妇联委员张国敏，张朝辉，张朝汉及一军分区司务员等 11 人，区小队司务长张成弟和军分区一后勤人员被抓后，日寇用铁丝穿着锁子骨捆在瑞云观庙里，后与道士张礼成，尼姑陈智芳等七人一同押回庙安据点。张成弟、陈文通及后勤战士，受严刑而不屈服，日寇放出数条狼狗，把三人撕咬得鲜血淋漓，又用刺刀乱刺，三人倒在血泊之中。

12 月中旬 清水涧惨案

日寇抓 65 岁的张显栋老汉，要他组织伪组织，为日寇办事，张显栋大骂：“你们日本人跑到我们中国来欺侮人，谁伺候你们这些混蛋……”日寇就用刺刀扎，石头砸，残杀了这位英雄老汉。

12 月 千河口战斗

我战士于千河口阻击进犯的日寇，八人英勇牺牲。

本年 粥场惨案

本年大旱无雨，山区几十个村庄的人，半数外出逃荒。日伪为笼络人心，在饶乐府与肖庄子开粥场施粥，在粥里加大灰做碱，吃粥者不少胀肚而死、仅定府辛庄就有 36 人死亡。日寇怕传瘟疫，有的人还有气，也一起埋掉。

1943 年 4 月 1 日 再次扫荡元港村

日寇循我负伤人员王英才的血迹，扫荡元港村，搞搜抢砸，抓我同胞 10 人，进行酷刑逼供。

4 月 4 日 老帽山战斗

4 月 4 日，日伪自霞云岭进犯我县政府所在地十渡。我一个排战士于老帽山岔口阻击敌人，最后六战十弹尽粮绝，集体抱枪跳下悬崖壮烈牺牲，此次战斗共有 14 名战士献身。

9 月 1 日 元港村第二次惨案

日寇夜袭元港村，抓走 10 余人，把村长及其弟和群众谭发才，杀害于大安山据点中。

9 月 天开惨案

日伪将我在天开村之情报员赵文汉骗至周口店杀害，又派黑杀团杀害了他妻子，只剩下两个年幼的女儿。

1944 年 1 月 23 日 东关上庄户山惨案

日伪残杀我区委书记景松年及战士二人，烧房 50 间。

2 月初 圣水峪惨案

日伪突袭水峪村，残杀我区长陈志，区文书及三战士。

3 月 6 日 中山惨案

区公安员，23 岁的于振边及赵喜山、杨国臣、张小乐被害于中山水峪村，又打伤我民兵杜凤鸣、许广亮、王凤稳、赵成伯，并抓走二人。

4 月 晋耀臣为国捐躯

地委书记晋耀臣去郑家磨工作，被日伪包围，突围被捕，遭受百般折磨，被害于押送石亭据点的半路之上。

7 月 1 日 龙门口惨案

我八区区长韩晓耕去平原区征粮，夜宿龙门口，被日伪包围，突围时被残杀，年仅 23 岁。

7 月 30 日 良乡抓劳工

日伪在良乡地区抓劳工百余人，经塘沽送往日本。

秋 隗永泽就义

我二区区长隗永泽到敌占区工作，被日伪包围在白薯井中，日伪用玉米秸和辣椒点燃熏向井内，他销毁文件，从容就义。

1945年2月8日 陈辉光荣牺牲

我青年救国会陈辉，是位很有才气的诗人。在抗战胜利已露曙光之时，牺牲于拒马河畔之韩村，年仅24岁。追悼会上有人为诗人献诗：

英雄非无泪，不洒敌人前！  
男儿七尺躯，愿为祖国捐。  
英雄抛碧血，化做红杜鹃，  
丈夫一死耳，羞杀狗汉奸！

据不完全统计，自“九一八”事变起至1945年日寇无条件投降，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杀我同胞3500万，毁我耕地6亿亩，中国直接损失620亿美元，间接损失5620亿美元。仅在房山2019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即有2540位同胞死于非命。14650间房屋化为灰烬。有1860人参加八路军，480人为国捐躯。

痛定思痛，翻起这些陈年老账，更让人揪心裂肺！

既然如此，日本都无条件投降了，1975年，中日重新建交也28年了，还翻这些陈年老账干什么呢？因在日本，还有一帮右翼分子，还在做着他们军国主义老祖宗的“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呢！东史郎案件倒行逆施的判决，在中国领土钓鱼岛上搞什么“神社”建筑，都证明了这一点。更有其甚者：身为“东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近日更大放厥词，妄图把中国分裂成几个国家，他说干就干，竟以东京都知事的身份去台湾给台独分子撑腰打气！这个相当于东京市市长的“知事”，岂不是不知前事，无以为师了吗？！这帮右翼分子到底要把日本民族带向何方？曾经倍受日本军国主义屠杀、欺侮的中国人民，难道不应擦亮眼睛，警觉百倍吗？

重翻老账，一是给日本军国主义的孝子贤孙们，吃上一副清醒的良药，也是为激励我中华子孙攥紧拳、咬紧牙、勒紧裤带艰苦奋斗它几十年，把我国的生产力搞上去，把我国的综合国力搞上去，尽快把我国建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使中华民族不再受别人的欺辱，永远不当亡国奴！

参考书目：

- 1、《房山文史资料》第1—13辑
- 2、《房山区志》
- 3、《房山革命史》
- 4、《房山人民革命斗争史》
- 5、《平西抗日斗争史料选编》

（《房山文史资料》第14辑）

## 日寇在良乡的罪行

白玉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55 周年的时候，为了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我曾走访三街李洪生等老人，了解到一些日寇在良乡犯下的罪行。

1937 年 7 月 7 日，日寇在卢沟桥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受到了我 29 军的顽强抵抗，这就是有名的“七七”卢沟桥事变。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我守军逐步撤退下来，日军则尾随其后，一步一步地向南向西推进。7 月 24 日，几辆军车拉着日本鬼子在良乡城周围转了一下，因侦察到昊天塔附近仍有 29 军在活动，就又回到了长辛店。7 月 25 日开来大队人马，占领了良乡城。他们关紧城门，到处搜捕 29 军的伤残官兵。

8 月初的一天夜里，撤退到琉璃河的吉兴文团的广大官兵，组织了几十人的敢死队，乘夜深人静之际摸到良乡城。由于一组敢死队的向导路不熟，把他们带到了鱼儿沟，没能摸进良乡的西门。另一组的敢死队，从良乡城东南角爬进了良乡城，摸到了东门和南门里(现在良中南院)日军住处，用他们的大刀砍杀了几十名日本鬼子，还杀了一名日军小队长。当敌人发觉后，打了一阵子枪，敢死队员迅速撤退下来，日军情况不明，只打枪，也不敢追赶。第二天小日本便在良乡城内搜捕我 29 军人员，当搜到一小东边(现在轮胎厂附近)，葛家父子三人正在屋内睡觉，几名端着刺刀的小日本闯了进来，依哩哇啦地也不知道说的是什么，就把这父子三人拉了出去，给挑死在“水没地”了，当搜到抽签卖粽子金福常家时，看着金福常穿着长袍就说他是 29 军的探子，也给挑死在了“水没地”。从此，日寇在良乡城内开了杀戒。那时轮胎厂南边地势低洼，一下雨就是一片汪洋，被称作“水没地”这里就成了日军屠杀中国人的地方。老人们说在日本占领良乡的八年时间里，在“水没地”就杀了我二百多人。一次，在西街城隍庙前杀了三十多人，说他们是八路军，实际是王昆他们的杂牌队，这都是日本侵略军欠下中国人的血债。占领者还在东门里路边上，给被杀的日军小队长立块碑，实际是一个木桩子，写上小队长的名字而已。可凡是进东门的人，必须给这个小队长的木桩子三鞠躬，不然的话，上去就是一脚，还耳光打嘴巴。从此，居住在良乡城内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看着日军穷凶极恶的样子，怕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给你按上个罪名被他们杀了，青年人总是东躲西藏的。

1937 年 11 月初，日军接到情报，说贺照云村有八路，于是日军开着汽车在天将拂晓的时候，悄悄地把村子包围了。穷凶恶极的日军，挨家挨户地搜查八路军，老百姓不懂日本话，无辜被日寇杀戮。据不完全统计，这个村子有 80 多人被杀害，二百多间民房被烧毁，全村被糟蹋后，狼烟四起，大人叫孩子嚎。现在人们提起这件事还都义愤填膺。

记下这些文字告诫后人，决不能忘记这惨痛的历史教训。

(《房山文史资料》第 14 辑)

## 日寇在房山修筑“惠民壕”

王硕儒

日本侵略军侵占房山后，就在其占领区与抗日根据地交界处修筑起封锁壕，美其名曰：“惠民壕”，群众称之为毁民壕。这在北京地区是绝无仅有的。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卢沟桥挑起战端，先后侵占北平、天津等大城市和华北的大片土地，并沿平汉、津浦铁路扩大侵略战争。面对日本侵略军的侵略行径，中国军民奋起抗战，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抗日根据地。平西抗日根据地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平西抗日根据地处于抗日的前沿，犹如一把尖刀直刺日本侵略军在华北的统治中心——北平和天津，所以一直被日本侵略军视为肘腋之患。除调集重兵多次进行“扫荡”外，还在其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协同进攻的前提下，重点实行分割、包围与封锁。

房山地势复杂，部分西部山区为平西抗日根据地之一，东部平原为日本侵略军占领区，中部丘陵地带为敌我争夺的游击区。自抗战开始，房山是日本侵略军“扫荡”最多，分割、包围和封锁最甚的地方。自1939年起，日本侵略军在其占领区不顾百姓死活，强征大量民力物力，沿房山和河北省涞水县一带山区与平原交界处，修筑据点、公路，并分段修筑封锁壕。

1941年6月，在欧洲爆发了苏德战争，日本侵略军准备开辟新的战线。由于战争的扩大和战线的延长，致使日本侵略军兵力不足、财力不足的困难加深，故此，对华战争的战略方针由以进攻国民党军队为主改变为进攻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为主。对平西抗日根据地，日本侵略军为将各“点”联结，实现“点”“线”结合，于1941年夏，几乎调集其统治区所有民力，分段包干，限期完成，费用由各村摊派，加速了修筑封锁壕的进度。凡年满15岁的男丁，都被征去挖壕沟。有些村庄人数凑不够，连12岁的小孩和70多岁的老人也被征去。如吉羊村被征去修壕300余人，韩村河被征去200余人，石楼村被征去150余人。凡去挖壕沟的人，一去少则一、二个月，多则七、八个月，无论寒冬酷暑都要修，稍有怠懈，轻则挨骂，重则遭毒打。”当时，挖壕民夫为发泄胸中的愤怒，曾编了许多歌谣传唱。比如：“人心涣散，地硬石坚。刺刀加皮鞭，终日泪涟涟”、“毁民壕，挡老八（指八路军），我看是白挖”、“老八神通大，天井都不怕，……只盼老八到，统统揍死他（指日本侵略军）”等。

1943年春，整个修壕工程全部结束。房山一段壕沟，北始周口店，蜿蜒南伸，经娄子水村西，黄元井村北，转而向西，过北正村、蔡家口村、北白岱村、史各庄村到张坊村，再向南入涞水县境，长35公里，壕宽5米，深6米，动土石方100余万方。在壕沟沿线，日军修筑据点10余处，较大的有张坊、塔照、孤山口、周口店等据点。在据点内有大量的日伪军驻守，妄图切断我抗日根据地同平原地区的联系。这是日本侵略军在房山的一大罪行。

但是，日本侵略军的封锁壕，一直未能阻止抗日根据地军民到平原地区开展活动，就在封锁壕修筑完成不久的1944年初，房涞涿县的县、区游击队和民兵曾多次越过封锁壕到平原各地，近至张坊、史各庄、北白岱，远至房山城关、琉璃河等地征粮、破交，寻机打击敌人，每次都胜利而归。

（《房山文史资料》第14辑）